目　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国领导人论社会主义的发展（代序） 3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思想背景 17
§1．1　大事记 17
§1．2　“现代化”和资本主义 27
“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27
资本主义获得强势 30
解不开的一个“死结” 33
§1．3　“空想社会主义”再思考 37
关于“空想社会主义” 37
为什么是“空想”的？ 40
现实社会主义必须避免“空想” 43
第二章　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 47
§2．1　大事记 47
§2．2　科学社会主义的提出 57
“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 57
社会主义既是理论，也是运动 60
关于“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64
§2．3　社会形态演进与人的全面发展 67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 67
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表述 70
“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72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国际实践 77
§3．1 大事记 77
§3．2 “一国胜利论”的反思 88
“一国胜利”何以可能？ 88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之争 90
“新经济政策”得与失 94
§3．3 “斯大林模式”批判 98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及其效应 98
“斯大林模式”利弊分析 101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几点思考 104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践 109
§4．1　大事记 109
§4．2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24
“新民主主义”的设想和实施 124
走我们自己的路 127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 131
§4．3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135
社会主义必须切合中国实际 13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领 137
社会主义中国迈向新的征程 142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 146
§5．1　大事记 146
§5．2　大胆利用资本主义 157
重温马克思“两个决不会”教诲 157
借鉴资本主义“新社会因素” 160
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 163
§5．3　面向时代，迎接挑战 167
时代主题的转换 167
改革本身就是一场挑战 170
社会主义理念的实践向度 173
第六章　社会主义的多样表现 178
§6．1　大事记 178
§6．2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189
“世界历史”视野的全球化 189
有全球化，就有反全球化 192
社会主义在全球化中应有所作为 195
§6．3　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的新表现 199
“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 199
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 202
“生态社会主义”异军突起 205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国领导人论社会主义的发展（代序）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

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 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0、174-175 页。

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 年秋-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86-87 页。

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

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 年 10 月 3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10-211 页。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4、294 页。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49 年底-1850 年 3 月底和 1850 年 10 月-11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462 页。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33 页。

不管最近 25 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1872 年 6 月 24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48-249 页。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70 年版序言的补充》（1874 年 7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567 页。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对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 年 4 月-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304、314 页。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613-614 页。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住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

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种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

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 年 1 月-3 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739-740、760 页。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1885 年 4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69 页。

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恩格斯：《致爱·皮斯》（1886 年 1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76 页。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足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1887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570 页。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济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恩格斯：《致奥·伯尼克》（1890 年 8 月 2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93 页。

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02 页。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 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

……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 1848 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 1848 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才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式，造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军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 1848 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 年 3 月 6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09-510、512-513 页。

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

列宁：《政论家札记》（1917 年 8 月 29 日），《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2 卷第 111 页。

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18 年 7 月 5 日），《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466 页。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准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 年 4 月-5 月），《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200 页。

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 年 10 月 14 日），《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570 页。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 年 12 月），《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651-652 页。

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329 页。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 年 9 月 24 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24 页。

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 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56-157 页。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

……

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

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41-43 页。

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13-214 页。

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68 页。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1957 年 7 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549-550 页。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 年 12 月-1960 年 2 月），《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116 页。

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301-302 页。

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 年 4 月-5 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2-313 页。

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 年 8 月 21 日、23 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51 页。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 年 9 月 1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 页。

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

邓小平：《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1983 年 6 月 18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 页。

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

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 年 6 月 30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63-64 页。

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现改革》（1985 年 4 月 15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5-116 页。

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1985 年 8 月 21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 页。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

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 年 8 月 28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39-140 页。

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邓小平：《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1987 年 3 月 27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 页。

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

邓小平：《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1987 年 4 月 26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5 页。

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

……

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1987 年 5 月 25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4、265 页。

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1987 年 8 月 29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2 页。

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当然分配中还会有差别，但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

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1987 年 10 月 13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5 页。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

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

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 年 1 月 18 日-2 月 21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2、373、379-380、383 页。

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

空想。大家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道理。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 年 7 月 1 日），《论“三个代表”》第 177-178 页。

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2 年 5 月 31 日），《人民日报》2002 年 6 月 1 日。

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践都表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长治久安，必须找到一条既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从历史比较和国际观察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我们必须从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高度，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04 年 12 月 1 日），《人民日报》2004 年 12 月 3 日。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思想背景

§1．1　大事记

根据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数据，如果把西方世界（包括西欧、美国、澳洲和日本）和其他国家分为两组，考察它们的人口和以1990年国际元（一种通过不同国家购买力平价换算出来的虚拟货币）计算的GDP，那么，公元1000年时，西方国家人口是3500万（其他国家是2.33亿，以下括号内是其他国家数据），GDP是141亿（1027亿），人均GDP是405（440）；到了1500年，人口是7600万（3.62亿），GDP是532亿（194亿），人均GDP是704（535）；1600年人口是8050万，GDP是761亿（2529亿），人均GDP是805（548）；1700年人口1.1亿（4.93亿），GDP是1000亿（2718亿），人均GDP是907（551）；1820年人口是1.75亿（8.66亿），GDP是1980亿（4965亿），人均GDP是1130（573）。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在1500到1820年间人口增加了2.3倍（其他国家2.4倍），经济总量扩大了3.7倍（2.6倍），人均GDP扩大了1.6倍（1.1倍）。这至少从经济上反映了西方世界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现代）化过程。

到了1998年，西方国家人口8.38亿（其他国家50.69亿），GDP是17998亿（15727亿），人均GDP是21470（3102）。差距明显地进一步拉大了。

14世纪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the Renaissance），到16世纪已经扩展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段时期，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重新受到重视（所谓“复兴”）；但这个复兴更标志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法、英、西、葡、波、俄等先后成立统一的封建国家，而意、德则仍然处于封建割据局面。在封建社会内部不断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出现了初具规模的手工业和广泛的商业贸易，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文艺复兴时期，封建势力（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还占据着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一方面和农民、城市平民联合，反对封建；另一方面是靠暴力夺取农民的生产资料，剥削城市手工业劳动者起家的，因而又害怕农民运动和城市平民起义，往往与封建主达成某种妥协。资产阶级或者在封建国家内部形成若干独立城邦，或者依附于王权，以寻求保护。统一的封建国家对资本主义是有利的，而王权也利用资产阶级来打击封建贵族的势力。

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文主义思潮**。资产阶级集中火力批判妨碍他们发展的宗教信条和其他封建观念，为了反对人生是苦难和罪恶的妄说，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资产阶级就肯定现世生活，肯定人有追求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权利，歌颂爱情，追求个性解放，鼓励冒险精神，并多方面地发展个人的才智。为了反对蒙昧主义、神秘主义，资产阶级就提倡理性，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应该去追求知识，探索自然，研究科学和哲学。为了反对封建压迫和等级制度，资产阶级就鼓吹仁慈、博爱，颂扬友谊和平等。总之，人文主义思潮反映了这个新兴阶级的要求，是当时进步的思想表现，同时也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精神武器。当然，人文学者所论证的“人文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思想和行为准则。

1517 年由马丁·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the Reformation）尽管是一场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思想解放运动，但还是因此出现了更趋保守的天主教和资产阶级比较愿意接受的新教这两个对立的教派（后来甚至酿成了1618-1648 三十年战争）。新教运动（宗教改革的另一个叫法）特别是英国的清教运动在形式上是对道德败坏的罗马教廷的一种反动，实质上又企图复兴衰败中的基督教。当时西欧工商业的发展给新教主张注入了许多新内容（例如敬业、节俭和勤奋），世俗劳作也具有了宗教意义，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开始形成，清教徒对科学的积极态度也与他们认为这是神圣的事业有关，因此说清教为资本主义发展准备了人才条件似乎也不为过。

15世纪末，西欧各国开始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葡、西、法、英等国皇家和贵族满脑子想到海外寻找土地和黄金，黄金梦成为驱使那些商人、航海家和探险家远航东方的原动力。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率领探险航队，横渡大西洋抵达美洲揭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紧接着：1498年，葡萄牙贵族达·伽马开辟自西欧绕过非洲南端直达印度的航路，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然后1642-1643年，荷兰人阿贝尔·塔斯曼到达澳洲，1728年丹麦人白令穿越亚洲美洲大陆之间的海峡（即白令海峡）。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扩大了世界市场，对世界生产力分布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开始了殖民掠夺，欧洲商业中心也逐渐从地中海地区转移到大西洋沿岸。

1516年，身为英国皇家高官的托马斯·莫尔（1477-1535）发表**《乌托邦》**（utopia，意为子虚乌有的地方），这是一部通过游记体小说形式发表议论和理想的作品。《乌托邦》共分两部，在第一部里，作者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统治阶级的专权残暴、厚颜无耻予以辛辣的嘲讽，还揭示了

下层群众的悲惨处境，并且已经将矛头指向这种状况的根源——私有制；而在第二部里，展示了他所构想的理想社会（乌托邦岛）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社会生活、宗教、对外关系等方面的面貌。莫尔也正以这些天才的想象力被公认为欧洲第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

16世纪中叶，英国的清教运动使修道院地产还俗，**圈地运动**得到新一轮的发展，此前由于英国毛纺织业生产扩大，羊毛价格不断上涨，贵族大规模圈占村社公地和农民的耕地，将之改为牧场，致使大批农民沦为流浪者。农民的破产影响了政府的税源和兵源，都铎王朝为此颁布《反圈地条例》，但收效甚微。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88）后，国会通过大量准许圈地的法案，使圈地运动合法化。至18世纪中叶，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英国已不复存在。19世纪上半叶，圈地运动扩展到苏格兰和爱尔兰。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关系变革，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重要手段。

在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出现了像哥白尼（1473-1543）、伊拉斯谟（1469-1536）、培根（1561-1626）、伽利略（1564-1642）、霍布斯（1588-1679）、笛卡尔（1596-1650）、配第（1623-1687）、惠更斯（1629-1695）、莱布尼兹（1646-1716）、牛顿（1642-1727）和哈雷（1656-1742）这样一批科学家和学者，由于他们的成就以及他们之间的交流，**近代科学**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中有许多人与别国的同行们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甚或就长期生活在国外，这种合作由于科学机构（譬如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创立而制度化、体制化了。科学机构鼓励讨论、研究，并将其结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发表出来。他们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与生产技术方面的应用有关，也有一些领先的学者比较关心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的问题。

1622年，意大利哲学家康帕内拉（1568-1639）在狱中完成**《太阳城》**的写作，《太阳城》也是一部对话体裁的著作，在这个充满理想色彩的城里，没有剥削，也没有私有财产，生活用品按需分配，每人每天工作四小时，其余时间用于读书、娱乐。太阳城里实行的是“哲人政治”，只有“贤哲”才能担任最高管理人（太阳）及其三名助手，教育与生产相联系，但这个城里仍然存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1649年，英国平民出身的温斯坦莱（1609-约1652）发表《英国被压迫贫民宣言》，开始了所谓**“掘地派”运动**，即城市贫民集体开垦荒地的运动。温斯坦莱认为一切战争、流血、盗窃和使人民陷入贫困的奴役性法律的原因在私有制，并谴责了资产阶级和新地主攫取了人民的革命果实；他主张土地公有，人人劳动，权利平等，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他在《共和政体纲领》

等文件中，描绘了掘土派的理想前景，但这些宣传并没有号召人民以激烈行动来改变私有制。掘土派运动后来被克伦威尔政权镇压。

1640年英国革命爆发。1642-1646年的第一次内战，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独立派领袖克伦威尔率领新模范军大败王军。1648年，王党乘长老派与独立派闹分裂之机，挑起第二次内战，也被克伦威尔击败。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英国成立共和国。1653年克伦威尔改共和政体为护国主政体，实行军事独裁。但他死后，高级军官争权夺利，使查理一世的儿子叛乱得逞，并于1660年复辟。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詹姆士二世继位，勾结法国企图恢复天主教，进行反攻倒算。1688年，辉格党人偕同托利党人发动**“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迎立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威廉为王，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次年，威廉接受了阐明国会最高权威基本原则的权利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国王不能中止法律；除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提高税收或保持军队；若没有法律手续，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这一法案实际上确认了资产阶级把持的国会在英国的统治。

18世纪上半叶，欧洲思想界掀起了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这个运动批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形态，反映了新的资本主义的精神需要。启蒙学者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天赋人权，呼唤人们从传统偏见、神学教条、教会和专制政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们认为人们完全能够凭藉理性的力量去发现有关自然、人类和社会的法则，谋求世俗生活的乐趣和幸福；他们大都提倡无神论、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政治上的民主政体、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思想领域涉及宗教、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美学等等，出现了非常活跃的代表人物，包括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卢梭（1712-1778）、狄德罗（1713-1784）以及他们的学说，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所谓“百科全书派”了。但广义的启蒙运动指近代思想解放运动，还不限于那个时期的法国。

18世纪中叶，欧洲发生**工业革命**。这是一个以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革命，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从棉纺织业开始，扩展到采掘、冶金、机器制造、运输等部门，1780年蒸汽机的发明和采用使之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因此也叫“蒸汽机革命”）。1830年英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美、法、德、日等国相继跟上，也在19世纪内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既是生产技术的伟大革命，又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为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但同时它也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形成同资产阶级相对抗的阶级力量。

1750年的法国，社会主义思想改变了文学体裁的描述方式。神秘人物摩莱里(或是化名)发表《巴齐里阿达》（1753）和《自然法典》（1755），根据自然普遍的进步法则，证明经过若干阶段，人类将从过去不自觉的共产主义达到自觉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遵循三条“神圣的法律”：废除私有制；保证公民的劳动权和生存权；规定公民“按照各自的能力、才干和年龄”参加公益劳动的义务。共产主义也不限于小范围的公社，而应该在国家规模上得到实现。而出身显赫的官僚马布利（1709-1785）在《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1758）等好几部著述中，认为私有制不符合人类的本性，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只有公有制才能保证人类幸福。但人们受私欲驱使，回到公有制已不可能，那么就只能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抑制需求，禁止奢侈，实行施加限制的土地法和继承法。马布利有关人民是最高主权的体现者、人民有权以暴力方式改变现政权的观点，对法国大革命有不小的影响。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此前北美英国殖民地独立浪潮高涨。这一年的4月，波士顿的列克星敦的民兵伏击来袭的英军。5月在费城召开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建“大陆军”，华盛顿被任命为总司令。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告13个英国殖民地独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1777年萨拉托加地区一战，美军转入战略反政。当时美国还联合了法、西、荷等国对英作战。接着俄、普、瑞典、丹麦等国组织武装中立同盟，迫使英国陷于孤立。1781年华盛顿指挥大陆军连连取胜，10月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迫使英军投降．1783年9月，英美签定《巴黎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美国独立战争是第一次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资产阶级革命。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即斐扬派），颁布资产阶级革命政纲《人权宣言》，并制定了《1791年宪法》，建立君主立宪政体。1792年8月，巴黎人民第二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国王，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建立了法兰西共和国（第一共和国），旋即审判和处决了国王路易十六。1793年5、6月间，巴黎人民第三次武装起义，又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了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专政，实行一系列强硬的改革措施和“恐怖统治”，迅速平定国内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但是这个过分激进的雅各宾专政又在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中被推翻，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热月党人获得了政权，建立了第二共和国。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广泛而深入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它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大革命时期，法国平等派思想家**巴贝夫**（1760-1797）提出要建立一个土地和财产公有，实行均等分配的新社会。他在1792年任索姆郡行政官，热月

政变时，创办《出版自由报》，支持反罗伯斯比尔的活动，但不久又因煽动起义而被捕，获释后成为职业革命家，领导“先贤祠俱乐部”；建立“平等会”和秘密起义委员会，并发表《平等派宣言》。1796年因密谋泄露被捕，次年被处死。巴贝夫的主要思想是：革命必须依靠少数人组成的密谋团体以暴力方式进行；在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要建立劳动人民的革命专政，由国民公社掌握国有财产和被没收的财产，剥夺私有者；公社实行集中管理，大家都参加劳动，实现人人平等的最高理想。

17世纪后期以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兴起。这个学派的先驱是配第（1623-1687），他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还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国富论》（1776）把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只看重对外贸易的观点，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创造财富的局限，认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还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及其影响因素，把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看作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也因此提倡自由放任的原则。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李嘉图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外的余额，地租又是工资和利润以外的余额。他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英国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1802年，法国贵族出身的**圣西门**（1760-1825）发表处女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提出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圣西门年轻时曾参加北美独立战争，大革命爆发后放弃贵族头衔。后长期从事著述，主要著作有《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他认为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每个时代的知识水平决定了政治制度的形式，最终将为实业制度所取代。在实业制度下仍然有私有制和社会不平等，但必须由国家实施全社会有计划的协作制，推行体力和脑力劳动义务制和才能的等级制，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福利。他反对用暴力手段改造社会，认为应组织实业家政党，和平实现新制度，保留新基督教。圣西门生前就有一批信徒，身后圣西门主义者创办了学派刊物《生产者》，出版了《圣西门学说释义》。这个学派还形成了壁垒森严的教阶制度，1832年，当局以圣西门派破坏法律、违背道德为罪名提交审判，同时他们所办的消费公社、合作工厂和劳动公社等试验也告失败，圣西门教派瓦解。

1803年，法国思想家**傅立叶**（1772-1837）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之后又连续出版了《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论家务农业协作社》、《工业和协作的新世界》等著作，指出现有不合理、不公正的文明制度将被一种和谐制度所取代。和谐社会的基层组织“法郎吉”（Phalange）是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在这个合作社中，劳动按各人爱好进行安排；收人按资本利润、才能报酬和劳动报酬进行分配；消费也是集体组织的；而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细胞，男女自由婚姻临时结合。法郎吉以股票形式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保留贫富差别。傅立叶相信通过和平宣传和实例示范，数年之内便可推广法郎吉制度。他的一批学生形成傅立叶学派，并出版了《法伦斯特尔》、《法郎吉》两本期刊。1834年，孔西得朗成为学派的实际领袖，所著《社会的命运》、《合作派宣言》、《旧世界的社会主义》发挥了傅立叶学说，他还领导傅立叶主义者在法国和美国的法郎吉移民区试验，均告失败。

1820年，英国有名的实业家**欧文**（1771-1858）发表《致拉纳克郡报告》，这是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标志，后来又出版了《新社会观》、《新道德世界书》等著作，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欧文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工人有权享有自己全部劳动产品。他还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初步提出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他还设想了采用大机器集体生产，产品按需分配，农、工、商、学相结合的“合作公社”。1824年，欧文到美国创办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和谐公社”，经营了5年宣告失败。欧文的信徒形成了一个欧文学派，他们进行积极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并致力于与工人运动相结合。1829年，欧文返回英国，从事组织生产合作社和工会的运动，1834年初成立了“全国统一工会”，但由于他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这样的工会很快就名存实亡了。1836年，在英国宪章运动中欧文学派发生分裂，欧文本人不赞成宪章运动，认为靠知识传播也可以消除社会弊病，而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这时的欧文主义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在前人学说基础上，提出并探讨了一些重大哲学问题，把哲学思维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德国古典哲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但有其内在的逻辑线索。康德（1724-1804）开始了德国哲学的革命，经过费希特（1762-1814）和谢林（1775-1854）的努力，最后由黑格尔（1770-1831）集唯心主义之大成，完成了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到了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哲学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费尔巴哈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和清算，重新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同时也暴露了其缺陷，表明它在原有基础上已不能再继续前进了。这样，德国古典哲学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宣告终结。德

国古典哲学家反对把世界看作固定不变、没有矛盾的东西，而是把它理解为具有矛盾发展的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这就根本颠覆了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的形而上学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辩证法从他神秘的哲学体系束缚中解救出来，同时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吸取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内核。开辟了哲学史上的新纪元。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前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来源，这是它的重大历史意义。

1831年11月，法国里昂的织工为提高工资举行示威游行，后来转变为起义。起义者提出“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占领了全城，但没有夺取政权。12月初，外地调来的政府军进入里昂，镇压了起义。恩格斯把这次起义称为“第一次工人起义”。1834年4月，里昂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为反对政府禁止结社的法令和营救罢工领袖又举行武装起义，甚至提出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巷战持续了六天。这两次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它标志着法国工人阶级已开始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

1830-1840年，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布朗基（1805-1881），发表了《谁做的汤应该由谁来喝》一文（1836），提出土地、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全部公有平等的思想。他总结以往的斗争经验，撰写了《社会批判》、《武装起义指南》、《祖国在危急中》等著作，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批判宗教和唯灵论，认为历史的进步是由理性、意志、思想和经验所赋予的，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布朗基号召组织秘密团体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少数革命家的专政，因此而形成了法国工人运动的冒险主义思潮——**布朗基主义**。他还先后组织了多个秘密革命团体，领导过多次起义，均因缺乏群众支持而失败。布朗基在狱中度过了33年生涯，人称“革命囚徒”。

1838年，法国律师卡贝（1788-1856）出版长篇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1838）。卡贝曾参加烧炭党，还当过科西嘉岛的检察长、众议院议员。1833年创办《民众》杂志，宣传民主思想，次年流亡国外，在英国时形成了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观点。回国后又恢复《民众》杂志（1841）。1848年，他得到欧文的支持，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立伊加利亚移民区，不久即告失败。卡贝的著述描绘了建立在平等、博爱、统一和民主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并认为可以通过和平途径去实现它。还有德萨米（1803-1850），他曾委身布朗基派，加入秘密革命团体，后创办《平均》杂志（1840）和《人权·无产者论坛》报（1848），领导“新巴贝夫主义者”俱乐部。代表作有《公有法典》（1843）。

法国的**无政府主义**也很活跃。1840 年，工人出身的蒲鲁东（1809-1865）出版《什么是所有权》（或《什么是财产》），猛烈批判了私有制和

维护私有制的各种观点，名声大振。1846 年，发表《贫困的哲学》；此后，又接连发表《社会问题的解决》、《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战争与和平》等等，宣扬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试图实行以小私有为基础的理想社会——“无政府”主义社会。蒲鲁东反对革命，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斗争，他的口号是“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和公民的绝对自由”，公开提出“打倒政党，打倒政权。”他主张创办“人民银行”，发放“无息贷款”，实行“契约互助”以达到小私有的无政府社会。这个社会，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成立互助组、合作社，再不断扩大用完全自由的联邦代替原有的国家。

1836年，伦敦工人协会成立，次年提出致国会的请愿书，后又以《人民宪章》（1838）名称公布，其中提出普选等六项政治要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起响应，揭开了**宪章运动**（Chartism）的序幕。1838年冬，在第一次签名运动中，有128万人签名。1839年，这个运动召开全国会议，遭到政府的镇压。1840年，全国宪章协会成立，运动进入第二次高潮，这个协会是宪章运动的领导组织，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仅仅两年时间，协会组织遍布全国，会员总数达到5万余人。在全国宪章协会的领导下，1842年有330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而运动的第三次高潮发生在1848年，将近200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宪章运动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迫使统治阶级作出某些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

1836年，由“德国流亡者同盟“中分裂出来的部分成员在巴黎建立了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该组织的纲领和章程具有浓厚的空想和密谋性质，主张以少数人物的起义来推翻反动统治，直接在德国建立共产主义；他们的口号是“人人皆兄弟”。这个组织发动的多次起义都遭到失败。1847年春，同盟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并授权他们领导组织的改组工作。

1838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魏特林**（1808-1871）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问世，书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指出劳动者贫困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不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整个社会才能和谐与自由。他还主张用暴力摧毁旧社会，立刻进入共产主义；提出“现在我们没有祖国”，号召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1846年，魏特林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不久即与马克思、恩格斯决裂，去了纽约担任《人民政坛报》的编辑。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他又回到德国。革命失败后再度赴美，组织共产公社，也没有成功，1855年起脱离工人运动。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贫苦罪人的福音》。

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是在以前的共产主义小组基础上扩大而成的。委员会成员大部分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还在巴黎、汉堡、莱比锡等地建立了支部。这个委员会通过书面讨论和定期通讯形式，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对加强各国社会主义者及工人团体之间的联系，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1847），该委员会停止了活动。

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成立。这个同盟是由正义者同盟改组而成、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的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同盟的纲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1848），它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盟旨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无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同盟成员积极参加了1848年欧洲革命。革命失败后，同盟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后来又恢复了活动。1850年夏，同盟中央委员会在策略问题上产生了很大分歧，出现了宗派主义的分裂倾向，1851年这个同盟停止活动，1852年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早期形式，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同盟对广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团结和教育各国革命工人起了重大作用。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布鲁塞尔组建（侨居比利时的工人）德意志工人协会，这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团结和教育工人的团体。马克思曾多次在协会作政治经济学演讲，论述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对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起了很大作用。1848年以后，协会遭到当局破坏，不久停止活动。

§1．2 “现代化”和资本主义

“现代化”是一个令人景仰的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进步、发展和强盛，而现代化进程又往往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联系在一起。正是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市场，才使世界的历史真正变成了“世界历史”。资本主义所造就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原来经济、社会与文化都还比较落后的西欧后来居上，成为今天人们谈论现代化的“样板”。从现代化的起源和资本主义发迹史看，印证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很少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的深刻分析，而也正因为这个社会无法解决它固有的基本矛盾，这又为新社会的兴起准备了前提。

“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一般认为，现代化发端于 18 世纪后期的英国工业革命，但“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出现则要晚得多。尽管现在人们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并以此作为落后国家发展战略的目标，但是究竟什么是“现代化”，却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时代，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方法或手段；有人说现代化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有人把现代化看作科学革命以来人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发生剧烈变化的过程。

> “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①]

也就是说，现代化这一世界性历史过程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时代；它的动力来自工业革命，并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带动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而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一种趋势。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什么“现代化”，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却多次论述了“现代”、“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马克思就把“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17 页。

看作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时代；[①]而这个现代就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②]。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马克思又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③]可见马克思当年已非常明确地把“现代”、“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已经洞悉了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④]工业化之始于英国，一是因为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英国农场经济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英国很早就开始了土地产权关系的变革，形成公簿持有权、契约持有权和自由持有权，光荣革命以后又通过立法确认了圈地的产权，产生了家庭农场和资本主义农场，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二是英国资产阶级政府营造了一个有利于工业化发展的环境。光荣革命后一个半世纪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制度法规，譬如通过土地制度，使土地能够进入市场，成为资本积累和进行投资的主要形式；成立“外溢经济作用”的服务公司，允许私营道路信托投资公司承包修筑公路和运河，建设交通运输体系；用调整税收、给予津贴和贸易特许等方式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政府还通过国内举债增税、海外殖民战争来筹措工业革命的启动资本。三是英国最早出现了工业革命的阶级力量。17-18 世纪英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土地贵族、“中间阶级”和工资劳动者三大阶级，他们所具有的开放性、流动性特点使生产要素比较容易得到有效配置。四是新教伦理精神产生了激励作用。新教的“自助者天助”、敬业节俭的信条与上帝选民的意识融为一体，促使信仰新教的英国清教徒推崇经过包装了的功利主义，他们宣扬工作致富，也比较关注个人权益。

英国工业（产业）革命发其端，欧洲经济面貌在较短时间里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并迅即扩散到政治体制、城乡结构、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议会制度和轮流执政方式的确立，为资产阶级民主化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社会成员的身份等级制被打破，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伴随着新产业出现了；工业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技能和素质，这就使文化教育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共同推动整个社会进入了“现代”。

现代化的精神体现是近代科学的兴起。1543 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里的《人体构造》标志着自然科学开始摆脱神学的框架。到了 17 世纪，科学又有了许多新的突破，以伽利略为代表的实验科学，尤其重视科学认知必须获得实验证明，提出了近代科学别出一格的方法论。实验科学还改变了原先科学人士各自为战的研究方式，形成“科学共同体”集体研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3 页。
[④]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 124 页。

趋势，同时，实验科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也日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7 世纪中叶，英国皇家学会和巴黎皇家科学院相继成立，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资金和组织保障。而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把近代科学事业推进到一个高峰，实现了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牛顿在力学、天文学和光学等领域都创造了光辉的成就，特别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经典力学体系，亦成为后人思考和研究科学问题的思维模式。科学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它引导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积极态度，而不再满足于接受说教，以及人生听天由命的态度；它还促使人们冲破对各种权威和书本的迷信，确立起科学理性和科学实验相结合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科学还通过技术的中介实现了“物化”，使它从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物质生产力。

而这一切，一旦为资本主义所利用，就可以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像不到的。”[①]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推行可提高效率的分工和专业化，都要求不断改进生产资料（劳动工具），他们关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千方百计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强有力地把工业与科学联系在一起，科学通过技术的形式进入工业生产，酿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又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物质保障，推动科学不断向纵深发展。“英国科学思想是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从机械师、冶铁匠、化学工业家和工具制造家的名单和皇家科学院成员的名单上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科学与实际应用有多么密切的关系。”[②]

英国工业革命揭开了世界现代化的序幕，资本的扩张又推进了现代化进程。现代化伴随着资本主义有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 18 世纪后期到 19 世纪中叶，这是英国工业革命向西欧的扩散过程，物质技术基础是煤和铁，特征是新能源（蒸汽）的使用和机器大生产。当时英国通过工业化实现了经济转型，把第一产业（农业）转移到殖民地，国内则主要发展第二产业（制造业）。1841 年，英国的农业产值比重降至 22%，农业劳动力也仅占 23%，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国家。第二次高潮出现在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欧洲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周围地区扩散。这次高潮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电力与钢铁，特征是产业规模扩大和技术含量提高了，以内燃机、电动机使用和铁路建设为代表，西欧北美完成了初步的现代化，农业劳动力降到 40%以下，形成了世界的发达工业区。这次高潮过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此起彼伏的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第三次高潮出现在 20 世纪下半叶，其物质技术基础是石油能源、人工合成材料、微电子技术，特征是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出现了跨国公司和全球产销网，由此引发世界经济结构性的重大变化。发达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72 页。
[②] 转引自丁建弘：《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0 页。

家相继进入现代化的高级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向第三产业（信息、金融等服务业）转换，形成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劳力节省但资源浪费、大众消费和福利主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成为现代化进程的新生力量，它们正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工业革命启动了现代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着现代化的发展和扩散，现代化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引起更加广泛的社会分工、更加开放的商品交换，进而又扩张成为世界性的市场，世界市场打破了国家、民族和地域的界限，使各国相互依赖，相互联系。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①]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②]资产阶级凭借它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用现代化的方式书写着“世界历史”。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式出现之前，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就是资本主义化。

资本主义获得强势

当西欧还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其文明程度普遍低于一些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但也正是这种落后使得资本主义因素扩展拥有了相当的空间。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其较之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便迅速而充分地体现出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了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工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又反过来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定型”，这种相互依存的互动进程，展现了现代化的“示范”效果。[③]资本主义利用资本的扩张和科技的发展，创造了人类生产力的奇迹，很快改变了昔日的弱势地位，一举成为世界上的强势文明。

资本主义迅速成为强势文明首先是因为它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在更加先进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迄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它的物质基础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力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1760 年，英国在棉纺织业开始了工业（产业）革命，形成了由动力机、传动机、工作机组成的机械体系，它所带来的生产能力，是手工劳动所无法比拟的。棉纺织业的变革，很快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以及农业、交通运输业的技术更新。由于机器生产逐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1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6 页。

③ 事实上，“现代”（modern）这个概念来自拉丁文modo（相当于mode的意思），西文也并无近代、现代之别。它并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更基本的恐怕是一个“模式”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也就是根据某种模式的“就范”（model）过程。

渐普及，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协作范围越来越广，生产的社会性越来越强，原来分散的个体生产日益转变为由社会分工协作的社会化生产。生产社会化使生产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表现是：使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从单个人使用生产资料变为由许多人共同使用生产资料；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生产从个人行动变成社会行动，产品也从单个人的产品变成由许多人共同劳动的产品，乃至是许多工厂共同协作的产品；生产目的的社会化，由以往满足地方市场的需要发展为满足国内统一市场的需要。生产社会化造就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在 18 世纪以前的 1000 年时间里，欧洲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只有 0.11%，亦即要 630 年才能增长一倍，而从 1820 年到 1990 年间，英国的人均增长率翻了 10 倍，德国翻了 15 倍，美国翻了 18 倍，日本翻了 25 倍。[①] 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②]

在中世纪，欲望被认为是丑恶的，而资本主义则认为实现欲望是人的天性，这种观念逐渐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准则。人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寻求发财致富的途径，推陈出新、鼓励消费也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资产阶级一面将科学成就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促进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面又千方百计打破各种界限，摈弃闭关自守、满足于现状的保守观念，刷新旧的生活方式，扫除一切他们实现目标的障碍。

>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③]

资本主义还打破了“人的依赖关系”，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下，一切生活和生产活动都是以自然血缘和统治服从关

[①] [美]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5 页。

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表现为直接的依赖关系，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由此成为摆脱了一切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人，这就为劳动力的全社会流动打开了大门。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中人的因素，拥有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而这种职业的流动在经济动荡和重组的过程中，加强了社会反应的灵活性，有利于资本和劳动力及时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使生产力要素得以充分发挥，资本更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迅猛地发展。

资本主义之成为强势文明还在于资本的强劲扩张。“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 16 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①]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即资本的存在”。[②]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标志产物，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体现。资本的二重性，一是其自然属性，即资本必须实现价值增殖；二是它的社会属性，即资本归谁所有（以前我们更多地看重资本的社会属性，甚至用以取代自然属性，这就容易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扩张是资本的本能，这首先表现在它“无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③]资本从价值形态看，是能够带来增殖额的价值；从实物形态看，就是能够实现价值增殖的生产要素。或者说，只有当货币和生产要素实现价值增殖，才能成为资本；而价值增殖又必须通过流通和交换才能实现，因此市场就是资本赖以存在和扩张的基础，资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范畴。为了实现增殖，资本总是向那些能够获得最高利润的产业或产品集中；它总是活跃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参与激烈的行业和产品竞争；它一面试图通过吞并他人来实现自身扩张，一面又想方设法规避风险，获取最大收益；它冲破一切民族、国家和地域的限制，具有强大的渗透力。而且，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④]它的增殖又是在运动中完成的，即在社会生产或经营活动中实现的，随着资本运动广度的拓展和速度的加快，经济运行就会持续活跃，并不断地走向“繁荣”。

价值增殖是资本的一般属性，无论资本的所有权属于谁，其谋求不断增殖的自然属性是不会改变的；资本作为可以带来增殖的价值，其能否增殖、增殖的程度多大，不是由资本的社会属性决定的，而是由资本的自然属性决定的。由此可见，资本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强大动力，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形式，无论人们如何评判资本的性质，资本总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一个最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国内市场已经不再能容纳日益膨胀的生产力，资本就必须向国外市场扩张，这种扩张的主要形式是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66 页。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6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9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87 页。

本输出，主要对象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那里的劳动力便宜，原料价格低廉、工业利润大，投资效益远远超过国内。在输出生产资本的同时还采取借贷资本等形式榨取被输出地的最大利润。资本就像一只无比贪婪的巨兽，不断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不惜一切手段地把那些地方都卷到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来。

>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
>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

马克思早已敏锐地预见到，资本的扩张还包括“精神的生产”。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和需要创造出一个世界，就必然要在输出经济模式的同时输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使世界历史“资本主义化”。在资本追求无限增殖和扩张的内在本性驱动下，资产阶级对世界的扩张不仅体现在地域的广度上，而且体现在领域的深度上。

解不开的一个“死结”

相对于封建主义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兴的力量，它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和廉价的商品，代表着一种强大的经济力，对落后的封建生产力构成了简直无法应招的挑战；资本所拥有的大工业优势对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巨大和致命的压力，是一门“摧毁一切万里长城”重炮。当资本依靠经济力的扩张遇到阻碍之时，资产阶级就会动用武力，打开人家的市场，迫使那些被征服的地方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甚至把它们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是，武力征服毕竟是短暂和不牢固的，而且必将遭到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只有经济力的渗透才是长久的，先进生产力一旦为当地人民带来了实惠，就能够获得认同和欢迎。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的扩张，又是在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新旧生产方式转换的必然举措。

这样，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就导致了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大工厂”，但由于这种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一开始就是强迫性质的，或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殖民统治，根本就没有什么平等公平可言。显然，如果没有广大殖民地国家、后来是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奉献”，资本主义就没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也不可能获得以后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发达”恰恰是以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6 页。

的“不发达”为前提的，是以牺牲落后国家（地区）的巨大利益为代价的，无论是早先的殖民统治还是今天的经济全球化。

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创造了工业文明，开辟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尽管资本主义也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自我调节来缓解这个矛盾，但事实上，只是把这个矛盾转嫁给别人了。从全球范围看，现代化的程度越高，生产力越发达，这个矛盾就暴露得越尖锐，这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是市场经济行为的基本形式，也是社会经济形态自然历史过程的一个必然环节。“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隐藏的潜力。……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①]这就是说，为了发展商品经济，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私人占有制就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有制形式。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有个度，如果超过了这个度，它就会走向反面，特别是当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会激化。

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表现之一是效率与公平的强烈反差。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但这些财富在私有制条件下只能根据剩余价值的规律进行分配，分配不均则使公平的杠杆失去平衡，因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一开始在人们的“起跑线”上就不平等，其结果就更谈不上平等了。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工人的实际工资在下降，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生活状况呈现恶化的趋势。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恰恰是以损害乃至牺牲公平作为代价的，而这种畸型的高效率是不可能长久的，必须调整生产关系才能缓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表现之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方面，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生产和需要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调；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最终也将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②]“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③]生产社会化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3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3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26 页

和私人占有的矛盾表现之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日益对立。“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②]一旦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无产阶级革命就要爆发了。

> “正像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③]

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还通过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获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攫取丰富的国际资源。早期的殖民主义浪潮和今天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都是资本扩张以谋求更为广阔的市场和寻找释放成本（即成本外部化）的巨大空间。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欧洲列强采用武力开辟了大批殖民地，并建立了许多从事殖民贸易的商业垄断公司，从殖民地和附属国掠夺了大量金银贵金属和各种物质财富。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国际贸易，攫取了大量廉价的工业原料；通过向殖民地国家（后来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掠夺性地开发那里的自然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了政治独立，但这些国家经济技术条件落后，生产力不发达，它们的产品成本往往高于国际水平，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则利用它们控制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了较高的回报。

发达国家凭借其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让不发达国家承担它们的劳动力、环境资源等成本，由它们稳收暴利。表面上看，发达国家越来越发达了，这些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缓和了，但实际上它们发达起来的成本相当一部分是由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承担的，世界范围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反而越来越激化了。这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成本外在化实际上是把国内的基本矛盾扩展到国际，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不平等占有和分配关系，造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国际化。而且，资本主义通过成本外在化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2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5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0-251 页。

改善了本国的生产关系，挽救了本国发展的危机，甚至表现为加速度的发展，但同时也加速减少了成本外部化的释放空间，使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蕴含着更深刻的危机。

现代资本主义仍然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能力，资本主义的演进也是一个不断自我扬弃、自我否定的过程。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修复并不可能改变其私有制的本质，一些矛盾缓和了，另一些矛盾加剧了，还有一些新的矛盾出现了，其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以私有制、两极分化和不公平（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最终逃脱不了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还是不会灭亡的；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生产的社会化，也在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革，包括股份制的推行和资本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的国有化和合作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等等，都可以视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胎胞里不断生长着社会主义的因素，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这个历史进程的某种接近。当然，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看，它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将是一个比原来预计要漫长得多的过程，也具有比原来预计要灵活得多的过渡形式。

§1．3 “空想社会主义”再思考

空想社会主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酝酿的一种思想体系，它表达了早期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反映了欧洲进步人士有关建立理想社会的情怀。但是，这些愿望和措施为什么最终都陷入了“空想”？后来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苏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什么也发生了过分理想化（其实也就是“空想”）的偏差？如何才能告别“空想”，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真正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这些问题发人深省。

关于“空想社会主义”

16 世纪初叶，西欧各国开始了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是一场用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但是，资产阶级仍然是一个剥削阶级，它在创造出封建阶级所无法创造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肆无忌惮地剥削劳动者，疯狂地截取劳动的剩余价值，从而使广大人民陷人了新的，甚至是更严重的苦难。早期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就认为不但要彻底废除封建制度，而且还必须拒绝这个新产生的资本主义，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背景。对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经历的不同时期，空想社会主义也表现为三种观念形态。

16、17 世纪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初级形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莫尔和意大利的康帕内拉，他们主要用文学方式描绘理想中的社会。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原始积累和以毛纺业为主的家庭手工业时期。英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沦为只得靠被雇佣才能活命的工人，酿成了“羊吃人”的悲剧。1516 年，莫尔的《乌托邦》无情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所带来的贫穷和灾难；还充满诗意地描绘了乌托邦岛上的美好社会和居民的幸福生活，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声。1622 年，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更加具体的内容描绘了又一个令人神往的理想社会。这两部作品都采用了游记对话的优美体裁。

这时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一是废除私有制，实现公有制。莫尔第一次提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认为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①]在他笔下的乌托邦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公有制。二是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在产品非常丰富和人们高度自觉的前提下，实行生活消费品的按需分配，似乎只要取消了货币，贫穷和罪恶都会随之消失。三是实行民主政治。这些理想国度的公职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任何公共事务都必须由集体讨论

[①] ［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44 页。

决定。四是比较重视教育和知识的力量，《太阳城》中就使用新的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而且教育与生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统治者应该是具有渊博知识的“圣哲”等等。

空想社会主义和以后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空想成分，尽管有本质的区别，但“空想”毕竟是它们的共同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他们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是虚构的，但还是第一次提出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替代方案，具有积极的意义。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比较欣赏原始公社的做法，譬如乌托邦的最高领导人是终身制，太阳城实行公妻制等等。

18 世纪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中级形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摩莱里、马布利和巴贝夫。那时欧洲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开始明朗化，资产阶级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了法国。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不仅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同时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先驱者的理论意识。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马布利的《论法制和法律的原则》，抛弃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梦幻般的文学色彩，从理论上探索社会主义，用法律条文来展现理想社会，使之更具有说服力。

这个形态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论证了从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的必然性。摩莱里指出：人类社会是一个运动发展过程，起点是共同劳动和共同占有的原始社会，私有制最终将被合乎理性的公有制所取代。马布利认为私有制导致了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的分化并引发了它们之间的冲突，已经蕴含了阶级理论的因素。他们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彻底的纲领。摩莱里用法典形式描绘了未来社会，第一次在法律上提出了“公有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思想。他还制定了经济法、秩序法、行政管理法、教育法、婚姻法和惩治法等，那是一个平等美好的法制社会。他们还提倡实行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共产主义。摩莱里设想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平均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即取消分工，实行平均分配，规定节衣缩食。马布利则认为人的需求越少，幸福越多，清心寡欲是最高尚的道德，甚至还提出限制生产的主张。这种“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①]明显带有小生产的思想痕迹。

19 世纪初叶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高级形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欧洲当时已经发生了两件大事，即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了，这个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比以往更尖锐、更深刻，对未来社会的预见也更加有见地，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更加系统化了，因此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之一。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主要观点是：初步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21 页。

律。圣西门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地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都是过去全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旧的封建制度和未来社会制度之间的一个“中间的和过渡的体系”。[①]傅立叶进一步指出，每种社会制度上升发展到极点时就会出现下降的波动，而新社会即在旧社会的衰落中取胜。

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不久，就敏锐地预见到其不良的社会后果，并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这个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新的压迫制度，是一个比以往压迫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端罪恶的制度，必须建立一个合乎理性的制度取而代之。他们严厉抨击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弊病，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经济危机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资本主义竞争必然导致垄断。欧文一语道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即企业主无偿占有了工人生产的“剩余产品”。[②]他们还揭露了资本主义思想道德的虚伪性，指出“文明是欺骗的王国，而道德则是它的工具”。[③]

他们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天才的预测。圣西门认为未来社会应使人们获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快乐，由此摆脱了禁欲主义的束缚。他们提出未来社会应以大生产作为现实的物质基础，欧文更是首次把大生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大生产，才能真正实现协作和计划经济，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圣西门还率先提出按劳分配的思想，即“使每个社会成员按其贡献的大小，各自得到最大的富裕和福利”。[④]傅立叶也坚决反对消费品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认为“任何平均主义都是政治毒药”。[⑤]欧文则提出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基本原则。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实行民主制度和集体领导，不搞终身制。当社会在消灭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以后，每个人都能在和谐平等的环境中得到全面的发展，国家的政治职能也就因此而消亡了，社会权力将由对人的统治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

> “这些著作（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引者）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

[①] 《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2页。
[②] 《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2页。
[③] 《傅立叶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8页。
[④] 《圣西门选集》第1卷，第223页。
[⑤] 《傅立叶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15页。

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①]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思想仍然是值得高度重视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②]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是建立在理性和人性论的基础上的，他们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采取局部改良或和平改造的方法；他们虽然出于人道关怀同情无产阶级，但却并没有把无产阶级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而只是寄希望于天才人物的救世。这样，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前人，但还是没有能最终突破空想。

为什么是“空想”的？

正如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时指出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者的理性的任务。”[③]这里既讲了客观原因是还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阶级状况，而主观原因则是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唯心史观。另外，那就是当时人们还不能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不能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多地是倾向于道德标准而忽略了历史标准，当资本主义尚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同时已伴随了残酷的掠夺和剥削时，他们就盼望“乌托邦”这样的理想社会代替之。他们当然更不理解只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才能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物质和精神的基础，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创立的社会化大生产及“一切积极成果”之上，任何从主观上割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联系的企图，都将使社会主义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空想社会主义没有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诚然，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只是两种剥削制度的更替，它在打破人们身上封建枷锁的同时，又让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这样的资本主义没有给人民带来什么福音。莫尔怀着对人民的强烈同情心，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提出消灭一切私有制，并描绘了一个实行公有制人人安居乐业的《乌托邦》。他在这里采用的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道德标准。莫尔谴责“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的道义立场，但用历史的眼光看，正是通过“羊吃人”阶段，资本主义才完成了原始积累，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封建生产关系的“阵痛”，也恰恰是这种不“道德”推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0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635-63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24 页。

英国率先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进而实现了工业化，成为18-19 世纪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在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笔下，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同样丑恶，都必须被推翻。其实，这两种社会制度在那时，一个是日薄西山，一个刚刚破土而出，对这两种既不同性质又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制度各打五十大板，起码是缺乏历史眼光的，也没有意识到人类进步是必须付出代价的。莫尔以后，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差不多都运用了类似的道德标准，基本上忽略了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对其进行辨证和历史的评价。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最深刻的，他们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剩余价值，对无产阶级的悲惨遭遇寄以深切的同情。但他们又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造就了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推动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只有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同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和冲突，“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②]到了这个时候，才有必要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坚持的主要是历史标准，而不是道德标准，因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③]即使需要有道德上的评价，也应该把它置于历史评价的框架内。

二、**空想社会主义否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联系**。莫尔从谴责“羊吃人”的现象到提出充满诗情画意的“乌托邦”，这中间看不到有什么继承关系和历史的演进，因此，尽管他笔下的理想社会尽善尽美，也只能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摩莱利、马布利同样否认现存的资本主义与未来社会之间的联系，他们似乎更愿意回到平等无争的原始社会去。摩莱利认为要彻底改革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就必须切断私有制的根，回归原始的自然状态。马布利则提出“到美洲和非洲大森林里去找自己的公民。这些地方的不幸野人完全没有知识，还不会种地，不会饲养家畜，没有常住的居所，今天不想明天的需要”，“在他们的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里有最完美的平等。”[④]他们主张以禁欲主义来实现理想中的平等和幸福。19 世纪初叶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亲历了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人类发展的规律有了初步认识。他们认为每种社会制度发展到极点就会盛极而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作为一个“中间的和过渡的体系”构成了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4 页、第 27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75 页。
④ 《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9 页。

阶段。但他们不承认这个阶段也是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阶段，如果不经过资本主义，他们的理想王国就不可能实现。正因为如此，他们虽然朦胧意识到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存在，却始终没有把这个规律揭示出来。

> “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①]

用马克思的话说，“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②]列宁也把资本主义大工业视为社会主义的唯一基础，“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③]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代代文明传承的结果，每个社会形态的更新都是对前者的批判性继承，资本主义不仅为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条件（社会化大生产），还准备了阶级条件（无产阶级）和其他条件，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有着不可否认的渊源关系，任何割断这种历史联系的企图，到头来都会发现不过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想”。

三、空想社会主义忽视实现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空想社会主义者还不可能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否认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看不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他们的理想也就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他们能够做的是另外“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④]他们不懂得每个社会形态的出现，都要经历一个萌芽、发展乃至成熟的过程；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而不能仅仅凭藉主观的愿望和热情。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时代，或是资本主义刚刚起跑，或是资产阶级革命还在酝酿，即便是 19 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相当强劲之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还没有爆发，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基础尚未成熟，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没有真正形成，产生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都还不具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各种社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4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2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01-30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24 页。

主义方案，只能是“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尽管美不胜收，毕竟是空中楼阁。

马克思在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有一段精辟之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这段话深刻揭示了三个道理：第一、人类社会每一种新的生产关系都是在旧社会孕育成功的，它产生的现实基础就是它将要取代的那个社会形态。同样，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凭空产生，它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产生并成熟的，而在其日益壮大的过程中，吸收的也正是旧社会为它提供的各种养料，包括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和日益全球化的生产过程等等。马克思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传承关系。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其基本矛盾无法解决而必然要被取代的产物；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也必须充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一切积极的成果”，而不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中断。第二、衡量新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是生产力水平，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形态更替的普遍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越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存在条件也就越趋于成熟；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一旦发挥殆尽，它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就是必然的了。“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①]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人们头脑中杜撰的理想社会，如果忽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拔苗助长，那样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第三、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任何社会形态的更替，都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大约经历了三百年，剥削制度更替尚且经历了如此漫长的过程，社会主义要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关系和私有制度，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高度繁荣、民主、文明的新社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和公正，这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是不可想象的。

现实社会主义必须避免“空想”

空想社会主义自 19 世纪中叶被科学社会主义取代以后，已成为一段历史。但是，20 世纪，当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现实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空想”因素仍然频频萌动，走了不小的弯路，结果不得不花很大的力气去纠正，这些教训值得认真记取。

十月革命后，1918 年 9 月，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实行“战时共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3 页。

主义政策”，即实行全盘国有化和国家垄断体制，用实物化代替商品货币；在工厂，推行中央集权的总局制，对企业实行垂直的集中领导；在农村，对农民实行余粮收集制；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实行一切阶级的义务劳动制。为了击败帝国主义的联合武装干涉、平息国内的反革命叛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时的确是必要的，对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功不可没。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将这项政策引伸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捷径”，这就不自觉地陷入了某种“空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过程中的短暂成功，又导致了他们的某种幻觉，似乎使那些空想因素找到了依据，似乎只要国家政权的行政强制与人民的革命热情相结合，就能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

> “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②]

人民用反抗和骚乱作出了反应，使这项政策根本推行不下去。列宁不得不在 1921 年春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通过自由贸易与小农结盟，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结盟，以商品货币关系和经济核算制为杠杆，形成多层次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战时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想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后者则是利用资本主义、并通过市场渐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无独有偶，40 年后，在中国也发生了所谓“大跃进”。一时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旋律，实现共产主义似乎更取决于主观热情和胆量，而经济基础是否具备了条件则不必多加考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种把人的胆量与经济发展挂起钩来的诗意表达，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批评的“纯粹的空想”。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以为只要取消商品货币，实行平均主义，共产主义就会早日到来。但是，主观愿望不可能改变客观规律，我们在遭受了客观规律的报复后，不得不刹住这列空想快车，逐步转入经济调整的轨道。

人们不禁要问：苏俄和中国都是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国家，为什么也会陷入空想的误区呢？

首先，还是没有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是孕育社会主义的母体，“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③]马克思认为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但必须占有资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6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69-570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186-187 页。

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这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普遍意义。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立刻遭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干涉和遏制，两大阵营的严重对峙，也促使彼此视对方为“洪水猛兽”，社会主义千方百计设置壁垒，防止资本主义的侵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不可能借重资本主义“一切积极的成果”，反而有意无意地隔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对“够格的”社会主义更是心中没底，苏俄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如果以 1921 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为起点，到 1928 年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前后仅仅经历了 7 年；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1949-1956），恰好也用了 7 年时间。这些短暂的过渡时期其实并没有垒起坚实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而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又希望加快推动历史的车轮，这正是“空想”产生的一个动机。

第二，资本主义强势激发了社会主义“赶超”的愿望。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封建主义衰落的基础建立起来的，尽管也发生过几场复辟，但总体上呈摧枯拉朽之势；而社会主义制度却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仍然强大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形势就相当严峻。资本主义所拥有的现代化先发优势，以及它们所控制的国际分工体系，使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感与“资强社弱”的现状形成了强烈反差，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既定目标。但是，资本主义已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社会主义刚刚喷薄而出，双方实力悬殊，赶超谈何容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社会主义相信政治勇气可以弥补经济力量的缺憾，只要把共产党的使命感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就能创造出人间奇迹。从斯大林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赫鲁晓夫提出十五年赶上美国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初动因，都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国“大跃进”的具体目标也是要在钢产量上赶超英国，动用了九千万人大炼钢铁，尽管完成了 1070 万吨钢的既定指标，但就难保什么质量了。社会主义的这种“赶超”愿望本身未可厚非，但若是违背客观规律行事，超越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地急于求成，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欲速而不达，沦为一场“空想”。

第三，教条地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制定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主要是针对那些国家的。但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即普遍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商品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尚未完成；生产社会化程度低下，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仍然占有相当比重。革命发生顺序上的这个重大改变，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历史难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本国的实际制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回顾起来，现实社会主义对这个“难题”的认识很长时间并没能达到这样的高度，而是照搬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计的社会主义原则，把

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当作神圣不可动摇的定理。由于忽略了本国的特殊国情，忽略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盲目追求高起点，鼓足干劲搞“一大二公”。[①]结果，社会主义理论中参杂了“空想”成分，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出现了裂痕。正如邓小平一针见血指出的，“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早一点进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②]

当然，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空想萌动，毕竟不是简单的“翻版”，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激烈批判，并试图以理想社会取而代之；而现实社会主义的空想萌动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追求，主观愿望和革命热情占了上风，操之过急，欲速不达。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处的时代和政治地位，很难把理想付诸于实践，基本上属于纸上谈兵，欧文的实验也是跑到美国去进行的；而现实社会主义的空想萌动是在共产党掌握政权，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种主观意志的冲动，这种冲动使我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空想社会主义虽然也存在了几百年，但是对社会的冲击力并不大，也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现实社会主义的空想萌动又表现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虽然两者存在诸多差别，但它们的“空想”特征和根源又非常相似，都是因为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人为地割断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没有充分估计实现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现实社会主义的“空想”萌动，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挫折，但我们也从这些挫折中获得了启示：只有用世界历史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大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认真把握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任务，才能告别“空想”，保证社会主义实践不偏离科学的轨道，才能使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成为大家都能感受到的现实。

[①] 1958 年，中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什么试验，只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的特点叫“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将原来较小规模的合作社合并成几千上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将合并进来的合作社，不论其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一切财产上交，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并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包括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种用心不可谓不好，但很不负责任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中国农业往后 20 年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9-140 页。

第二章　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

§2．1　大事记

19 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出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欧洲一些最发达的国家尖锐化了。但同时欧洲还有许多国家面临反对封建势力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1848-1849 年欧洲大陆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动摇了旧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反对资本压迫和封建专制，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积极斗争。马克思恩格斯也就在 1845 年前后完成了从难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并作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开始进行活动，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活动是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844 年，马克思在巴黎撰写研究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手稿（《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德国哲学的“异化”概念来分析社会关系，把它同私有制的统治及其产生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异化劳动包含四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化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其次，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工人的劳动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工人在劳动中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再次，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却成为仅仅维持他个人生存的手段；最后，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一切异化、首先是劳动异化的基础和原因，又是劳动异化的结果。他的结论是，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结束异化劳动，克服异化才会消除产生私有财产的条件，并由此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论证了工人解放包含着普遍的人的解放。

1845-1846 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们阐明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揭示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同现存的交往形式发生矛盾，这

个矛盾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已经变成桎梏的原先的交往形式被一种新的、与更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所取代；这种新的交往形式一旦不再适合发展着的生产力而成为桎梏，就又通过革命被另一种更进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引起历史上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更替，它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而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结论。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要废除私有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和阶级本身。为此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私有制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和阶级统治将消失；随着阶级和分工的消灭，城乡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将消灭，劳动将变成自由人的真正的自主活动；个人的才能将得到全面发展。

1847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接受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要求，加入了同盟，并协助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6 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上决定更名，并通过了由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恩格斯又在《信条》基础上写成《共产主义原理》，以问答形式回答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工人运动运动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等一系列问题。1847 年 11 月底 12 月初，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篇正式纲领，这就是《共产党宣言》。

1848 年，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发表。《宣言》以唯物史观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出自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来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资产阶级产生、发展的过程，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大大超过了以往整个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本身的作用在客观上也为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准备了条件。《宣言》论证了无产阶级充当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受压迫的劳苦群众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最重要条件。《宣言》奠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础。强调指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改造社会的必要条件。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宣言》规定了党的纲领和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在夺取政权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逐步改变所有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宣言》还提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宣言》表明，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

来；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之间的团结和协调；最后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

马克思恩格斯参加了 1848-1849 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失败后即对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发展和完善了自己的理论。在《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中，马克思分析了 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因、性质和进程，阶级力量的对比，各个阶级的作用以及导致革命失败的因素，并形象地把革命形容为“历史的火车头”。文稿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某些场合可以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乃至资产阶级自由派结成暂时的联盟，但必须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特别指出无产阶级关心的是革命过程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1852）中，恩格斯以丰富的材料分析了各个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证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不可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中，马克思用法国至路易·波拿巴政变上台这段阶级斗争历史检验了他发现的历史运动规律，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要“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国家机器。

1852 年，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信中阐述了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社会创造者的历史作用的学说，指出他自己对阶级斗争学说增添的新内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1850 年代后期，马克思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是他拟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一个总导言。《导言》从唯物史观出发，精辟阐述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指出了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历史阶段性，并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生产。马克思还专门讨论了政治经济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并对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马克思阐释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重要原理，

把生产关系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分出来，指出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并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特别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用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很好体现了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

随着欧洲工人运动的高涨，各国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也在加强。1864年，无产阶级第一个群众性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通称**“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积极参加了第一国际的创建，并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为了使这些文件能为当时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派别的代表所接受，它们只是一般地阐述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目的和方法）。马克思还与恩格斯一起同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并帮助创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69）。

1867 年，凝聚马克思多年心血的**《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指出，《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其研究方法是唯物的辩证方法。他还讨论了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阐释的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

《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研究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阐明了商品和货币的基本原理及劳动价值论；论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价值增殖和资本积累等问题，指出资本是一种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特殊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并进而揭示了资本关系的产生、发展直到灭亡的趋势。这就系统地揭露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它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发展；与此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

级队伍也越来越壮大。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将被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将要敲响。

经过恩格斯修订，在马克思身后发表的《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1885）除了研究单个资本的运动（资本循环和周转过程）以外，还研究全部社会资本的总和，研究整个国家许多资本或全部资本彼此并存和运动的条件。这里，对资本和产品在价值方面的研究又必须有对社会总产品在物质组成方面的考察来作补充。马克思在批判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关于再生产的重要结论，这个结论深刻地表明，社会总产品是否能顺利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各生产部门是否按客观的比例进行生产和交换。《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1894）分析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表明利润和剩余价值实际上是一回事，但在这种转化形式中，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存在的秘密被掩盖了；进而分析了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以及各个资本由于部门内部竞争和部门之间的竞争而形成平均利润的具体机制，从而说明了生产价格。在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这个规律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并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还详细讨论了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以及生息资本，地租等问题。

1871 年 3 月，巴黎无产阶级举行了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巴黎公社**，这是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统治的第一次英勇尝试。公社被镇压后开始了工人运动广泛发展和巩固、为向资本主义进行新的冲击作准备的时期。1870 年代末，在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成立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科学社会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时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想抬头，“左”倾的、无政府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思潮也有所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与这些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871 年 6 月，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马克思三易其稿撰写的**《法兰西内战》**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发表。《内战》叙述了巴黎公社 72 天的实际活动，分析了公社产生的历史条件，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公社的经验证明了马克思早先提出的无产阶级将在未来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结论，证明了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马克思从公社的政治结构和活动中看到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用什么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指出，无产阶级国家是崭新的民主国家。公社代表和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它由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组成，在其整个活动中依靠劳动群众。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性

质在于：一切权力机构和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武装力量和国民自卫队按民主原则建设和组织；由选举出来的法官、公社的官员来代替以前的司法机关的官吏。马克思认为，公社“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在论述工人阶级国家的民主实质的同时，他强调无产阶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国家政权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公社力求达到集中和崭新形式的自主管理的统一，这种统一应当保证无产阶级的民主，保证人民群众实际参加国家管理。胜利了的工人阶级之所以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权，也在于无产阶级国家负有改造社会经济关系的任务。工人阶级不能简单靠法令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变革，而“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实际上这也就更具体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地位。

1875 年初，德国爱森纳赫派（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为了实行合并，共同起草了准备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讨论的纲领草案。随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对这个纲领草案进行了逐段批注，深刻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马克思明确提出未来新社会产生过程中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区分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并准确地规定了两个阶段的分配原则。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对消费品的分配只能实行商品等价交换，即按劳分配的原则；但尽管有了这种进步，生产者的平等权利仍然受到限制，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里马克思把生产力的发展、集体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看作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

1877-1878 年，为了批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恶劣影响的杜林体系，恩格斯发表**《反杜林论》**，这是一部总结和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产生直至那时理论成就的著作。它详细地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并把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在《引论》中，恩格斯概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理论前提；并第一次提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

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在社会主义部分中，恩格斯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和理论，说明了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理论表现的科学共产主义产生的历史规律性。恩格斯论证了资本主义崩溃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使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社会一旦占有了生产资料和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就为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由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创造了条件，为迅速发展生产力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并在生产和分配之间建立起和谐的相互关系。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劳动将从一种负担变成生活第一需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的对立将消灭；阶级差别将消失，国家将消亡，对人的统治将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家庭关系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教育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宗教将消失。由于这些变化，人们将成为自然和社会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的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反杜林论》的主要思想，通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这本小册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1880 年前后，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其初稿（1881）中，阐述了俄国村社的前景和历史作用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马克思研究了俄国村社的二重性，指出俄国村社发展的前途取决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但是俄国 1861 年改革后，公社的有利因素已经被削弱。因此，“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后来在《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明确地阐述了关于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思想。在这两封信中，马克思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说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只有对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找到理解事物的钥匙。

从 1870 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就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过渡，

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尖锐化了。19 世纪最后 20 年，由于资本主义各国斗争加剧，劳动人民的状况普遍恶化，无产阶级为未来的革命战斗正在积聚新的力量。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建立并得到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在加强，1889 年，新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即**“第二国际”**成立。科学社会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同时由于小资产阶级分子进入无产阶级队伍，由于工人贵族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机会主义倾向也在增长。

1883 年 3 月 14 日，马克思逝世，这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损失。此后，恩格斯担负起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使命，他为进一步发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以及从事马克思和他本人其他著作的再版工作；他为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战略和策略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与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运动中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 1884 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科学地阐述了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论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产生原因和阶级本质。恩格斯深刻揭示了私有制产生的过程，推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关于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私有制的观点，证明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联系的。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现代代议制国家也没有改变国家的阶级实质，它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

恩格斯在《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尖锐地批判了机会主义幻想，他指出，根据德国特殊条件，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和政治要求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因为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否定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认为这只有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才有可能。恩格斯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某些新现象，即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越来越为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进而为托拉斯所排挤，而托拉斯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为有计划的生产创造了可能性。

1892 年，恩格斯为他于 1845 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版写了一篇序言，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他指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就越不能采用它早期阶段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他还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必须节约时间和劳动，资产阶级也不再使用那种打小算盘的赚钱方法，而是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并且在与工人的斗争中学会了妥协。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也已经足以免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困苦，因此，“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恩格斯还提到，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了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利益，尽管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

1894 年，恩格斯为他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新版所写的跋中，进一步分析了 20 年来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他指出那种认为公社能够自动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层组织的想法是一种空想，“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恩格斯认为，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可以利用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残余，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西欧所遭受的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不过这只有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但恩格斯又指出，在他写这篇跋的时候，俄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俄国村社已经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如果俄国发生革命，就“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

1894-1895 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根据历史经验和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阐述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前景的思考。其中检讨了当年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他对以往的一切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作了原则的区别，指出后者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进行的，只能是真正大多数人的革命；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就必须进行长期而坚持不懈的工作。恩格斯认为，在建立议会制的国家，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普选权有重要意义。他要求在资产阶级合法的范围内利用一切可能来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巩固无产阶级组织并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但恩格斯并没有把普选权和参加议会这些形式看作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的主要斗争形式。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日益扩大，也出现了一些对于未来社会的僵化看

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凭空想和主观愿望来预测未来社会，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反对把社会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社会，强调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未来社会。“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马克思，1881）“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恩格斯，1881）“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恩格斯，1886）“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恩格斯，1887）“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1890）这些思想对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1895 年 8 月 5 日，恩格斯逝世，但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学说，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永远激励着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为实现伟大的理想，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2．2　科学社会主义的提出

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构想，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经过严密论证的理论体系，而且它指导着全世界劳动阶级改变现状的革命运动；尽管这个运动的表现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要求社会主义理论根据时代变化、本土条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创新，而这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之被称为“科学”的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

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的 300 多年时间里，所谓“社会主义”更多地以一种空想形式而存在。在早期社会主义者那里，既有对近代资本主义的控诉与诅咒，又充满了一厢情愿的、不无倒退色彩的理想主义。随着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者开始接过理性主义的旗帜宣扬自己的主张，他们承认资本扩张和工业化的巨大力量，并认为未来社会应该继承这些东西。

19 世纪中叶，科学思维已经代表欧洲先进思想的主流，近代科技活动不仅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发明，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了工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有力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们希望通过科学的认识，更加理智地安排一切，包括人的社会活动日益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当时，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尖锐的劳资对立，激发了无产阶级要求改变现状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用科学的方法考察资本主义进程，研究其社会替代方案，也成为一代人的追求。

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决定性进展，工业无产阶级逐渐成熟，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不仅需要联合的力量（包括建立自己的组织），也更加需要理论的指导，与早先的社会主义学说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不再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的一般道德批判，而是把社会主义理想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这就从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广大劳工的信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他们的学说不是用理想去代替现实，而是把理想当作现实发展的结果；不是要现实按照头脑里设想的原则去发展，而是要头脑根据现实去确定原则，并依靠现实所提供的物质力量去实现这些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理想与现实条件结合起来，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构想的社会主义才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提出基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

值学说。

唯物史观从现实的人出发，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①]这种历史观表明“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②]进而阐发了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它们的矛盾运动使社会发展呈现为社会形态的更替和演进。“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③]

但是要寻找资本主义走向衰亡的原因，还不能满足于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探讨，而必须到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④]问题是，资本的增值或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转化（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生产总过程），它同时受到两种限制：一是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资本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即一边是为数很少的人的财富积累，一边是为数众多的人的相对贫困，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二是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又要受到现有等价物的量（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正如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消费，产品作为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生产，资本的生产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是对立的，总体上没有实现所有剩余价值的“剩余等价物”，这就必然导致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这两个限制都是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能力的限制，而资本又力图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突破这些限制，但每一次这样的“创造性破坏”都使资本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⑤]而且这种限制正是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

>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1-10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84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463 页。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即生产资料投入比劳动力投入相对增长，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其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因此，一方面，在资本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相对地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又越来越多地排斥以前雇用的工人。用这个眼光考察世界范围（而不仅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运作，发现情况就是这样，只是表现形式更丰富，更多样化

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①]

正是由于“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社会主义才变成了科学。[②]所谓“科学的”，意味着一种研究方法。马克思说他希望以《资本论》一书“为我们的党争得科学上的荣誉”；恩格斯在谈到《反杜林论》时指出这是一部科学著作。他们认为以往的社会主义都是情感的、道德的、凭空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③]“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④]所谓“科学的”，又要求人们用事实来证明它提出来的判断是否正确，是否经得起考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⑤]科学的东西不能保证自己一贯正确，但可以通过不断纠错、不断创新，以实现自己的不断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表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⑥]资本主义具有历史的进步作用，但它不是永恒的社会形态，当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化程度超过了它所能容纳的时候，就必然要被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国际性的事业，“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否则，“（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⑦]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只有

了，也就是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它将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失业和贫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68-269 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4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9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63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26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21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6 页。

在这样的社会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①]私有制条件下强加给个人的社会分工因此而日益变得不合理，“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②]

社会主义既是理论，也是运动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提出的。“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③]它表达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要求改变现状的政治意愿，“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这种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⑤]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始终关注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并置身于这种运动，不断总结经验，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

> “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⑥]

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1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1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7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60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10-211 页。

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①]马克思恩格斯还从不同角度，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作出了一些概括：

——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所有社会主义运动“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②]社会主义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③]如果说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那么“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④]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⑤]

——社会成员共同形成一个“联合体”。“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就终结了。”[⑥]无产阶级在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⑦]到了那个时候，“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的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⑧]。

——有计划的生产。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⑨]社会将按照一个统一的计划来协调和配置生产力，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⑩]

——消灭商品、消灭货币。在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用在产品上的劳动，“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11]价值规律将不再起作用，商品、货币关系当然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当然，这一切必须有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3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0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69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9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22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30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94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74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57 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926-927 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03 页。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是从商品的一般性质出发的，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甚至把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与市场（商品）经济的规律相提并论。在他们有关未来社会的构想中，没有市场经济的地位。

这是未来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更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②]

——按劳分配的原则。未来社会的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获得特殊的经济利益，但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由于还存在社会分工，劳动仍然具有私人性质，因此“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③]只有到了个人全面发展、生产力增长使“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④]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⑤]这个解决又有赖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一方面，人们不再把劳动仅仅看作是谋生的手段，另一方面，劳动又给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机会。而最能概括这个未来社会的精神的，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⑥]

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拒绝对未来社会的具体情况提供什么“预定看法”。他们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⑦]他们反对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⑧]这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⑨]譬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1847）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①]但 1848 年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局势使他感到这样的革命并非指日可待。“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9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0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05-30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20 页。
⑥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730-731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643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676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7 页。

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②]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对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④]他还区分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⑤]还要实行按劳分配。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正如列宁所说，“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⑥]

阶段有差别，各国国情也不同，“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做法，对另一国家可能是绝对行不通甚至是有害的。”[⑦]列宁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⑧]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经常告诫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⑨]邓小平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曲折性，“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41 爷。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12-51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69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14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04 页。
⑥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3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87 页
⑧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4-275 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①]时代不同了，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今天的社会主义必须更加重视时代性和本土化，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内涵加以发扬光大。

关于“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1870 年代以后，欧洲工人运动处于一个低潮。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像当初预见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激化，并随即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资本主义也在通过自身调节具备了某种渡过难关的能力。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晚年比较关注历史学和人类学问题，做了大量笔记，酝酿了后来被称之为“东方社会理论”的内容。[②]他在研究了亚细亚农业公社、日尔曼公社和古希腊罗马公社的区别及其不同的发展道路后，认为东西方社会形态各有殊异，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并不单纯是直接必然的决定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除依照生产力的要求建立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还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而相结合；生产力的发展也不一定在单一的社会形态内部实现，而可以借助交往和交往的不同形式来完成不同生产力的积淀和聚合。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注意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和途径。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阶段，但必须占有资本主义生产的积极成果。

1877 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表达了俄国有可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思想。1881 年，马克思在答复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前景咨询时，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 “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于这种大农业。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③]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借助于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揭示异化和私有制的本质；只有借助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条件，才有可能克服异化和私有制。东方国家（譬如俄国）拥有强力维护土地公有制的传统，它把分散在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2 页。

② 但对马克思晚年是否真的形成了系统的“东方社会理论”，人们一直有不同看法。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70 页。公元前 321 年，意大利中部山区部落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峡谷击败罗马军队，迫使罗马军人通过由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这被认为是对战败者的最大羞辱。以后“通过卡夫丁峡谷”就比喻遭受奇耻大辱。马克思则用以形容蒙受灾难和波折。

辽阔土地上的孤立的农村公社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兴办公共工程的方式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正是农村公社的存在，为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提供了契机。但随着新的历史环境的变化，农村公社不再是孤立的了，它与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市场发生了复杂的联系。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促进了世界性的交往，使东方社会能够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正是这些积极成果，又为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提供了现实条件。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强大影响，内部私有制的因素都在促进农村公社的瓦解，因此“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①]只有社会革命，才能肃清从各方面袭来的破坏性影响，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也只有社会革命，东方社会才不致沦为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边缘国家。马克思在最后定稿的复信中，作出了“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的论断，[②]也主要是针对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而言的。

稍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第二版，更加明确地阐明了关于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思想，他们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③]这些分析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一切国家。恩格斯在一封信（1882）中又指出：“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作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完全自动地跟着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④]再往后，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中认为，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俄国就“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⑤]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只有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它们“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70 页、第 77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7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649 页。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43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43 页。

这样，晚年马克思恩格斯以俄国为典型，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设想：它们可以利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但是，这种“不通过”仅仅是指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指不要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恰恰相反，实现这种“不通过”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只要这种“不通过”成功了，那些国家才能免遭“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①]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必须走同样的发展道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所处的环境条件选择自己的道路。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尽管资本主义发展还很不充分，但当革命的形势和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都说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1867）中指出，一些落后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以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②]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的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成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③]只有这样，才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赶上并最终超过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把俄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格局中加以考虑，并以东方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步骤。这也表明他们始终把社会主义运动看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把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如果一些落后国家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那它也必须使自己成为世界革命的的一个环节，否则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人们不得不承认，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占优势的国际环境始终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正如列宁所说，防止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这也是“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④]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40 页。 苏俄十月革命走上的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所讲的“不通过”未可相提并论，一则十月革命前，俄国农村公社已经解体，二则苏联社会主义并没有充分“占有”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应该说他们也是想走出一条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因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账不能算到马克思头上去。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00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④] 见《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40 页。

§2．3　社会形态演进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充满了世界眼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与人类解放联系在一起的，也只有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意义上才能存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既是改变现状的实际运动，也是人类向往的新型社会形态，这个新社会既基于产生多方面需求的资本主义阶段，又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克服异化而占有人自己的全部本质，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产阶级“首先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①]这就出现了“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但他们同时又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③]伴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它的基本矛盾也必然放大，未来社会的新因素也就日益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起来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最终把世界历史推向更高的阶段。

近代大工业“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的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④]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最终将通过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⑤]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也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每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页、第7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3页。

人的存在。”[①]

既然“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它就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性概念。无产阶级要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②]这个阶级的解放具有人类解放的性质。“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③]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狭隘的地域性个人为世界历史性个人所取代。“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到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而世界历史的发展又是人类获得解放的条件，“每一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④]这就更加深刻地意味着世界历史与人的解放，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只有以人类解放为目的，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重要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社会，包括私有财产、私有制的“中介”作用，而是把共产主义看作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类从资本主义异化状态下获得解放，最终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展现。

> “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⑤]

共产主义“决不是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相反地，它们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是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⑥]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人的本质的复归和生成过程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本质所在，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9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0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9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74-175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75 页。

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①]

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就是指它作为人的本质之复归与生成过程的一个“中介”，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阶段。在马克思以前，小资产阶级（或小农经济）的空想社会主义在西欧留传了几百年：从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国”和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到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再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主义。到了马克思时代，“行会式的工业组织和宗法式的农业”在欧洲社会仍占有相当优势，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仍然很大。马克思批评了“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②]这种共产主义“只会有贫困的普遍化”，“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马克思恩格斯还嘲笑“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以歪曲的形式再现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缺陷，又在德国市刽头上“加上一种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他们坚定地认为“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必然为交往的扩大而消灭。[③]

在马克思看来，以往共产主义的局限性一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否定人的个性，追求“平均主义的完成”；二是试图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为地废除国家，但又“总还是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这些局限都“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没有看到“私有财产的历史必然性”。特别是，根据历史的辩证法，“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④]这就是说，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指日可待的“目标”或具体的社会形式，而是人的解放和复归的现实运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去描绘新社会的蓝图和具体细节，他们提出的是这个新社会的一般原则、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改造现存状态的运动，旨在使社会关系重新归属于人的关系、为人所支配。“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1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18 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31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0 页、第 236 页。

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表述

早些时候，马克思恩格斯以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把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类社会所有制形式依次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加上当时的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及将取代这种所有制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马克思恩格斯讲到古罗马社会、中世纪社会，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而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中，马克思又以“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基本标志，“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①]1859 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系统阐发了唯物史观，并对有史以来的社会形态进行了总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而由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它必然会被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②]

在《资本论》序言（1867）中，马克思从社会发展的规律高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产生的必然性，“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一个社会“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人们才有所作为，“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③]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中也明确反对把他有关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反对“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看法。[④]这里已涉及社会形态的发展在各国表现的多样性问题。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形态的考察还是基于“世界历史”的立场，即各个国家、民族所组成的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而某些国家、民族的特殊发展经历则不能一概而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在这个世界历史的前提上，“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45 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00-10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41-342 页。

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家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①]也就是说，尽管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具有“铁的必然性”；但它在每一个国家的表现仍然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马克思还从人的发展角度论述了社会形态的演进。他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使人的本质具有各种表现，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创造着社会关系，从而也就不断发展自身的本质。社会关系的状况不仅规定和制约着人的活动，也关系到人是否能够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人们是在社会关系中获得了多方面的规定性，但其中最基本的是生产关系的规定性。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进各种社会关系的变革，而社会关系的变革，又必然影响到人自身的发展。因此，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社会发展又是促进人的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把人的发展与社会形态的变迁联系起来，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趋势。

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提出人的发展与社会形态的变迁大体经过三个阶段：

>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②]

第一个阶段，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原始社会，由于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就是最重要的，这种依赖关系也制约和决定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活动范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虽然提高了，但封闭的自然经济仍然使人们的交往受到很大的限制，奴隶和农民的命运始终被奴隶主和地主牢牢控制着，“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第二个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原则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开始打破了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制度，因此而产生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15-11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104 页 。在同一部手稿中，马克思还提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亚细亚的、古代的和日尔曼的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这三大社会形态。

性”。人对物的依赖取代了人对人的依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甚至也要通过与物的交换关系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的统治。”[①]在这种社会形态中，财富（物）被视为人从事生产的目的，它一方面使人的能力受到资本占有关系的束缚和物的统治，另一方面又为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②]

在马克思看来，“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③]但要使“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真正释放出来，就必须创造出适合这种发展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只有到了第三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才能摆脱对人的依赖和对物的依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这个阶段，消除了私有制和旧式分工，在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用在产品上的劳动，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也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④]

“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如果说，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⑤]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解放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

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社会关系的发展达到了某种全面性，人才能在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全面的活动，并获得全面的发展，达到自身的全面性，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29-3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39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108-10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57 页、第 760 页。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41 页。

只有在消灭私有制和旧的分工的未来社会才有可能。共产主义的理想，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来实现，这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1848）中所表明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作为“历史之谜解答”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中又指出，“自由活动”是“完整的主体”从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中产生出来的创造性表现，是把人自身作为目的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③]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称为“自由人联合体”，这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④]“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1877 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再次指出，共产主义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中提出并论证了“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的思想，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⑥]1894 年，恩格斯在回答友人要求他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时说，他再也找不出比《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话更合适的话了。[⑦]

共产主义既然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样的社会应该是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人的能力的极大发挥。

在私有制条件下，尤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同劳动者相异化，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而这些异化又造成了人与人相异化。“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9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1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39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42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33 页。
⑦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730-731 页。

的。”[①]消灭私有制，不仅仅是拥有、占有生产资料，而是重新建立人与世界的本质的、全面的关系，以“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在共产主义社会，旧的分工和社会关系对个人创造性的压抑将被消除，人们实践领域的拓展，将为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为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的活动的前提。脱离了社会关系的发展，任何个人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②]在阶级社会中，由于阶级地位、社会身份、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分工等方面的差别，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交往只能限制在狭窄范围内，而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个体发展了，社会才能真正发展，只有每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重要的是，这个新社会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③]人只有摆脱个体的、地域的和民族的狭隘性，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才能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也意味着人“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但“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④]旧的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⑤]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唤醒、发掘和释放个人的内在潜能，“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⑥]劳动不再仅仅作为谋生手段，劳动时间也缩短了。“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⑦]。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所喜爱的、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创造性活动，“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⑧]

当然，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⑨]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消灭旧社会的生存条件，消灭阶级、消灭旧的分工的物质基础；才能促进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实现社会制度的完善、社会形态的更替，使人的社会关系全面生成和丰富起来。人的全面发展，还取决于高度发展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9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5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14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43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第 225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33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第 36 页。

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任何发展的可能性”；[①]这就导致了人的畸形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除旧式分工和废除私有制。

人的全面发展还必须通过教育途径来实现。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人要获得知识、掌握生产技能，成为熟练的劳动者，“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②]工人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③] “教育将使他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④]

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教育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人们自身的实践活动才是人的发展的内部原因。没有个体的积极活动，就谈不上个人的任何发展。“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任何道德说教在这里都不能有所帮助。”[⑤]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⑥]“从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中产生的创造性的生活表现”。[⑦]

重要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一个不断增添新内容的过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终结，而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只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的人，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可能出现，那时“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充分地涌现出来。”[⑧]列宁指出，至于“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⑨]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2页、第1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5-29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8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5-306页。
⑨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页。

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①]

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②]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今天，我们营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但必须把这个要求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的最重要标准。

---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7-178 页。
②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 180 页。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国际实践

§3．1 大事记

1864 年 9 月，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在英国伦敦宣告成立。为声援 1863 年爆发的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英、法、德、意、波兰等国的工人代表于次年 9 月在伦敦马丁堂举行代表大会，并宣告国际工人协会正式诞生。马克思、恩格斯是第一国际的实际创建人和思想领袖。马克思亲自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两个历史性文件，确定了国际的纲领、任务和基本组织原则，它的成立和发展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后来形势的发展需要各国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国际这种形式已显得不适应。1876 年 7 月，第一国际在美国费城召开最后一次代表会议，通过马克思的提议，宣布第一国际解散。

1871 年 3 月 18 日，在因普法战争失败而导致法兰西民族危亡之际，由巴黎工人联合其他劳动者以及起义士兵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占领了陆军部、市政厅、警察局等政府机关，夺取了政权。28 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巴黎公社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摧毁资产阶级官僚机构，建立起立法和行政统一的国家机关，并实行民主制。在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勾结普鲁士的疯狂反扑下，巴黎公社只坚持了两个月终告失败。但是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

1880 年代，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政党普遍建立，各国工人阶级普遍要求加强国际联合。1889 年 7 月，世界各国工人党在巴黎召开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的诞生。第二国际初期，在恩格斯指导下，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路线。但恩格斯逝世（1895）后，第二国际分裂为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以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右派和“中派”逐渐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使第二国际有所蜕变。

1905 年俄国爆发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1-1903 年的世界经济危

机和 1904 年的日俄战争，使俄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1905 年 1 月（俄历）彼德堡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罢工斗争遭到沙皇政府的镇压，引发了全俄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6 月，黑海舰队“波将金”号水兵起义。10 月，罢工运动出现高潮，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号召无产阶级进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次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苏维埃”**（代表会议的意思），这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次“总演习”，为 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政党通常取名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采用“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以区别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表明无产阶级第一步是实现民主革命，第二步是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在恩格斯逝世后，社会民主主义逐步蜕变为右翼社会党的理论和策略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违背巴塞尔大会的反战宣言和决议的精神，从而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列宁号召革命左派同右派控制的党实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决裂。1920 年共产国际二大的文件规定，凡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更名为共产党，并修改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表明共产党、工人党与社会民主党分道扬镳。

1917 年 2 月（俄历）俄国爆发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1917 年 2 月，彼得堡工人举行全城总政治罢工，并响应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意思）党的号召进一步把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6 万士兵也加入起义队伍，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结束了统治俄国达三百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2 月 27 日晚举行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大会，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而俄国资产阶级在孟什维克（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成立了临时政府，从而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1917 年 11 月（俄历 10 月），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成功举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早些时候，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并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具体计划。这年 7-8 月，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11 月 7 日上午，20 万起义工人与士兵按照列宁的步署攻占了重要据点，并于深夜占领冬宫，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当晚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诞生。十月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开辟了世界无

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面临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胜利”的号召，并采取了一系列**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措施。1918 年 9 月开始对全部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并实行实物供给制；重申粮食垄断政策，采取余粮收集制；禁止私人贸易，对日用消费品实行配售制度，建立城乡间不通过市场的直接产品交换；还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原则，实行普及于一切阶级的劳动义务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苏维埃政府实行的。列宁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指出，实践证明，在一个小农国家里直接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生产和产品分配，犯了严重错误。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各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政治经济全面危机。在十月革命的号召和影响下，芬兰、德国在 1918 年、匈牙利在 1919 年先后爆发了革命，奥、英、法、意、美等国群众性罢工此起彼伏，形成了一次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这些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锻炼了他们的战斗能力，为各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1919 年 3 月，来自欧美 30 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社会党的代表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听取了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和《共产国际宣言》等重要文件，宣告共产国际的成立。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最高权力机关是世界代表大会，基层组织为各国支部。在共产国际存在的 24 年时间（1919-1943）里，一共召开了 7 次代表大会（都在莫斯科），领导过七十多个国家（地区）的共产党，而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指挥中心，在特殊时期发挥了特殊作用。但实践也证明，共产国际在许多问题上实际上成了苏共国际斗争的“工具”，而且在组织上过分强调集中统一领导，也不利于发挥各国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1921 年春，在深刻检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政治经济后果的基础上，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做出了转向**新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1）以粮食税制代替余粮收集制；（2）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途径（例如租让制和租借制）来恢复工业生产和振兴国民经济；（3）广泛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机制和商业原则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贯彻实施使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的预言逐步得到实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其深刻的方法论意义表明，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直接过渡”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1922 年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成立。

1924 年 1 月列宁去世后，苏共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在理论、政治和组织三条战线上展开激烈争斗，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多数派先后战胜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托、季、加联合反对派和布哈林反对派，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领导权。1929 年底，斯大林公开宣布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大力推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逐步形成。为保障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的继续推行，保障正在建立中的斯大林模式不受干扰，斯大林又掀起了一场政治大清洗运动，并于 1930 年代末达到高潮。政治大清洗运动使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进一步加强，也标志着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的最终确立。

1925 年 12 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并把国家工业化确定为党的总路线。从 1928 年到 1940 年，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起以重工业为主导、部门相当齐全的工业体系。此间共建成近万个现代化工业企业，工业产值增长了 5.5 倍（年均增长 16.8%），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了 9 倍（年均增长高达 21.2%）。这一“工业化奇迹”使苏联从原先的落后农业国变为世界工业强国之一，按绝对工业产量计算，苏联已跃居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与此同时，苏联也形成了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的畸形经济结构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

从 1934 年底到 1938 年秋，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布）中央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以基洛夫被害事件为导火线，开展了一场政治**大清洗运动**。1935-1936 年，用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罪名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成员处决。随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运动，大清洗的规模迅速扩大。1937-1938 年，内务部又审理了一些大案要案，包括以中央委员皮达可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洛茨基中心”案；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案；以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洛茨基总部”案。这些案件涉及的主要人员均以“人民公敌”罪名被判处死刑。在这场政治大清洗运动中许多无辜者遭到逮捕和杀害，出现大量冤、假、错案。苏共十七大（1934）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就有 98 人以莫须有罪名遭逮捕和处决。大清洗运动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给苏联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恶劣后果。

1936 年 11 月，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审查并通过了苏联第一

部宪法。经过 20 年的发展，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宪法的制定，把苏联社会的这种变化和社会主义成果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宪法明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 15 个平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按自愿联合原则组成，是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共分十二章，规定了苏联的国家性质、政治和经济基础、国家结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

1938 年 9 月，来自美、英、法、德等国 10 个托洛茨基派组织的 20 名正式代表在巴黎召开会议。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宣布**“第四国际”**成立。会议通过了托洛茨基起草的《过渡纲领》（全名为《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并组成“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作为领导机构，选举托洛茨基为“国际执行委员会秘密名誉书记”。第四国际先后在欧、美、亚多国建立支部，为实现托洛茨基“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激进主张而奋斗。

1937 年 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1939 年德国先后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36-1939 年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巴尼亚。德、日、意法西斯日益疯狂的侵略行径，不但激起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反抗，而且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闪电”方式向苏联发动进攻，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掀起了伟大的**卫国战争**。随着苏联参战和欧亚许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战争转变为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性质。由于包括中、苏、美、英、法在内的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抵抗，法西斯集团逐步转向退守，终于崩溃。1942 年 11 月至 1943 年 2 月。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成为二次大战的转折点。1943 年 7 月美英盟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1944 年 6 月美英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1945 年初，苏联红军和美英盟军分路攻入德国本土，5 月 8 日德国无条件投降。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8 月 14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同时也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现实的道路。

1944-1948 年，趁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东风和苏联力量的推进，中东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亚洲的越南、朝鲜等 9 个国家，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49 年 10 月，在亚洲和德国的原苏占区又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上苏联和早些时候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蒙古（1921），欧亚大陆出现了 13 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

到多国实践的历史性跨越。其后，又有古巴（1959）、老挝（1975）等国进入社会主义行列。社会主义国家人口约占世界总量的 1/3，领土面积占 1/4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标志着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也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支持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最重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也掀起了巨大的革命风暴，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这些国家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主要由两支力量构成：一是这些国家内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力量。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摧毁了万恶的殖民体系，先后诞生了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这些新兴国家逐渐凝聚成一支独立的国际政治力量，在战后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和影响。

1948 年 6 月，根据苏共的要求，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 年欧洲 9 国共产党、工人党成立的国际联络机构，1956 年终止活动）做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认为南共背叛了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应开除出情报局。而南共随即举行中央全会，通过了对情报局决议的答复。此后，苏联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并控制情报局做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这是苏共直接干涉别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粗暴侵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的突出表现。

1949 年 1 月，苏、保、匈、波、罗、捷 6 国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总部设在莫斯科）。经互会原为苏联东欧国家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后来扩展为不受地域限制的经济组织。阿尔巴尼亚（1949 年加入，1961 年退出）、东德（1950）、蒙古（1962）、古巴（1972）、越南（1978）先后加入该组织。经互会成立时宣布的宗旨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经济互助、技术合作和经验交流，但客观上却造成了这些国家与世界市场的隔离。随着苏联走上霸权主义的道路，这一组织也日益成为苏联在经济上控制那些国家的工具。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清除政治对手，担任苏共领导人。不久苏联即在全国范围开展对斯大林的批判，“非斯大林化”成为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赫鲁晓夫还发动了以农业改革和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恢复和健全法制、精简政府机构和改进苏维埃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对外政策的调整和改革。**赫鲁晓夫改革**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有特殊意义，它的理论准备不足和盲干探索导致了这场改革的不彻底性、局限性和矛盾性等特点，而它的半途而废更昭示了社会主义改革将是一条曲折漫长的道路。

1955 年 5 月，苏、波、捷、保、罗、阿（尔巴尼亚）、匈、东德在华沙缔结《华沙条约》，建立**“华沙条约组织”**（WHO）。华约组织的主要机构是政治协商委员会、国防部长委员会和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总部设在莫斯科。该组织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建立的一个军事集团，曾在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维护欧洲及世界和平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也是苏联后来搞霸权主义的一个军事手段。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召开，有 55 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应邀出席。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和平共处，防止现代战争的可能性，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大会后期，赫鲁晓夫向全体代表作了由专门小组起草、经苏共中央讨论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及苏南关系问题上的严重错误，但这个报告对斯大林全面否定的态度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造成了很大混乱，而为西方世界所叫好。

1956 年 6 月，波兰波兹南工人要求减税和增加工资罢工，事态失控引发流血冲突。10 月，先前被撤职而复出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提出“波兰道路”，并着手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进入波兰要求举行两国会谈。波党领导人在会谈中要求维护民族尊严和主权，根据波兰自身特点进行改革，消除波苏间的不平等关系。苏共领导人只得悻悻打道回府。

这年的 10-11 月，匈牙利发生动乱，苏军两度进入首都布达佩斯。在这场由国内深刻的政治经济矛盾引起的大动乱中，全国惨遭杀害、伤残及外逃人数达 30 万之多，直接经济损失相当于匈全年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事件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瓦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这次事件有匈牙利人民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原匈党领导人的极“左”路线的背景，但后来被外国势力和国内少数极端分子所利用。**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1957 年 11 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与会，会议就当时国际局势和加强各国党之间的团结问题交换了意见，认为没有必要成立象第三国际和情报局那样的国际组织。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指出在和平过渡可能性的同时，还有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在争取“议会多数”的同时，也强调议会外的广泛群众斗争。《宣言》还认为社会主义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使帝国主义阵地大大削弱了。毛泽东在大会发言中作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形象比喻。然后 64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发表《和平宣

言》。

1960 年 6 月，苏共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向中共发动突然袭击。11 月，莫斯科举行 81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会议前夕，苏共向各国代表团散发了一份攻击中共的长篇信件，使会议几乎破裂。经过激烈的斗争，会议还是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告世界人民书》。中共代表团从维护大多数党的团结愿望出发，在声明上签了字。同时散发了 1957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阐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

从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开始，中苏两党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出现分歧并展开了内部争论。1963 年 7 月苏联《真理报》突然发表《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挑起了两党之间的公开论战，并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推向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从 1963 年 9 月到 1964 年 7 月，先后发表 9 篇文章评论苏共中央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苏论战**期间，苏共发表了 3000 多篇反华评论文章，大多数共产党参加了围攻中共的争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分裂，只有极少数党保持了中立立场。

1965 年 3 月，勃列日涅夫不顾别的党的反对，在莫斯科又举行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这次会议使国际共运从意识形态的公开大论战发展到组织上的公开分裂。从此，中国共产党不再承认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两党关系正式断绝。

1964 年 10 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在勃列日涅夫主事的 18 年中，因循守旧、求稳怕变的思想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政治体制改革不进反退，在许多方面又开始恢复斯大林时代的做法。在国际关系上，坚持帝国政治思维方式，假“世界革命”旗帜大肆推行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政策，并且加紧同美国的军备竞赛，极大地消耗了苏联的发展潜力。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表面稳定的假象之下，已经逐渐积累起大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并一步步走向全面僵化和停滞。这一时期实际上是苏联最终走向衰亡的转折期。

1968 年初，新上台的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主张建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掀起了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经济改革运动，表现出要求摆脱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束缚的倾向。捷共的行动也引起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极大不安，苏联在采取各种高压手段遭到抵制的情况下，于 8 月 20 日深夜，调动华沙条约国家（罗马尼亚除外）军队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借口

“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占领，扼杀了这场短命的改革。入侵立刻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苏联随即抛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主要包括“大国责任论”、“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及社会主义阵营“国际专政论”。

1969 年 6 月，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与会的有包括苏联在内的 75 个国家（地区）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国等一些党没有参加。大会拟议通过《反帝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及一切反帝力量团结的任务》等文件和纪念列宁百年诞辰的决定。苏共企图把它的路线继续强加给到会的各党，但由于在许多问题上无法一致，有的党对决议态度消极，有的党因持保留意见而没有签字，还有的党只在赞同的段落上签字。这次会议表明苏共的大党主义不得人心，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意识在增强。

1970 年代，美国由于侵越战争实力受到严重削弱，美苏的经济、军事力量对比至少在表面上出现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苏联开始公开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双方都想通过扩军备战在军事实力上压倒对方，它们不仅维持了和平时期最强大的军备军力，而且拼命研制包括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在内的各种新型武器系统，导致了一轮又一轮的军备竞赛。**美苏争霸**的范围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引发了大量地区冲突，但双方在发生剧烈利益冲突的同时，又都力图避免爆发直接的军事对抗以免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最后摊牌，因此冷战就成为美苏争霸的主要形式。苏联从输出革命到争夺世界霸权，走了一条与社会主义原则完全相悖的道路。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就修改了赫鲁晓夫有关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判断，而认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全部社会关系在社会主义内在和固有的集体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改造即将完成。社会主义规律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充分显示，社会制度具有有机完整性、蓬勃的活力、政治上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内部团结，是发达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苏联已形成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经过大张旗鼓的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被写入 1977 年苏联新宪法。但即便这个降低了调门的提法，也是一个自欺欺人，粉饰太平的幌子。

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上台，面对国内外严峻形势，提出了“除了改革，别无出路”的口号，要求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在经济改革受挫之后，戈尔巴乔夫把目光转向政治改革，试图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作为推进改革的动力。1987 年 11 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宣称，“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最充分地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这些命题引

发了苏联社会发展方向的大争论，苏共党内外出现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曾经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失当的改革战略和混乱的改革措施，激化了苏联国内长期积累的诸多矛盾，发展到使全社会陷于动荡和失控状态，并最终导致国家制度的剧变和社会主义联盟国家的解体。

1989-1990 年，**东欧剧变**。1989 年 1 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立场”的决定，恢复被取缔的波兰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波兰党宣布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实行总统制、两院制。6 月，在全国议会选举中，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执政联盟惨败。8 月，团结工会主导的联合政府成立。12 月，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宪法中关于统一工人党领导国家的条款，并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1990 年 1 月，波兰统一工人党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十一大）通过停止活动的决议。1990 年 12 月，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出任波兰总统。波兰是剧变的第一张骨牌，迅速在东欧国家引起连锁反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相继易手。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宣布实行政治体制多元化，共产党和工人党纷纷放弃或经过选举失去了执政地位，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也都经由修改宪法的程序加以取消。

罗马尼亚是在极短时间内通过流血冲突实现政权转变的。1989 年 12 月，罗政府镇压西部小城蒂米什瓦拉的抗议活动，但之后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时，军队公开抵制齐奥塞斯库的开枪命令，并与安全部队发生武装冲突。22 日晚，临时组建的救国阵线委员会宣布接管国家政府的一切权力。25 日，特别军事法庭秘密审判仓惶出逃的齐氏夫妇，将其处以死刑。随后救国阵线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转变国家体制的措施，在国名中删除了“社会主义”字样。1990 年 5 月，救国阵线在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

1990 年 2 月，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与苏、美、英、法四大国达成“2+4”方案，即先由两个德国讨论有关统一的国内具体问题，然后再同四大国商讨涉及外交、安全的外部问题。1990 年 7 月，两个德国结成货币联盟，西德马克一统天下。10 月，只剩下一个空壳的东德正式并入西德，**两德统一**。德国的分裂是战后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分裂的德国也是美苏对抗的重要场所；德国的重新统一，是两极格局走向崩溃的标志，对欧洲及世界格局的转变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1990 年 3 月以后，苏联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急剧膨胀，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三国先后单方面宣布独立。6 月，俄罗斯联邦宣布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其他加盟共和国纷起效尤，苏联中央政府的权力大大削弱。1991 年 4 月，戈尔巴乔夫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领导人叶利钦达成协

议，组成由 9 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加戈尔巴乔夫的“9+1”体制。同年 8 月 14 日，苏联公布新联盟条约文本，规定参加条约的各共和国为主权国家。为阻止这一新联盟条约的签署，8 月 19 日，苏联副总统等 8 人组成“紧急状态委员会”，但这一宫廷政变迅即流产。“8·19”事件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被拘捕，俄罗斯联邦下令停止苏共的活动。随后，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1991 年 12 月，占苏联人口 3/4 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明斯克会谈并签署“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接着又联合 8 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一系列文件，宣告苏联停止存在。12 月 25 日，在圣诞钟声中，戈尔巴乔夫辞去已经不存在的苏联的总统职务，飘扬了 69 年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低潮跌入谷底，如同苏联的成立一样，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同时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

§3．2 “一国胜利论”的反思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是一个很艰难的历史探索过程。这一历史过程，要求人们坚持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去指导实践，同时又在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列宁开辟的“一国胜利”理论进行再思考，也是希望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历程。

“一国胜利”何以可能？

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怎样发生和取得胜利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和认识条件出发提出过设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1847）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①]马克思则在 1872 年强调指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②]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先进的大国，而且是几个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其原因一、只有资本主义发展达到相当水平的国家，才真正具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经济条件与阶级条件；二、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发展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使每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重大事变都会迅速传递和彼此影响，而资本日益增强的国际性质也会使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结成神圣同盟来共同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是，历史却并未沿着这个方向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在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大决战的一幕并没有在历史进程中展现。

马克思晚年以一个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探索精神，在研究俄国社会未来发展前景时，揭示了一个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向新社会过渡的崭新课题。马克思认为，由于当时的俄国农村公社不仅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而且恰好处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断发展的历史环境中，因此俄国存在以农村公社为基础，“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可能性。[③]但是马克思在探讨这一“不通过”情景时，仍然坚持一定的社会形态必须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客观原则，反对俄国民粹派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空谈俄国农村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后来，恩格斯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进一步强调指出，要想使俄国农村公社成为有生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8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451 页。

力的新形式，必须有特定的先决条件，这就是“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①]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作为俄国革命运动的领袖，列宁极为关注并跟踪研究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变化。在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将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1915 年，他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首次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③]后来，列宁通过对二月革命后俄国日趋成熟的革命形势的分析，进一步把这个“一国胜利”的理论引向深入，认为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俄国，可以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前首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

列宁“一国胜利”理论的一个基本依据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这是他在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时所完成的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政治发现。列宁认为，在一般商品生产条件下即已存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后便呈现异常加剧的趋势。垄断组织形成，使生产和资本进一步趋向集中，生产和销售企业向巨型化方向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不受原有陈旧的固定资本的束缚，更多更快地采用先进技术，因而能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显然，列宁所揭示的，主要已不是资本主义列强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而是发展速度的不平衡，例如他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曾举例说明，1871 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日本则要比俄国快十来倍。事实上，到 19 世纪末，德国经济已迅速超过英国法国，居于欧洲第一，而美国经济则更是以跳跃式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欧洲各国，位居世界第一。

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及其所带来的帝国主义列强间政治经济实力对比的重大变化，会与世界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划分的原有格局极不适应，从而使重新分割世界的军事冲突和世界大战具有了客观必然性。帝国主义战争使大多数参与其中的帝国主义列强被严重削弱，对无产阶级而言，其结果就是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列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政治现象，它给无产阶级造成了一个极好的革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51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54 页。

命机会。

应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条件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的可能性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在象英国、德国、法国这样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工业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人运动中的保守主义倾向也在抬头。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成熟程度与经济成熟程度出现了巨大背离。这是因为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力量更为强大，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更加成熟，而且能够利用一部分超额利润成功培育出一个工人贵族阶层。正如列宁所说："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①]一战期间，正是在这些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一片"保卫祖国"的喧嚣声中，断送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好契机。

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典型的就是俄国，则成了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聚集点，因而也就成为资本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环节"，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并已空前成熟。列宁指出，这种革命形势成熟的鲜明特征是：

> "（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②]

除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成熟，俄国还同时具备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充分政治条件。俄国比之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更具备用革命方法来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现实力量。因此，"一国胜利"的光荣就历史地落在列宁所领导的坚强的俄国无产阶级身上，这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事情。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之争

尽管通常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学说分别概括为"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但实际上，两者更深层次的理论分野是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在哪一种类型的国家发生并取得胜利，进一步地，也就是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物质和阶级条件相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对欠缺的国家是否存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列宁“薄弱环节”说的理论价值是终于找到了解决上述问题的突破口，但这一理论在论证象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一国胜利的可能性时，侧重分析的是当时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相对成熟的国内政治条件，因此其理论说服力还不是足够充分的。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被日益紧迫地提上议事日程，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①]之间就爆发了关于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经济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的激烈争论。这一争论，无疑使有关“一国胜利”的讨论深化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沙皇俄国在废除农奴制度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随着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过程的加快，一部分行业的垄断组织迅速成长起来，并且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而另一方面，与西欧、北美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则仍然是一个落后、贫穷和野蛮的国家，经济中残存的封建农奴制和政治上的沙皇专制制度，严重制约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许多重工业部门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农业占据国民经济的主要地位，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

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情出发，普列汉诺夫对于列宁把俄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表示了强烈质疑和坚决反对。普列汉诺夫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须具备的经济和阶级条件。他说：“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①]

在马克思看来，在一国的生产方式还能促进该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成为它的障碍之前，是决不会退出该国历史舞台的。普列汉诺夫就以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观点作为他的立论依据，认为并非任何时候都能由一种较低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一种较高的生产方式，其中也包括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他由此推论说：“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那个高级阶段，那末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②]

普列汉诺夫具体分析了当时俄国资本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他问道：“我们有没有根据断言，我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也就是说，它达到了这样一个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不能再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

[②]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60-461 页。

[①] 普列汉诺夫（1856-1918），俄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也是文艺理论家。他是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后来不赞成列宁和布尔什维克。1917 年二月革命后回国，以条件不成熟为由反对十月革命。但革命胜利后，拒绝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② [俄]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121 页。

③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 24 页。

相反，而是阻碍它的发展呢？”他自己的回答是：“俄国不仅吃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发达的苦头。”[③]普列汉诺夫还认为，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雇佣工人在俄国居民中只占少数，因此无法成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指出，在不具备必要条件时，超前实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可能造成的严重经济和政治后果。从经济上看，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生产要求国家把那些生产率低下的企业“归公”，但国有化本身并不会自然提升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化程度，国家也无法提供比工人创造的更多的产品。因此，面对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大量的企业将会陷于倒闭，这对更广大的工人而言，无异于是“组织饥饿”。而“‘组织饥饿’的必然后果就是残酷的经济危机”，因此，这样的变革，不仅不会使生产力提高，反而会由于经济混乱而使生产力下降，造成“最大的历史灾难”。[①]从政治上看，由于俄国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只占少数，广大群众并不能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活动，因此要想按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社会和组织生产，就只能在“家长专制共产主义”的形式中寻求出路，其结果是由一个社会主义者的阶层来取代旧制度的帝王和官员，从而造成“东方专制主义”的复辟。

那末，列宁是如何看待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物质经济条件呢？又是如何回答普列汉诺夫等人关于“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合时宜”的诘难的呢？列宁实际上也认同“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说法，指出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②]但他强调，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要不要“客观前提”的问题，而是当革命形势已经来临的时候，无产阶级应不应该夺取政权的问题。列宁认为，应当把走向社会主义和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区分开来。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一个国家，是在小农的汪洋大海中进行活动的，这就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但他同时指出，俄国资本主义又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并正在加速向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而社会主义不过是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前迈出的最近一步，因此，俄国有理由实行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实际步骤。

更重要的是，列宁明确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成熟了。而俄国同时又具备了最充分的革命形势和革命的主观力量，这就给俄国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革命机会，这一革命可以“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 22 页。
②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 121 页、第 464 页。
③《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版，第 777 页。

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①]

对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之争的是与非，最终应由历史发展的实践来加以检验和作出评价。事实上，正是在列宁“一国胜利”理论的指引下，才使社会主义从一种科学的社会理论转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进而从一国实践发展到多国实践，在众多国家实现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

但也必须看到，随着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迅速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普列汉诺夫所警示的各种政治经济后果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反复出现，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其中原因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和深刻反思的。

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时曾经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①]这里他所指的是，十月革命是在俄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场具有特殊性的革命。然而后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无一例外地都出现在经济文化相对甚至绝对落后的国家，这就是说，俄国特殊条件下的革命事变已经被赋予了一种普遍的性质，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则有可能被忽略，而其被忽略的后果则会在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表现出来。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没有通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这个行动毕竟只是社会制度上的跨越，并不意味着在经济上已达到并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水平，在文化上已充分吸取并超越了资本主义的优秀文化成就，因而还完全谈不上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跨越。就此而言，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国胜利”，但却不能跳过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文化基础。这个基础如果没有来得及在走向社会主义前准备就绪，那就必须在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之时立即着手来创造。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充分认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物质文化基础的“不够格”，不能从实践上化大气力去解决因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跨越而造成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历史落差，而仅仅满足于对生产关系形式既有的变革，那就势必给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造成一系列的问题、矛盾和困难，甚至引起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波折。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77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776页。

“新经济政策”得与失

列宁毕生最为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关于社会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有关重要思想就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建党建国学说。对比来看，列宁的这些学说既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有别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想法。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对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但同时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最终目的，“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在谈到国家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既看到了国家的暴力性质，也认为国家作为各种社会权力平衡的结果，反过来又会对社会权力起制衡的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列宁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那里更多吸取的是其中“暴力革命”、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例如他在《国家与革命》（1917）一书中明确说：“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②]按照列宁的思想，取代旧国家的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取代旧民主的必然是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在他看来，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完全是合二而一的东西，因此，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民主，都应该体现为一种权力的集中。只有把权力集中起来，才能集中无产阶级的意志，巩固无产阶级的统治，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那末，又由谁来代表无产阶级的意志呢？对此，列宁特别强调必须建立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③]问题是，列宁的国家和建党理论的内在逻辑在实践中是否导致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国家是一个需要集中管理的大工厂，而管理的权力应集中于国家，最终集中于无产阶级政党。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尽管列宁在当时的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更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强调高度集中和严格纪律的必要性，并试图通过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他并没有将这些理论凝固化，而是坚持从俄国的国情出发，不断探索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方式和途径，实现了从“直接过渡”到“间接过渡”的重大思想转变。

自 1918 年夏季起，从直接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出发，加上俄国处于严重的战争状态，列宁开始全面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历时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4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47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130 页、第 139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10 页。

三年。当时列宁认为，俄国可以在短时间内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从而直接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制度。但实施这个政策的直接后果是苏维埃俄国很快就陷入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到 1920 年，俄国的工农业产量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整个国民经济已陷于崩溃。同时，广大工农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开始滋长，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正在削弱，社会的各种危机却不断增强了。后来列宁坦率地承认：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①]并且它比内战时“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②]

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列宁于 1921 年春作出了转变政策的果断抉择，在苏维埃俄国全面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之“新”的主要内容包括：（1）以粮食税制代替余粮收集制；（2）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途径（例如租让制和租借制）来恢复工业生产和振兴国民经济；（3）在广泛领域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机制和商业原则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新经济政策是从转变粮食政策开始的。列宁在俄共（布）十大的报告中指出，粮食税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对待农民的态度，而这两个阶级的关系决定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他把粮食税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的必要性和目的就在于尽快地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满足小农对于粮食“周转自由”的正当要求，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只有经过这种方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③]随着粮食税制的实行，国家垄断的产品交换制也被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所取代；而商品交换又不可避免地越出地方周转的界限，这一事实使列宁进一步认识到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经济必须以市场、商业为基础。“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后退一些的境地，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④]

把市场、商业作为联系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小商品经济的主要形式，在国家调节的基础上给私人商业以充分的活动自由。这是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上第一次把市场、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提到十分突出的地位。

1921 年 7 月以后，新经济政策开始从农村经济扩展到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列宁明确要求必须在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成份中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

---

① 《列宁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25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75-576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07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225 页。

则，“现在不但允许而且还发展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①]

至此，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已基本成型，那就是：无产阶级国家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并利用国家调节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把小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统一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来，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 “目前我们踏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②]

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经济改革，它不仅使苏维埃经济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恢复性发展，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俄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一国胜利”后的俄国国情有了清醒的认识，初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令人费解的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才一年就取得了显著成效的情况下，1922 年 3 月，列宁却郑重其事地宣布：我们已经退了一年。“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①]根据他的提议，俄共（布）十一大确认必须向私人资本主义所作的让步，应以过去一年内实行和规定的所有措施为限。因而，退却已经结束，当前的任务是重新配置力量，以保证切实贯彻党的政策。

“停止退即”的决定反映了列宁本人对新经济政策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认为这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的全新认识；但另一方面，他仍然把新经济政策时期私营商业的发展，一部分国营企业的出租，农民剩余产品的自由买卖看作是资本主义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危险”。1922 年 3 月，列宁在一封信中写道：“以为新经济政策将结束恐怖的想法，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我们将会回到恐怖，回到经济恐怖。”列宁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前景仍然抱有怀疑态度，以至于准备还是要重新回到“经济恐怖”的。“这至少说明，到底是通过新经济政策来全面更新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与政策，还是把新经济政策作为‘暂时退却’，然后重新回到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直接过渡’，列宁并未作出最终的明确选择。”[②]

[①]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36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0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85 页。
① 见资中筠主编，冯绍雷、刘靖华、陈乐民著；《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下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64 页。

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新经济政策，再到新经济政策被中止这个曲折过程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包括对“一国胜利”理论进一步的反思。俄国实现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有待于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落后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需要对自身“先天不足”的经济文化条件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并把它当作一个基本国情来认真对待，使之成为制定建设社会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应该看到，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之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两个基本环节，是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从互相区别的角度看，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物质条件并不相同，因此不能简单否定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但从互相联系的角度看，落后的物质条件必然会给这些国家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事业设置巨大的障碍，而成为它们顺利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制约因素。因此，获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理应在清醒看待“一国胜利”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发展道路和发展形式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由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较低的历史起点上发生的，就必须认清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阶段性和艰巨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又要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避免混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而犯盲目过渡，急于求成的错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顾俄国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约，强行实施向完全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就必然要遭到失败。在这个意义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就是简单演绎“一国胜利”论的一个结果。而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则表明，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经济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采取“间接”、“迂回”的办法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而那是因为“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①]显然，这里已经包含了列宁本人对“一国胜利”论的某种反思。

新经济政策很快被中止则表明，俄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巨大的反复。在斯大林时期，“一国胜利”论被进一步演绎为落后国家可以通过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径自直接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样就把“一国胜利”论引向了极端。其结果，不仅没有缓解落后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深刻矛盾，即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生产和改造社会与这些国家落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反而放大和加深了这种矛盾，这不能不说是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动荡的深层次原因。

---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720页、第796页。

§3．3 “斯大林模式”批判

“斯大林模式”是在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个经过较长时间运作并且真正“定型”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模式的内容涵盖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个层面，涉及到斯大林执政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理论、运行体制和相关政策等等，具有相当完整的体系。而且因为这个模式为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模仿照搬，影响广泛而深刻。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并非完全贬义），关系到 20 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经验总结，也关系到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评价。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及其效应

所谓“斯大林模式”发端于 1920 年代末，直接起因于导致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体制转轨的多种客观因素，而从主观方面来看，则实际上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对新经济政策在理论上出现摇摆，在实践上加以否定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也反映了苏共领导层在当时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重新选择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强烈意愿。

列宁去世以后，苏共党内爆发了一场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在前一个问题的论战中，斯大林联合布哈林，取得了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胜利。[①]针对托洛茨基等人怀疑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斯大林分析了苏联所面临的内部外部矛盾，强调苏维埃政权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这些矛盾，并且也已经在克服这些矛盾，因而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取得完全胜利，谁不相信这一点，谁就是取消主义者。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陷于停顿，而苏联又面临重要转折的关键时期，斯大林捍卫并发展了列宁有关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坚定苏联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其后不久，在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斯大林又与布哈林发生了尖锐的理论冲突。现在看来，布哈林还是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俄国的落后国情，他认为必须通过新经济政策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提出小商品经济和私有经济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主张国民经济各部门应保持平衡发展，反对用损害农业经济和农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办法来换取工业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布哈林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列宁新

[①] 布哈林（1888—1938），苏共和“第三国际”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流亡国外期间从事理论著述和工人运动。十月革命时是领导莫斯科起义的核心成员。曾长期任《真理报》主编，也是 1935 年苏联宪法主要起草人之一。后被指控组织“右派与托派联盟”阴谋集团，遭逮捕并开除党籍，1938 年被以叛国罪处决。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革命家，也是军事家、政治理论家，早期追随列宁，在十月革命期间担任苏俄党政军重要职务，后来因反对斯大林，主张世界革命而被开除出党，遭到流放、驱逐。1938 年，与支持者创建了对抗共产国际的“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1940 年在墨西哥遇刺身亡。

经济政策的理解。而且布哈林也承认“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将非常缓慢，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①]

但在斯大林看来，这种乌龟爬行式的建设速度是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的苏联绝对不能接受的。斯大林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新的发展阶段的建设方针：加速工业化。这一方针的全部理论依据在于：一、为使苏联尽快摆脱落后和挨打的局面，“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二、只有加速发展工业化，才能获得“在集体制基础上改造农业的钥匙”；三、社会主义越是接近胜利，国民经济中的阶级斗争就愈加激烈，加快工业化进程则可以有效地限制、排挤直至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这场激烈论战中，斯大林充分利用了苏联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落后面貌，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愿望，以“赶超”理论、“高速发展工业化”理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和转移、剥夺农民剩余产品的“贡税论”，反对布哈林的“落后型社会主义”理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和“综合平衡”的经济理论，取得了论战的胜利。要么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中坐以待毙，要么集中一切可能动员起来的力量和资源加速工业化，斯大林就是用这种“两者必取其一”极具震撼力而又简单明了的判断方式要求苏联人民作出选择，而这也正好能够激发起苏联社会普遍存在的强烈忧患意识和赶超意识，斯大林的建设方针因此而得到了苏联党和社会的广泛拥护。

如果说，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意义主要体现于能否在政治上树立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那么，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则更加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导意义，关系到以一种什么样的模式来组织社会主义建设。这场论战就这样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斯大林的建设方针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实际上宣告了苏俄将彻底放弃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期大林模式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苏联高速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大规模实施是斯大林模式基本形成的主要标志，在“两化”过程中，斯大林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相应的一整套管理体制也集中反映了斯大林模式的特征和全貌。1925 年苏共（布）十四大刚刚揭开序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不久即驶入快车道。按照斯大林工业化即“重工业化”的指导方针，苏联以特殊的手段、超越的速度走上一条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常规工业化道路。与此同时，为了解决高速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积累问题和农业本身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苏联从1928 年起运用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突击完成农业集体化。

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和发展，苏联在短时间内迅速建设起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完整工业体系，实现了农业全盘集体化，完成了由落后农业国向世界工业强国的转变。但是，在另一方面，斯大林把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①] 转引自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9 页。

当作彻底消灭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手段，因此在“两化”过程中实行了完全限制、排挤乃至消灭私人经济的政策。1936 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称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苏联经济生活的根本变化就是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留下的只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

除了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还推动国民经济的运行和管理体制迅速地走向集中。苏联实施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加速工业化方针，意味着必须急剧地改变落后农业国的传统产业结构，在产业发展序列上实行大幅度的跳跃，需要有高度倾斜的政策措施给予支持，并以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加以保障。而且，由于是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开展工业化建设，集中稀缺的资源来保证重点项目和部门的发展，就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这也促使政府对国内的全部资源实行集中控制和直接调拨，从而大大强化了以指令性计划为核心，以高度集中和行政强制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模式。

到 1936 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时，苏联社会已确立了“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而集体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低级形式，也必须向高级形式的国家所有制过渡。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非公经济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单一所有制结构的基础上，国家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经济环节，实行全面的高度计划管理，政府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实行排斥市场机制的计划控制。经济增长率、产品种类，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配置方式，一概都由中央计划机关最后拍板来决定。在苏联的经济生活中，计划经济的运行和政策目标的实现都依靠纵向管理的行政机构、行政手段和行政力量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来达到。

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形成的同时，苏联的政治体制也加快了走向高度集权的步伐。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曾提出苏维埃机关必须加强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在执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又反复强调与经济调整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的紧迫性，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①] 尽管列宁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过一些设想并抱有很高的期望，但这些设想其实并没有落实。

随着新经济政策转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加之苏共党内斗争不断异化，政治领域内本来就不甚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愈加受到削弱和破坏，集体领导制最终变成了由极少数领导人掌握无限权力的个人集权制，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由斯大林个人一锤定音。在斯大林的绝对领导之下，逐渐形成并强化了一党独存、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领导体制，实行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73 页。

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民主选举制名存实亡，各种社会团体的作用明显弱化。至于党和国家原有的监督体制，也日益形同虚设，做表面文章，监督对象则更是从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蜕变为对基层单位和一般干部群众的监管……。这些都表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已经形成。

“斯大林模式”利弊分析

斯大林模式具有典型的两面性：既有通过它自身优势并在一定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功而表现出的历史合理性，甚至是不可替代性；同时又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和十分突出的弊端；这两方面的效果都非常强烈。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流于表面的功过判断，而是从更深广的历史视野来考察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对斯大林模式做出总体的倾向性评价的。

应该说，斯大林模式是一种在特殊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的“特定性”模式，而不是反映社会主义发展一般规律和客观趋势的“普适性”模式。这个模式的优势是对特殊时期的社会主义发展起了强劲的刺激和推动作用，而它的弊端却在更深层次上对社会主义根基起了腐蚀和瓦解的作用。因此，这个模式所取得的成功只能是短暂和阶段性的，放眼长远，它又不能不走向反面，走向衰败。

> “让苏联走到尽头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类型——即那种非民主的、强制性的、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这种社会主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它在没有导致贫富严重分化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但它离马克思和历代西方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全民拥有和控制社会生产组织的体制太远了。……苏联经验以及苏联体制走到尽头的历程，为未来兴起的任何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教训。”①

斯大林模式，特别是其计划经济模式，确也曾显示了其制度创新的显赫效益。当时西方经济正深陷在始于 1929 年的灾难性经济危机之中，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缺陷集中地暴露出来，而苏联经济却得益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获得了令人瞠目的迅速发展。这种经济发展速度的深刻对比在西方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有关“社会主义模式”的大论战。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这部著作中说，社会主义是中央集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是专制而独断独行的，他还具体论证了社会主义优胜于资本主义的诸多表现，择其要者：一是社会主义协调经济和分配资源的效率之高是无可比拟的，因而它能消除经济的周期性上升和下

①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 页。

降，资本主义却只能缓和它而不能消灭它；二是资本主义经济经常处于短期的波动之中，而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却不是波动式的，它可以走生产量增长长期趋势线的道路；三是由于消除了萧条和加强了计划指导，社会主义的非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都将减少。

从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时段去观察，斯大林模式为大力推进苏联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保卫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做出了重大贡献。毫无疑问，这一模式极大地促进了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确保苏联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大工业体系，同时也在社会发展的其他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苏联如果走一条常规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显然是很难在这么短时间内实现建成工业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的。斯大林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苏联全体人民的建设热情和献身精神，调动和集中国内的全部物质资源，奋力打大规模的攻坚战，创造出震撼世界的“工业化奇迹”。从 1928 到 1940 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增长了 5.5 倍，其中重工业增长了 9 倍，整个工业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高达 21.2%。“苏联从一个乡村的、农业的国家一跃而为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国家，其速度之快，历史上绝无仅有”。[①]

斯大林模式在极其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显示了强大的适应力和战斗力，为最终打赢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保卫苏联人民的和平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苏联通过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特别是国防工业的发展，为赢得这场战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正是依靠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使遭到侵略猝不及防的苏联能够迅速转入战时轨道，并以其极大的动员能力和极高的组织效率，凝聚起全苏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奋勇抗战，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保卫世界和平、建立社会主义阵营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虽然斯大林模式曾经创造过辉煌，但若作进一步的审视，就会发现，其一，这些巨大成就往往同时伴随着一系列严重问题。一方面，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由此形成了“超重型”的产业结构、“粗放型”的畸形增长方式以及因高度集中而严重“不对称”的畸形社会系统，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结构性扭曲，广大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民主政治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整个社会缺乏持久发展的动力和效率。其二，越到后来，斯大林模式高度的动员能力和组织效率就越显示出短期性质。动态地看，它的优势效应呈现不断递减的趋势，经济社会活动的增值效率越来越低，以至在达到一个极限后便后继乏力，再也无法重振旗鼓。相反，这个模式的一些弊端却在和平环境下滋生放大，不断积累起来，严重损害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根源于它固有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对内高度集

[①] 科兹，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第 2 页。

权；对外自我封闭。同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集权体制相比，斯大林模式是高度集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存在着性质上的区别，但它所体现的集中程度，却又比任何其他集权模式有过之而无不及。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无一例外地建立起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使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文化悠久的庞大国家，全部社会生活都听命于中央权力中心的指挥。虽然一时保证了各级权力通道的畅通无阻和快速运转，但负面后果也是难以低估的。

在政治领域，由于权力过份集中和以党代政，造成执政党组织权力化和行政化，把国家的治理方式变成了个人专权和家长制统治。斯大林模式虽然在形式上也含有“依法而治”的因素，并且在理论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实际反映在公共权力的分配、控制和运用上，却是典型的“依人而治”，即实行以权力为轴心，以等级秩序为纽带的极少数领导人的个人之治，而这种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最终就演变成为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斯大林模式的政治领域实践给苏联乃至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它从根本上践踏了人民的民主权力和国家法制的权威，而且一旦出现少数领导人的重大决策失误，就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经济领域，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不仅违背了现代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也窒息了企业、农庄和广大劳动群众基于自身物质利益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高度集中的资源动员方式，其效率主要取决于民众的奉献精神和对民心的凝聚力，而在物质条件不能逐步改善、物质利益不能持续提高的情况下，这些奉献精神和凝聚力都是不可能长久的；高度集权的权力运作方式，及其权力本身产生的腐化，也促使民众的热情逐步冷却，人心开始涣散，整个社会的运行日益陷入不可救药的低效率泥潭之中，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而且也找不到新的推动力，苏联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出现大面积的经济停滞。

在思想文化领域，斯大林模式同样沿用了行政强制的管理方式，形成了高度的舆论一律。全社会的思想言论都集中于苏共中央，最后统一于斯大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和发展权，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中主要观点的阐述和做结论的权力，完全由领袖人物一人说了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条神圣准则。学术问题政治化，贴上了阶级性质的标签，管理机构随意对科学内容划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线，对违禁著作和作者大加讨伐，甚至人身攻击。这种高度统一的思想文化体制本来或许指望在一个“无菌世界”中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崭新体系”，结果却导致了苏联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封闭、肃杀和长期得不到发展的疲软状态。

斯大林模式对内高度集权，在对外关系上实行严格的封闭政策。造成苏联社会长期封闭的原因很复杂，除了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苏联采取敌视态度并进行经济封锁等客观因素以外，同斯大林本人的指导思想也有很大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根据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与资本主义对抗的阵营这个局面，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3）提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就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①]这就是“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他还特别乐观地认为社会主义市场将逐步包围、蚕食资本主义市场。斯大林断定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的实质是“一些民族征服另一些民族，比较发达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不大发达的民族”。[②]因此，为了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使其免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袭击，就必须限制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指导下，苏联领导人以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为界，把苏联社会同资本主义世界基本上隔绝了开来。在谈到经济建设问题时，斯大林特别强调：“我们应该这样来建设我国的经济：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使我国不致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系中去成为它的辅助企业，使我国经济不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辅助企业发展起来，而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发展起来。”[①]这样实际上就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独立性与世界经济整体性完全对立起来了。苏联既拒绝同西方国家扩大经济联系和合作，还组织东欧国家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从而使苏东经济基本上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进行封闭式的自我循环。

从 1920 年代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算起，经过几十年风云际会，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社会及其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斯大林模式却几乎没有改动地被一直沿袭了下来，并且还在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斯大林去世之后，继任的苏联领导人虽然也曾想对这个模式作某些改良，但始终没有触动其基本框架。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更是由于领导层因循守旧和独断专行，一次次地错失了改革良机，在表面稳定的假象之下，逐渐积累起大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一步步走向全面僵化和停滞。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几点思考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开创了人类社会变革的伟大历程。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出现曲折和坎坷，在前进道路上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很大程度上与没有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关。一般而言，什么是社会主义主要涉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及其价值，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则主要涉及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及其目标选择。对斯大林模式利弊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问题。

---

①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620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49 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46 页。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选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一种反映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制度。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要素，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它们所体现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遵循的基本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也是不断变化的，但这种发展变化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性质意义上的“制度选择”问题。而社会发展模式则不同，它只是社会经济制度借以实现的具体形式、方式和载体。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实行同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其发展模式可以有很大的差异。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并非只有唯一的一种发展模式和运行原则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反，在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框架内，存在着采用不同模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可能性，因此，所有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都要面临一个“模式选择”的问题。

各国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由于初始经济条件、生产力水平、社会历史传统、民族文化背景有所不同，就必须采取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发展模式，这同样也是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必须遵循的国情原则。从当时苏联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看，这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孤岛”，面临着西方列强武装侵略的现实威胁，因而“必须不是走，而是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跑完由手工业和农村村社到发达的工业化的距离”，所以，“党不能选择除了加紧实现工业化之外的另外的历史道路”。[①]斯大林模式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不能不作出的选择，但未必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普适”模式。

> “每个国家要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民族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来决定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具体道路和具体做法。用单一的模式来规范不同的国家，这已经在历史实践中证明是完全错误的。”[①]

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苏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布哈林和斯大林论战，也是早些时候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争论的延续，它集中反映了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分歧。布哈林认为：“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开始的，而工人阶级所得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给它留下的遗产……十分明显，这种遗产在各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各不相同的”。他对俄国“遗产”的基本判断是：“可怕的、半农奴制的野蛮状态和可怕的总的经济落后，同西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先进的形式的这种结合，就构成

[①] 见戈尔巴乔夫1987年在十月革命节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② 胡绳：“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

俄国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构成它的所谓的‘民族面貌’”。[②]他意识到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将会面临许多复杂、独特和困难的建设任务，将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企图在短时期内“仅仅通过法令、通过纯粹的暴力措施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③]而利用市场机制，繁荣小农经济，实现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则是依据俄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布哈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来源于他对脱离俄国国情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思。他指出，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表明，“我们党内曾经有过的幻想破灭了”，这个“幻想”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我们想来并不是‘战时的’，也就是并不只适合于内战的某个发展阶段，而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的‘正常’形式”。[①]这种所谓“正常”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想法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我们立即消灭市场，从而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立即实行计划经济”。[②]从后来的情况看，布哈林在这一点上是颇有先见之明的。

斯大林也承认苏联经济落后的实际，但从主观上看，他把革命年代形成的军事化思维方式和在非常时期显得更有效率的行政化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提出一条激进的工业化路线，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进加速工业化战略。依靠行政命令，用人民群众作出较大牺牲，付出沉重代价的办法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创造奇迹，但却产生不了持续的动力。特别是如果脱离了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时间越长，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就越明显，所引发的矛盾也就越多，危害性也就越大。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各国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内外环境，也有其特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因此必须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且，各国社会主义模式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还需要不断变革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不同场合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和改革的社会。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内在结构和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即使是一个原先成功的发展模式，它对社会发展的正面效用也会逐渐衰减，而其负面的东西则会暴露出来。当这种情况达到一个临界状态时，就必须不失时机地对原有模式进行改革，甚或是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这是改进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必须遵循的创新原则。

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从制度创新到制度均衡，再到更高层次的制度创新的不断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动力来自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新情况，提出的新问题。社会主义发展至今，从外部条件看，在现代科技革命和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75、474-475 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63 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108 页、109 页。
④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60 页。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世界经济关系，与过去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两个阵营全面对抗而且各自封闭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从内部条件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转型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人们的利益关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等都在发生很大变化。这就要求身负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重任的无产阶级执政党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社会经济已经发生的变化，解放思想，调整过时的方针政策，改革原来的发展模式，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固守旧的模式而拒绝改革，必然会扼杀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在改革问题上，斯大林模式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如前所述，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经历了一段辉煌时期后，逐渐陷入体制困境和发展困境。从 1950 年代开始，由体制僵化所造成的发展停滞一方面极大地消耗了苏联社会的种种潜力，另一方面还在不断滋生种种社会经济疾病，积累了大量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进行体制改革的紧迫要求。但苏联领导人依然沉缅于此前高速工业化的成就和苏联可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世界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不仅在实践中延误，甚或拒绝改革，而且还从理论上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神圣化。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由他亲自授意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4）把斯大林模式的各种具体政策措施，如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等，统统提升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不短的时间里被奉为苏联乃至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必读教科书”，在社会主义经济学领域占据着“教师爷”的位置，严重禁锢了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思想。

斯大林的去世，以及苏联社会各种矛盾的急剧暴露，客观上为苏联进行体制改革提供了比较好的契机。继任的苏联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到契尔年科，虽然先后都有过程度不同的改革尝试，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都无功而返。除了传统体制根深蒂固之外，恐怕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改革者无法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缺乏理论创新和改革的勇气。赫鲁晓夫在对斯大林模式展开的首次冲击中，虽然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却没有触及这一模式中排斥市场的“计划崇拜”，排斥多种经济成份的“所有制崇拜”和否定民主法制的“集权崇拜”。其他领导人的改革更是浅尝辄止，最后留给戈尔巴乔夫的，仍然是一个基本没有什么改动的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模式。

> “70 年代下半期，被假象冲昏头脑的苏联政府甚至敢于向西方发起挑战，在全球实行大规模扩张。但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苏联越来越悄悄地滑向了危机的深渊。苏联经济高度依赖世界市场，苟延表面繁荣，实际上已是回光返照，来日无多了。经济改革的日程一再被延宕，使得一旦有机会实施改革，旧体制就如久藏密室的木乃伊，一见空气便

迅速腐化溃烂。”[①]

应该说，虽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的价值取向及战略策略方面犯了一系列错误，使得改革最终变成了“转向”，导致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悲惨结局。但追根溯源，斯大林模式积重难返的弊端，以及对这个模式进行改革的久拖不决，才是苏联版本的社会主义走向衰亡的真正原因。

[①] 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下卷，第 192 页。高度依赖世界市场是指当时苏联依靠大量出口初级产品赚取外汇，制造了表面上看起来还很不错的经济指标。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践

§4．1　大事记

19 世纪中叶以来，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掠夺，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威胁着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而封建专制腐朽的反动统治，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各族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但是，农民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提不出有远见的奋斗纲领，包括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农民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统治集团内部虽然也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所谓“新政”等改革措施，也未能挽救其分崩离析的厄运。1911 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民国政权很快落入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手中，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演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落到了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身上，他们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三重压迫，且大多出身于农民，与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与此同时，一场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向封建思想道德宣战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首先是进步知识分子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新文化运动中的左翼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并加以传播。这样，代表新的革命方向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都具备了。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 13 所大学几千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游行，抗议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主权的协约，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次日，北京学生总罢课，通电全国；旋即激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6 月初，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声援学生爱国斗争；紧接着各地工人相继罢工。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北洋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代表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强大力量。

1920 年 1 月，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3 月，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 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 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

主义小组。到 1921 年初夏，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旅日旅法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相继建立了类似组织。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最后一天移至嘉兴南湖上的游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语）

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明确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1922 年 1 月到次年 2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以后转入低潮。1924 年 1 月，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工农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925 年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以及 1926 年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革命**的高潮是国共合作的广东国民政府推翻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1926-1927）。北伐战争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各地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才能夺取政权，取得革命的胜利。

1925 年底，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认为首先要辨明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无产阶级应团结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1927 年 3 月，毛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提出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1927 年 8 月，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 2 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9 月，毛泽东等人领导**秋收起义**，辗转到江西井冈山地区创建根据地。次年 4 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一部分部队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师，组建工农红军。此后，各地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革命力量又重新积蓄了起来。

1928 年 6 月至 7 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文件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

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并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

1930 年 1 月，毛泽东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5 月，毛又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30 年 9 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1931 年初，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等人以“执行国际路线”为名，提出了一套更“左”的错误观点，并实际上掌握了中央领导权，开始了长达 4 年的**王明路线**统治。

1934 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历经周折，终于在陕甘会师。

1937 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改编中国工农红军和红军游击队。中共提出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发动人民战争，在敌后领导抗日武装；同时，坚持团结抗日，击退了三次反共高潮。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年抗战，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0 年 1 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此前，他还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这些著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论证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两者要衔接起来；批判了混淆两个革命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总结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三个克敌制胜的法宝，进一步阐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1945 年 4 月，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批判王明路线的错误；赞扬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晚些时候，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等报告。大会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还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和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确认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1946 年 6 月，国民党方面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向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内战重新爆发。但仅仅两年，力量对比就发生了翻转。从 1948 年秋到 1949 年 1 月，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8 年底，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 年 4 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年底全国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集中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采取的各项基本政策。全会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 年 6 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只能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 到 1953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保家卫国，经过坚苦卓绝的战场和谈判斗争，迫使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有力保卫了中国的安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建国初期，新解放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土改运动**。1952 年底，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到 1953 年基本上消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平息了匪患。其间，还开展了“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这些运动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

1953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完整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次年 9 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上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1955 年 7 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0 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撰写两篇序言和一百多条按语，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

1956 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针对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疑问作出答复和论述，并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这两篇文章均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提出的。

为了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1956 年 4 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包括正确地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

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大会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精神，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着重提出党的建设，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一系列方针。

1957 年 4 月，中共中央号召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不久，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下，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毛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逐渐背离了党的八大路线。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认了根据毛泽东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号召争取 15 年或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各条战线随即掀起“大跃进”高潮。8 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并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随后就是铺天盖地的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成灾。

1959 年 7 月至 8 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前期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但中间转了向。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的批判，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决议。全会一面降低了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一面又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斗争在全党展开，政治上民主生活更加不正常，经济上“左”的错误更加发展了。

1960 年 9 月，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报告，提出**“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八字方针。次年 1 月，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并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2 年 1 月至 2 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央承认 1958 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着重讲了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这次大会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问题上，统一了全党认识。1963 年起我国经济全面好转。1964 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

1962 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次年 5 月，毛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 10 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必须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9 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比较温和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 10 条”）。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 年 7 月，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年 9 月至次年 7 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 9 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九评”**）。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不久波及国家关系。

1964 年 2 月，毛泽东批评国际上“三和一少”（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少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和国内政策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12 月，毛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次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纠正了**“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但又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

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8 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及这两个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

六条”）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1968 年 11 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包括六个方面：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召开。林彪作报告鼓吹“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规定为“我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九大修改的党章居然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然而，林彪野心膨胀，图谋抢班夺权。1971 年 9 月，林彪集团企图发动武装政变未遂，林彪等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事件实际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的破产，但是江青集团继续坚持极“左”路线，并具有更加强烈的夺权野心。

1973 年 8 月，中共十大召开。这次大会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是“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并认为“九大的政策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1975 年 1 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第一步，在 1980 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大会挫败了江青集团（“四人帮”）的组阁阴谋。由于周恩来病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着手进行**“全面整顿”**，各项工作有了明显起色，但其中必然要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性否定，这又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年底毛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造成极大的混乱。

1976 年这一年大悲大喜。1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悲痛欲绝，纷纷举行悼念活动，遭到“四人帮”干扰和禁止，酿成“四五天安门事件”。7 月 6 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面对紧迫形势，10 月 6 日，

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全国亿万群众奔走相告，大快人心。

1977 年 8 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宣布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复出的邓小平在闭幕词中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前，《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大讨论。邓小平在筹备这次全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被认为是新时期宣言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此必须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全会还提出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两年徘徊的局面，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

1979 年 3 月，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务虚会上讲话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982 年 9 月，四项基本原则被写进党章；同年 12 月，写入宪法。

1979 年 12 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 1000 美元。

1980 年开始，根据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实验，中国农村普遍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就这样在全国逐步推广开来了。1982 到

1984 年，中共中央连续三年颁发一号文件指导农村改革工作。

1980 年 8 月，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还提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

1984 年以来，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1984 年 6 月，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10 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1984 年 10 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 800 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 30 年到 50 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他还说，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

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

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1985 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对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

1985 年 5 月至 6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我国政府关于裁军百万的决策。邓小平指出，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也改变了“一条线”战略，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1986 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第二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三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1987 年 3 月，邓小平在关于十三大报告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根据的文件上批示：“这个设计好。”10 月，中共十三大召开。赵紫阳作报

告阐明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报告提出我国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激化了，1989 年春终于酿成一场政治风波。1989 年 5 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决定，并于 6 月 4 日采取强制措施，平息了这场风波。紧接着，**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讲话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1992 年初春，邓小平视察南方，沿途发表重要谈话。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学马列要精，用管用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

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南方谈话**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报告把我们取得改革开放胜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报告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关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问题。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 年 11 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此就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1994 年 9 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一项新的伟大的工程。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已经成为突出的环节。

1997 年 2 月，邓小平逝世。他生前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997 年 9 月，中共十五大召开。江泽民作报告，认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大会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99 年 10 月 1 日，江泽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庆典上说，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实践也充分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康庄大道。我们将继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在新的世纪里不断谱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实现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以后，最终完成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2000 年 2 月，江泽民提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5 月，他又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必须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党的全部工作中去。2002 年 5 月，他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全党同志要牢牢把握这个要求，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2002 年 11 月，中共十六大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江泽民作的报告全面分析了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进一步阐明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根本要求，阐明了我们党在新世纪坚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等重大问题。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围绕这个目标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新党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2003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贯彻“五个统筹”、做到“五个坚持”，即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4．2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今天，中国坚定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并且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透彻把握，而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有过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可以这样说，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两者之间历史和逻辑的联系，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新民主主义”的设想和实施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939 年，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的两篇文章中指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①]“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而革命胜利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但毫无疑义，“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②]这年底，毛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③]

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 “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④]

但是，这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新”字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发生在十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5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6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47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46-647 页。

月革命以后，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然而，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本来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资产阶级的软弱，领导中国民族革命取得胜利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首先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领导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共同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新民主主义”的提出，不仅回答了革命性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了革命的发展前途，即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走向问题，也就是建立什么样国家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一是推翻旧统治，建立新政权；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列宁的“一国胜利论”的突破主要是在前者，他主张趁帝国主义战争无暇它顾的时机，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夺取政权的胜利。“新民主主义”事实上也包含了一国胜利的思想，同时还对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社会主义给出了中国的答案。

1948 年，毛泽东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①]这条总路线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阶级、性质及前途等，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总体设想。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除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也是革命的对象，这并非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而是因为它依附于帝国主义并为帝国主义所豢养，它还与封建统治阶级紧密结合，具有买办性、封建性、垄断性，代表了落后的生产关系，障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革命的动力，毛泽东从考察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入手，通过分析它们对革命的政治态度，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即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阶级的联合。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标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来领导，这也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和历史使命决定的。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步骤和前途，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②]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16-131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51 页。

为了贯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实施新民主主义的总体设想，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就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①]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政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革命进程中，一定时期采取的国家形式，是一种过渡性质的，但却是“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就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中国的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部分，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中心内容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总的目标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实现耕者有其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就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②]这种文化既不同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三大纲领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贯彻三大纲领的结果是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使中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③] 显然，新民主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也就是在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过程本身必然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积累；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是否能实现社会主义，关键还在于物质前提是否具备。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只意味着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因为“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即使共产党能够造成进入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如果不能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社会主义也只能是空中楼阁。”[④]

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设想，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一个过渡阶段。新民主主义思想承认落后的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必须加速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同时还认为，为了创造这种物质基础，需要有资本主义的扩大和发展。“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7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9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47 页。
④ 杨奎松：《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8 页。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①]

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设想，“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②]“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③]也就是说，中国将经过准备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

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1948）报告中所概括的：

>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④]

此后毛泽东还多次重申这个思想。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个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走我们自己的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破坏一个旧世界的任务。但胜利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即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更加艰难的全新课题。因为革命的方式可以成功地夺取政权，却不可以同样成功地组织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苏联经验。由于那时国际环境和国内诸因素的作用，决定了中国必然地选择了苏联的模式。这个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60-106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50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50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60 页。

模式是以马克思当年设想的以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为主要特征的纯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蓝本的，尽管在一段时期里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由于其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上高度统一逐渐暴露出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党政不分、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阶级斗争扩大化、大搞个人迷信、拒绝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等等。

在实施“一五”计划的实践中，毛泽东已逐渐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中国。1955 年底，毛泽东在党内高层率先提出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为此，他亲自领导全党进行历时几个月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在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食洋不化的问题。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揭了斯大林的“盖子”后，毛泽东更加强调这一点，提倡独立思考和走自己的路，在《论十大关系》（1956）中，他进一步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①]这年他在一次谈话中再次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②]在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中，明确要求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出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实际，提出了许多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1957）等著述中，主要有：

第一，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针对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的不良后果，提出了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③]毛泽东根据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指出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并提出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还阐明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以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关系等内容。

第二，改革所有制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思想。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在某些方面出现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毛泽东提出了一些改革思路。关于所有制问题，毛泽东在 1956 年底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主张发展私营经济的“新经济政策”，他甚至还提出，“可以消灭了资

---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78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0 页。

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①]毛泽东在一些场合还强调要重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特别是在纠正 1958 年“共产风”时，他批评了主张消灭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还是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也主张给地方和企业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②]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内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却出现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鉴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最主要的一是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但这个矛盾与旧社会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不需要通过革命，而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和完善得到解决；二是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而由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社会大量、普遍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第四，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苏共二十大所揭露的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为了避免出现斯大林那样的悲剧，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应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第五，文化艺术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提出，对于艺术问题和科学上的是非问题，要通过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实践去解决；而反对利用行政力量等手段，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其他风格和其他学派。

毛泽东为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付出了极大努力，尽管这些思想后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还走了不小的弯路，但它毕竟是勇敢的尝试，为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性的东西。

在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 “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③]

---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70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1 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这是一个把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落后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正确思路。但是，这个思路后来被毛泽东自己否定了。

建国初期，新社会的革故鼎新带来了无比振奋和巨大动力，中国共产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新中国的各项事业高歌猛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到了 1956 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自豪但也不无急进地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几亿农民被迅速动员起来，加入了高级合作社，使毛泽东坚信只要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就是万能的武器，这又助长了他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急于求成求纯的心境，以及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和实践。另外，“现实社会主义是在远远低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上起步的，是建立在‘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基点上的。这是危机感与威胁感的产物。”[①]包括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也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只能是追赶战略，而且这种发展战略又往往是与政治上的“左”倾路线联系在一起。“这一路线在取得政权以前曾体现为超前突进的政治战略；在取得政权后，这条路线曾体现为超前突进的经济战略。”[②]

就毛泽东个人的主观愿望来说，发动包括“大跃进”这样的群众运动都是为了使中国早日脱掉贫困落后的帽子，使中华民族早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也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大跃进’中取得的新成绩激励了毛泽东，六亿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志感动了毛泽东。”它使毛泽东兴奋不已，以至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③]在头脑已经不很冷静的情况下，毛泽东又不愿意被泼冷水，他不肯接受对大跃进的批评，谁有不同意见就被视为右倾。由于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斗争艺术和思维惯性，毛泽东更擅长运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即便是在经济建设这些其实他并不熟悉的领域。党内外民主生活民主制度不健全又很容易产生家长制、一言堂的毛病，经济上的“左”倾冒进更进一步导致政治上的无情斗争，这就接二连三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一直到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 1957 年以后，毛泽东的注意力逐渐转向重视阶级斗争。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1957）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1962）上，他进一步断定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将存在的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国内搞阶级斗争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最后发展到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其他一切领域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毛泽东主观上想突破苏联模式的束

---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518 页。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 518 页。

③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40 页，。

缚，但实际上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以致发生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失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是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反映，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新民主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之间不仅在于前者给后者以启发，而且更在于它们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新民主主义贯彻到底，也许就不会产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了；也正是由于新民主主义没有贯彻到底，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前提准备不足，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旧中国遗留下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事实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在这个基础上建设的社会主义就很难是一个“够格的”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否则，就很容易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失误。

马克思主义初始人在原则上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加以区别，但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有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后来是列宁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叫做社会主义，而对这个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没有作过进一步的划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马克思称作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还是列宁称作社会主义的社会，都应该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实现了社会所有制，逐渐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甚至国家也开始变成非政治性国家的社会。但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距离这些要求还很遥远。

当时，毛泽东还是比较清醒的，他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①]那么，对这个还不完全巩固的社会主义给予一个什么称谓呢？1959 年底 1960 年初，毛泽东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分成“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我国则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是探索社会主义阶段理论的一个良好开端。但是，中国从 1958 年起搞大跃进，刮“共产风”，“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批“资产阶级法权”（主要批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后来甚至连发展生产力都不讲了，“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还大批“唯生产力论”，又明显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使得刚刚起步不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上了歧途。

历史地看，那个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不是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而是在总的“左”的指导思想上，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急于过渡到共产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14 页。

主义，超越了发展阶段，脱离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其实这也是社会主义各国普遍发生的事情）。其它方面的，包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失误，都是从这个“左”的指导思想中派生出来的。也就是邓小平一针见血指出的，“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①]结果欲速而不达。

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左”的错误倾向才逐步得到系统的纠正。在中共十二大（1982）上，邓小平又再次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他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曲折性。在中共十三大（1987）召开前夕，邓小平明确指出：

> “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③]

邓小平认为从 1957 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④]根据这个精神，中共十三大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被高度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是对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准确定位，它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前者表明性质，后者表明程度。

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用了几个时间概念来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恐怕还要三十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如果从建国算起要用一百年时间；十三大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9-140 页。

②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52 页。此前邓对以初级阶段立论的十三大报告大纲设想批示：“这个设计好。”（见《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9 页）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于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而是在社会主义名义下为建成“够格”的社会主义做准备的阶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69 页。

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①]中共十四大（1992）进一步明确这个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②]

中共十五大（1997）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以及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总的说来，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

> “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广大人民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③]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既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江泽民在纪念建党 80 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④]这是对我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更具体、更切实的一个判断。

经过二十多年发展，中国生产力水平大幅度跃升，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

①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9-380 页。

② 见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11 页。

③ 见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15 页。

④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8 页。

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政治稳定、民族团结、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中共十六大（2002）号召紧紧抓住新世纪头二十年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中国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既令人振奋又十分艰巨，它的实现，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显示巨大的优越性。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 年 11 月 18 日。

§4．3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这是自然事物和社会关系的一条重要规律，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20 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东方的形成和崛起。社会主义在中国仍然具有活力，并继续向世人展现蓬蓬勃勃的生机。

社会主义必须切合中国实际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阶段，1956 年，我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征程。当时党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主要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论述和设想为理论依据，以苏联建立起来的反映了那个时代和苏联国情要求的“斯大林模式”为直接参照，确立和长期坚持了既源于经典作家有关思想，更因袭了苏联模式的体制和做法。在经济方面，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高度统一的计划管理，优先发展重工业；政治方面，保障人民基本的民主权利，权力高度集中，但同时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后来又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方面，强调要消灭剥削阶级思想，以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维系各种社会关系及行为准则等等。这些体制和做法，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但也不同程度地脱离了我国的具体实际。因此在一直到 1978 年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一些重大失误也相当惨痛。特别是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那些体制和做法的弊端日益凸现，而且难以为继。总结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和挫折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日益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取得成功，一定要有自身的特色。“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然而，同样引以为戒的是，从 198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代初，苏共领导人从纠正“斯大林模式”偏差和所谓“完善社会主义”逐步转向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造；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转向以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向全面推行私有化；从提倡民主化转向“政治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全盘接受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等等，这些“改革”不仅没有给苏联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带来生机与活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 页。

力，反而最终葬送了它们。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取得成功，也不是贴上什么“特色”的标签就可以了。

> “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

社会主义有理论、实践以及包含在两者之中的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程序和行为规范表现出来）这三大层面。科学社会主义既是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实践和形成的制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科学，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也就必须随着时代和各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时代是一定时期人类所面对的客观境况与趋势，是这个时期人类所处的世界面貌。近代以来，生产方式、交换及分工的发展使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逐步转变为“世界历史”，各国的实践就只有与这个时代发展的方向相一致，才能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前进；否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地域性的”社会主义，更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②]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即作为直接同世界历史发展相联系的存在，必须吸收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和文明成果，才能最终取得胜利。与此同时，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所拥有的资源，要解决的问题，满足需要的有效途径都各不相同。各国社会主义只有从本国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③]

时代和国情这两方面决定了要推进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就必须立足国情，面向时代，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实际及时代要求结合起来，既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和基本原则，又不断用自身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制度。而包含着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实际创立、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新思想、新实践及新制度，社会主义国家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理论、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因此而具有各国的特色，具有体现对各国现实问题作出科学回答的新风格、新特征。各国有关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实践及新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3 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6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65 页。

制度愈丰富，其所表现的新风格、新特征也就愈明显。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光荣的业绩：我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国作为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极大地支持和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1978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现在的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结合起来，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正确道路；我们总结国内国际的历史经验，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局面中，中国共产党砥柱中流、岿然不动，社会主义在中国依然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和基本原则前提上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并用一系列新思想、新实践及新制度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是为中国指出了一个发展方向，表明这些新思想、新实践及新制度正在形成和试验中，中国社会主义的新风格和新特征还在“进行时”；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则意味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的特点，表明这些新思想、新实践及新制度不断丰富、发展、巩固和完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业已成为独树一帜并且得到普遍承认的社会主义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在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国际国内力量的相互转化中，国际国内形势的密切联系中，正在并还将继续显示出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社会主义中国“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领

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表现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和制度中，它们是这二十多来我们的党和人民对中国许多重大现实问题的精彩回答。理论指导实践，制度则包含在两者之中，它们所体现的新风格、新特征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

坚持思想路线，不断理论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5 页。

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可以高度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建国以后，更突出的是在建设问题（相对于革命问题而言），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继续贯彻这条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挫折。面对国内外条件的巨大变化，面对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不思进取的现象，1978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先后把“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引入这条思想路线，“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①]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进行理论、实践和制度方面的创新。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理论创新可以带动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坚持与时俱进就要正确回答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③]也就是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准确判断时代，把握发展阶段。如何准确判断我们所处的时代，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是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理论、制定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依据。一方面，1980 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也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对话，各国经济文化合作日益密切，相互依存加深，“战争与革命”已经不能概括这个世界的时代特征了。邓小平据此果断地提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对我们非常重要，“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54 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12 页。

上来”。[①]他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放弃了战争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的看法，认为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中国要做的事很多，归根到底是两件大事，一是和平问题，一是发展问题，这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中国发展了，全世界要求和平的国家发展了，就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②]“和平与发展”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对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或主题的基本判断。尽管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依然存在，有的挑战还很严峻，但是我们分清主流和支流、全局与局部、长远与近期，抓住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机遇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顺应历史潮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另一方面，人口多、素质低、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创立了包括初级阶段的涵义、必要性与长期性、基本特征、主要矛盾与根本任务、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等内容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中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认真反思了以往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大搞“一大、二公、三纯”的穷过渡，结果既使生产力发展受阻，又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受损的教训；进一步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的界定，提出社会主义也要不断进行改革，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是分三步走，到 21 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关键在于自身过硬，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要扫除障碍，就要改革开放。“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④]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既包括经济基础又包括上层建筑，既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还包括文化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既包括体制层面又包括思想观念层面。改革又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要求进行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2 页。

[②]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5 页；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讲话，《人民日报》1986 年 5 月 21 日。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6 页。

方式、管理方法。”[①]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中国还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改革开放为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动力。[②]进入新世纪，我们明确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我们在发展道路上提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形成了包括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面发展观；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绘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根本任务上提出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发展动力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依靠力量上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坚持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在国际战略上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在领导力量上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根本目的上提出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强执政党建设，实践“三个代表”。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把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前进，就必须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取决于我们党。“一个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党始终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一个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强大的基础。”[③]这就把执政与兴国，治党与治国联系了起来。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②] 邓小平在1979年底就提出，以后又多次强调到20世纪末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4页。）即以198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基数，80年代翻一番，20世纪末翻两番，进入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第98页。

导国家建设的党。”[①]中国共产党既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又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②]“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③]也就是说，我们党的先进性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是否能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推动历史前进。

认识“三大规律”，回答“两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努力完成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共十五大（1997）和十六大（2002）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先后确立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的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如果说，邓小平理论可以概括为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回答；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认识。“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 年 11 月 18 日。

[②] 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 年 9 月 26 日。而此前的表述是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

[③]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 年 11 月 18 日。

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互促进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已经日益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同中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务联系了起来，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要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就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就蕴含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中。共产党执政规律是共产党执政兴国并进行自身建设的依据，同时又是由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决定，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自行其是，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具体展现。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这些要领，分别从思想先导、准确定位、实践步骤、坚强保证和基本等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和制度的伟大创新。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所不同，社会主义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新风格、新特征，正以一种崭新的形态，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社会主义中国迈向新的征程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要实现我们既定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长，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愿望日益强烈。在中国，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 13 亿人这个因素，就会变得很大；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 13 亿，就会变得很小。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关头，面临着各种新的矛盾，面对着许多新的挑战。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的任务和压力很大。第一，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看，人均 GDP 达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 年 11 月

到 1000 美元至 3000 美元这个阶段，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我国现在正进入这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如果正确把握其特点，适时调整，举措得当，经济社会发展将实现新的跨越；如果应对失误，则很容易导致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经济倒退。一些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第二，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讲，我国现在正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进一步消除发展面临的诸多体制性障碍，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索和解决。第三，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压力加大。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不足，是制约我国发展的突出矛盾。第四，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必然要求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适时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①]树立和落实这一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②]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还必须“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③]这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目标的新要求。它表明我们将更加关注社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

社会主义之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就因为它既能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又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

---

18 日。

①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2003 年 10 月 22 日。

②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 年 4 月 4 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 年 9 月 26 日。

会、文化、生态等其他方面的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态需求等的全面实现，是人自身价值的普遍提高，这是发展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未来社会时就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互为前提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而人的全面发展则意味着物质文化财富的创造日益增多，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良性互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03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 1.4 万亿美元，人均突破 1000 美元，走出了低收入国家行列，迈上一个大台阶。我国对外贸易额居世界第四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位，利用外资居世界第一位。粮、棉、油、肉、禽、煤、钢、水泥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年产量也是世界第一。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有了大幅度下降，人均平均期望寿命比世界平均高出了 4 岁……这些成就从不同侧面证明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优越性。

>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促进弘扬中华文明和借鉴国外文明相结合，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①]

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②]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总的来说比资本主义优越”，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讲这个话，“要靠我们的发展来证明这一点。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③]相对于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来说，社会主义还是很年轻的事业。中国的成功大大改善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而且必将对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 年 9 月 26 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3 页。
③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70 页。

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第一，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然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实际上由发达国家主导，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南北贫富悬殊愈拉愈大，“数字鸿沟”令人忧虑。第二，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势头正盛，对市场、人才、战略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第三，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危及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第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始终没有改变。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牢牢掌握主动权。

我们必须以宽广的“世界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了，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度也增大了；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各种力量不断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这个趋势既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也给我们所奉行的国际主义赋予了新的含义。社会主义中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在各种场合大力支持世界多极化，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国领导人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①]政治上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扩大共识；经济上互利互补、深化合作、共同发展；文化上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相互借鉴；安全上加深互信、增强合作、维护和平。[②]这就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的更广泛的国际主义，这种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同人类文明、时代潮流和世界未来自觉地联系起来，不仅仅为社会主义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也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84页。

② 见胡锦涛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重要演讲，《人民日报》2003年 10月25日。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

§5．1　大事记

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历史上最深刻、破坏性最大的**经济危机**。危机肇始于美国，迅速波及严重依赖美国资本的德国和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英国，然后蔓延到其他国家。危机前后相比，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 37.2%（美国 46.2%，德国 40.6%，法国 28.4%，英国 16.5%，日本 8.4%），产量倒退了 30 年。同期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缩水 2/3，贸易实物量缩减 1/4 以上。美、德、法、英四国有 29 万家企业破产，最高时全失业人数达到 3 千万，半失业人数 1-1.5 千万，失业率高达 30-50%。事实上，资本主义进人垄断阶段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了，这就需要局部改善生产关系，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但当时西方统治阶级既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缺乏调节经济的理论和经验。美国是在罗斯福行“新政”（New Deal），德国是在实施法西斯型国家垄断之后才摆脱了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更多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避免了资本主义大规模危机的再次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的苏联与资本主义的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联手抗击德、日、意集团。1945 年 2 月，战争接近尾声，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会晤，商讨战后世界秩序安排和大国合作问题，两种制度的深刻分歧被暂时掩盖了，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按照当时的“实力”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战后德国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整个欧洲也一分为二，东、西欧分别在苏、美的控制之下。在亚洲，苏联同意在欧战结束后对日宣战，并承认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承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则满足苏联在远东、外蒙和中国的一些利益要求。三巨头还一致决定建立联合国，并确立了“大国一致”原则（关键是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雅尔塔体制**决定了战后世界的基本格局，也表明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还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1945 年 12 月，根据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 东欧）。苏联起初对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也颇

感兴趣，并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起国，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随着美苏之间矛盾日益激烈，苏联认为美国是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组织对自己和东欧进行经济渗透，才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拒绝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美苏的对峙促使战后世界逐渐形成相对隔离的两大经济体系。而**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是 1944 年 7 月，44 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等文件（即“布雷顿森林协定”），该协定建立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1970 年代初，由于美元与黄金的脱钩和各国纷纷实行浮动汇率，这个体系宣告瓦解。

1946 年 2 月，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战争是“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演说在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3 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作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称苏联在无限扩张它的“权力和主张”，“从波罗地海的斯德丁（即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来”。他呼吁美英结成同盟，讲英语的民族团结一致，用联合起来的人力、物力，以及世界各地的海、空军基地，共同对付来自苏联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丘吉尔的这篇“铁幕”讲话是西方对苏联发动**“冷战”**（Cold War）的宣言书。斯大林立刻谴责丘吉尔和他的朋友象希特勒那样散布种族优越论，指出这是在号召对苏联的战争。

1947 年 3 月，杜鲁门提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援助希腊、土耳其的具体计划（此前，英国政府照会要求美国接过援助担子，以免两国落入苏联势力范围）。杜鲁门认为世界已划分为“自由制度”和“极权政体”两大阵营，美国拥有领导“自由世界”的使命，并宣布美国要援助各国人民抵制对他们的“侵犯”。他还要求国会拨款 4 亿美元援助希、土，派遣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两国。所谓**“杜鲁门主义”**（The Truman Doctrine），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美国“遏制”政策的正式实施，美苏冷战全面展开。

1947 年 6 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这个计划是美国向欧洲提供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计划，是为了“恢复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

能够出现”。**“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是杜鲁门主义的延续和扩大。这个计划立刻得到西欧特别是英法的欢迎，它们立即召开欧洲会议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并邀请苏联参加。但由于马歇尔计划要求受援国公开国内经济资料，并且接受美国对本国经济的干预。苏联认为这将导致“某些国家干涉另一些国家内部事务”，退出了巴黎会议。这样，“欧洲复兴计划”就变成了“西欧复兴计划”。

7-8 月，苏联先后同波、匈、捷、保、罗等 5 国签订了贸易协定，以帮助它们恢复和发展经济，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这就是与马歇尔计划对着干的“莫洛托夫计划”。9 月，苏、波、匈、捷、保、罗、南、法、意等 9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华沙举行会议，号召加强欧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交流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协调各成员党的活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并决定建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总部设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苏南交恶后，总部移至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

1948 年 2 月，美、英、法、比、荷和卢森堡 6 国会议商定将西方在德国三个占领区合并，组织联邦德国政府。苏联随即宣布退出盟国管制德国委员会，并对西方进入柏林地区进行交通限制。3 月，在美国的推动下，其他 5 国代表在布鲁塞尔签订“合作和集体防御条约”，并提出建立北大西洋安全体系的建议。6 月 8 日，美、英、法宣布在其占领区发行“西”记马克，迈出了分裂德国的第一步。次日，苏联决定切断西方进入柏林的水陆通道，只留了三条空中走廊，西方国家只能开辟空中补给线来维持柏林占领区的生存（到 1949 年 5 月，“柏林空运”飞行架次超过 26 万次，创造了单机间隔不到 5 分钟，单日空运量超过 1.2 万吨的纪录），是为**第一次柏林危机**。这次危机历时 11 个月，是美苏冷战的第一次较量，它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加快了德国的分裂。6 月 22 日，苏联宣布在苏占区发行“东”记马克，当夜美国在柏林发行西方马克。这一年的年底，柏林正式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1949 年 1 月，苏、波、匈、捷、保、罗 6 国代表在莫斯科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CMEA）。号称反对侵犯各国主权及其国民经济利益的马歇尔计划，“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阿尔巴尼亚随后也参加了“经互会”。“经互会”的运作对建立社会主义阵营起了促进作用。同年 4 月，美、英、法、比、荷、卢、加、丹、挪、葡、意和冰岛 12 国的外长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公约规定：缔约国实行“集体防御”，任何缔约国同他国发生战争，必须给予援助。8 月，这个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正式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形成。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即宣布武装介入，第七

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战争初期，北朝鲜军队迅速推进，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形势急转而下。10 月，美军越过三八线，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中朝军队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反复较量，攻防频繁转换。双方战场总兵力最高时达 300 万以上，伤亡都非常惨重（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兵力 135 万，伤亡失踪 36 万）。经过 2 年边打边谈的艰苦谈判， 1953 年 7 月，终于在三八线附近的板门店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朝鲜战争不仅加剧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矛盾与冲突，而且对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的复杂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0-1954 年，美国参议员麦卡锡领导所谓“抵制共产党渗透政府机构的活动”，一度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运用非法手段进行调查审讯，以“亲共和反美活动”为借口任意捕人而造成大量冤案。1954 年底麦卡锡遭到参议院表决谴责，被撤除职务，**“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t）闹剧虽然收场了，但弥漫在美国政界的反苏反共的阴魂仍然迟迟不散。

1953 年 1 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时任国务卿的杜勒斯主张“用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等和平手段来“解放”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而非简单的“遏制”。他在国会听证会上说：“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太无知了。”这就是所谓**和平演变**战略，即通过思想、文化渗透，宣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通过和平环境下的潜移默化，动摇共产党人，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仰，进而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为此，美国成立了新闻署，直接领导“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插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事件。和平演变后来成为美国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斗争战略。

1955 年 5 月，北约正式接纳西德为成员国。

也是 5 月，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保、匈、东德、波、罗和捷在华沙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华沙条约组织**（WTO）成立。华沙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就一切有关他们共同利益的国际问题进行磋商；当缔约国之一遇到武装进攻时，进行联合防御；缔约国不参加与华约相反的任何同盟，不缔结与华约相反的任何协定。这样，在欧洲就形成了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同盟的直接对峙。

1956 年 2 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世界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资本主义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平共处**将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他还指出，也可以通过和平竞赛和国际裁军避免和防止战争。西方认为这是苏联对资本主义态度的重大变化。会议后期，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在社会

主义国家引起了不小震动，西方世界也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

1959 年 1 月，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武装推翻了亲美的古巴巴蒂斯塔政权，随即没收了本国和外国主要是美国大庄园主的土地，将私人企业包括大量美资企业收归国有。1961 年初，美国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4 月，美国组织和支持古巴流亡分子在吉隆滩发动武装入侵，制造了“猪湾（吉隆滩）事件”。这个事件加速了古巴与苏联的军事合作。1962 年 8 月，美国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遂对古巴进行海上封锁，并要求苏联撤走导弹。10 月，赫鲁晓夫向美国总统肯尼迪建议以苏联撤出导弹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肯尼迪表示同意。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把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危机结束后，它们都意识到必须设法避免核讹诈的摊牌。

1961 年 6 月，由 20 多个国家发起的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筹备会议在埃及开罗举行。同年 9 月，由南斯拉夫、埃及、印尼、印度、阿富汗发起，第一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 25 个国家的代表。**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不结盟的主张最早是 1956 年 12 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南斯拉夫会谈的联合声明中提出的。不结盟运动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宗旨和原则，对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斗争给予大力支持，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和霸权主义则坚决反对。

1961 年 8 月，民主德国为了阻止大量人员逃往西德（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61 年 8 月，外逃人口累计 270 万人），于 13 日凌晨，封锁了整个西柏林边界线，并从 16 日开始修筑“反法西斯防卫墙”（即**柏林墙**）。柏林墙于 1964 年建成（1975 年还进行了最后一次工程），全长 170 公里，有 9 个过境站。柏林墙是东西方冷战的一个见证，在此期间，仍有 5 千人越过柏林墙逃往西方，至少 263 人在越境时死亡。1989 年 11 月 9 日，东德政府宣布开放柏林墙，顷刻潮水一般的人流涌向西方。1990 年 10 月，德国统一后，柏林墙被拆除，只保留一小部分供参观。柏林墙的倒塌深刻地表明靠建什么“墙”是保卫不了社会主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政治独立，但在经济上依然严重受制于人。1964 年，在日内瓦第一届联合国贸发会议上，77 个发展中国家（地区）共同发表《联合宣言》，要求建立新的、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并组成一个集团参加贸发会议谈判，是为 **77 国集团**（G77）。1967 年，7 7 国集团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在阿尔及利亚举行，通过了组织宪章。这个集团的宗旨是，协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的立场，增强发展

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促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后来成员国逐渐增加，但名称依然不变。77 国集团是发展中国家力量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苏南关系破裂（1948）后，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铁托为首的南共创立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1950 年 6 月，南联邦议会通过《工人自治法》，把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实行工人自治。1963 年 4 月，联邦议会颁布新宪法，规定国家机关也实行自治原则。1971 年 6 月，又通过宪法修正案，提出把企业改造成劳动者的自治联合体，并于 1974 年正式载入新宪法。1976 年通过《联合劳动法》。南斯拉夫用了 30 年时间，将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一个具有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自治制度功不可没。但铁托逝世（1980）后，自治制度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国家失去了对经济生活的宏观控制，特别是地方分散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联邦各共和国之间长期积聚的矛盾也尖锐起来，终于导致南斯拉夫的解体。

1968 年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的 5 月，法国巴黎的学生掀起了**“五月风暴”**，这场风暴打碎了二战以后西欧“太平盛世”的神话，学生与军警的冲突不断升级，酿成了 10 日和 24 日两次带血的“街垒之夜”。工会也举行了为期一天的总罢工和游行示威，法国社会的根基遭到强烈震撼。五月风暴是第五共和国潜在危机的总爆发，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学生和工人之联合，均为历史上所罕见。由于在斗争中各种政治力量交织在一起，很难说这场运动代表了什么，但它毕竟是反对垄断资本的一场大动员，猛烈地冲击了戴高乐的统治，促进了行政和教育制度的改革。许多左派人士都是这场运动的同情者、支持者，甚或参加者。

8 月，苏联等华沙条约国家（罗马尼亚除外）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号称**“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紧接着“勃列日涅夫主义”出笼，东欧国家变得死气沉沉，他们的政权也因此失去了民心。“五月风暴”和“布拉格之春”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都遇到了严重的麻烦。

从 1968 年起，匈牙利根据社会主义工人党九大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展开了全面的经济改革。这个原则可以概括为：党提出政治目标；政府机构和地方议会把目标变成具体的经济纲领；企业“以适度的独立性”执行它们所承担的义务。在农业方面，扩大生产合作社的自主权和经营权；促进自留地经济的发展；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民得到实惠。在工业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可以自订计划；建立国家、协议和自由价格并存的价格体系；工资也由基本、工龄和浮动工资三部分构成；企业有权同外商签订合同。**匈牙利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国民收人年增长率达到了 5-6%。匈牙利的商店和农副产品市场供应是苏联东欧国家少见不用排队

的。在对外关系方面，匈牙利小心翼翼追随苏联，以免被无端干涉。

1969 年 1 月，尼克松上任，开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从越南和亚洲收缩，协调与西欧、日本的关系，对苏谋求缓和，并着手改善中美关系。7 月，尼克松提出以“伙伴关系”（协调与西欧、日本的矛盾，分摊“负担和责任”）、“实力”（安全防务用充足论代替优势论，从亚洲收缩力量以确保战略重点）和“谈判”（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以谈判代替对抗）作为“新的和平战略”三大支柱的**“尼克松主义”**。这年 3 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提出一整套实现“欧洲缓和”的主张，建议东西方尽快对话，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勃列日涅夫又在苏共二十四大（1971）上提出“和平纲领”，宣布“缓和”是苏联外交的首要任务。美苏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就限制战略武器、经济贸易、科技合作等签订了几十个协议，使东西方关系弥漫着一派“缓和”的空气。

1969 年 10 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组成联邦德国新政府。社民党主席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提出**“新东方政策”**。1970 年 8 月，勃兰特亲赴莫斯科同苏联签订“友好合作条约”。12 月，他又飞往华沙，签订联邦德国—波兰条约。1972 年 11 月，东西德代表在波恩签订“关于两国基础的条约”，彼此承认是主权国家，相互建立正常的睦邻关系。“新东方政策”不仅打开了西德东进的大门，而且加强了东西方的交流与合作。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发表《上海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最终将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该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打破了中美长期敌对的僵局，中美关系的改善是 20 世纪后期最重大的国际事件之一，它改变了世界政治天平的份量，使大国“博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72 年 11 月，根据苏联的提议，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筹备会议，32 个欧洲国家加上美国、加拿大与会。**欧安会**（CSCE）正式会议从 1973 年 7 月开到 1975 年 8 月，最后签订了《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施和安全与裁军的某些文件》、《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合作》等最后文件（即《赫尔辛基宣言》）。苏联希望通过欧安会固定欧洲边界现状，文件特别提到“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但欧安会文件是一个非强制性文件，无论西方集团还是苏联集团都不受其约束。1994 年 12 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欧安会首脑会议上，

决定从 1995 年起，欧安会更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

1973 年 1 月，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巴黎协定》），标志着美国 1961 年以来介入越南战争，逐步升级，最后不得不承认的失败。1975 年，越南北方军队和南方人民武装发动“春季攻势”，彻底击溃了南越军队。越战期间，美国向越南投下了 800 万吨炸药，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战场投弹量的总和，造成越南 160 多万人死亡和印度支那 1 千多万难民流离失所；美军死亡 5.8 万人，受伤 30 多万人，耗费 4 千多亿美元。美军在越南最多时人员达 54 万，时间长达 12 年，**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心灵创伤，同时也改变了美苏争霸的格局。

进入 1970 年代，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元气大伤，美苏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苏联不仅在常规力量方面超过美国，而且在战略核力量上也与美国取得了均势，逐步完成了向战略优势的转变。苏联在鼓吹“欧洲缓和”的同时，在第三世界与美国展开激烈的争夺：1971 年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1975 年插手安哥拉内战；1978 年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 年更是直接出兵侵占阿富汗。苏联还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居心叵测。这十年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严重威胁着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1974 年 2 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美苏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早在 1957 年，毛就指出，除了社会主义力量外，国际社会还存在三种力量：坚持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中间地带）；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第一中间地带）。1960-70 年代，国际政治大分化大改组，先后独立的一批亚非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作用增大；社会主义阵营也由于苏联搞霸权主义处于分裂。这个新概括，体现了毛关于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在新形势下的运用，扩大了世界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1974）中提出**“世界体系论”**，这个理论以体系代替国家，从全球角度对资本主义这一世界性历史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世界体系是由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结构。核心输出制造业产品，边缘输出农业初级产品、工业原料和自然资源，半边缘则输出“边缘产品”到核心地区，又输出“核心产品”到边缘地区，它是世界体系的稳定因素，具有既被剥削又剥削人家的双重角色，而这正增加了体系的异质性和多元性。事实上，世界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效应。1990 年代，沃勒斯坦修

改了某些观点，特别是嵌入了“文明”的考虑。他认为人类现在还处于世界体系发展的第三个时期，面临着各种反体系的挑战，由于其他文明的崛起，未来的全球化应是多种文明的共存。他甚至预言 21 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让位于后继的体系。

1970-80 年代，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革命阶段。主要标志是，科学技术的物质化、集约化和社会化过程非常强劲，新技术、新机器、新材料的创造及其日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龙头的高新技术，生长出一系列新兴的产业部门，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各国经济的显著增长，主要发达国家开始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这场革命，人们一般称之为**“新技术革命”**、“第三次（或第四次）产业革命”，也有人称之为“第三次浪潮”（相对于第一次农业、第二次制造业的浪潮）。

当代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方面都有许多新变化，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贫富差距仍在扩大，但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状况已有了很大改善。它们通过税收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占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3，其中一半以上用于社会福利开支，从而为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提供了相应的保障，社会矛盾得到了缓和。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影响不断减小，经济危机的破坏力也明显下降。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有时还表现为加速的发展，发达国家经济占全世界的比重还在扩大。第三，发达国家加大了信息、能源、材料、航天和生物领域的研究开发，科技与生产力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促进了一大批新兴产业群的出现，扩大了市场容量，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第四，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金融、信息和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在发达国家经济中已占 2/3 的分量，第一、第二产业工人数量减少，第三产业从业者大幅度增加。劳动者队伍也出现了知识化的新趋势。这些因素加起来，促使自由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并进一步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国际垄断组织（跨国公司）的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了全世界。

1981 年，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提出以实力求和平的“新遏制战略”。1984 年，里根推出反弹道导弹的战略防御计划（SDI，即“星球大战计划”[Star-wars]），目标是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手段的反弹道导弹综合防御系统，这也是美国继阿波罗登月计划后又一项重大的国家过程，试图以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在以后的几年里，里根政府振兴经济措施得力，恢复了美国的军事优势，也扭转了与苏联争夺中的被动局面。而苏联由于 1970 年代的大肆扩张，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综合国力下降，不得不从对外扩张转向全面收缩，甚至放松了对东欧等地区的控制，并最终退出这些地区。

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上台后，实施“加速发展战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从 1988 年 6 月开始，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亦从“完善社会主义”转向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建立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根据他的“新思维”，倡导“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加剧了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苏联形势每况愈下，最后导致列宁创建的、拥有近 2 千万党员的苏共毁于一旦，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的瓦解。

1989 年 1 月，布什就任美国总统，提出对苏**“超越遏制战略”**。它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在保持强大军事实力防止苏联扩张的同时，应更多地利用经济科技优势，抓住苏联东欧改革的时机，以经济、技术援助为诱饵，诱压兼施，促使苏联朝国内“改革”和国外收缩的方向发展，最终“改变苏联制度的基础”。其实质就是在遏制的基础上，和平演变苏联。“超越遏制”与以往的遏制相比，一是目标更高，意在改变和战胜（而不是限制）共产主义，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二是空间更广，深入到苏联东欧国家内部（而不是周边）；三是手段更多，那就是在军事力量基础上（而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手段推进“和平演变”。

1989 年夏，美籍日本人弗郎西斯·福山发表纪念冷战结束的文章《历史的终结》，认为 1980 年代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不仅仅意味着冷战的结束，而且是历史本身的终结。这些变化无可争辩地表明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胜利，是“人类思想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在他看来，人类未来还将面临经济、技术和环境方面的挑战，以及犯罪和毒品等严重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足以构成瓦解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将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也就在这一时代宣告终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反映了西方（尤其是美国）人士对资本主义前途的乐观情绪。

1980 年代以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不同层次的集团化经济，但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只有美、欧、日三家（它们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 70%以上）。这些集团化经济本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国际结合的一种形式，体现了各成员国垄断资本既竞争又联合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组织则具有另一种性质，主要是加强成员国的集体自力更生能力。但由于力量悬殊，它们还不可能同大国主导的集团相抗衡，有些组织还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所有集团虽有一定的保护倾向，但现在都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同其他集团的经济联系，集团间贸

易呈现不断增长的势头，资金流动则主要在美欧日之间进行。西方国家生产资本输出逐渐取得了在资本输出中的决定性地位，且把重点转移到发达国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国际化的独特现象。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发达国家抓紧了对外直接投资，不但增加了集团区域内的投资，也更加重视到对方国家或集团进行投资。1980 年代末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比 10 年前增加了 2 倍，其中 80%集中在美欧日，只有 18%在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跨国公司起着重要作用。跨国公司不仅跨国，而且跨集团，它们在全球范围开展业务，控制着国际直接投资的 90%，世界生产的 40%，出口总额的 2/3 和技术转让的 1/3。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就地生产和销售，全世界生产和销售有 20%是在国外进行的。

§5．2　大胆利用资本主义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伟大预言以来，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制度筚路蓝缕，社会主义理想激励着一代代人为之努力奋斗。但同样无可争辩的是，资本主义并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且仍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短期里恐怕也不会发生大的“颠覆”。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并且要有同资本主义长期打交道的思想和行动准备，只有大胆利用资本主义，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重温马克思“两个决不会”教诲

在二战以后半个多世纪里，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幅度不断减小，经济危机的破坏力明显下降，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有时还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了全世界的 3/4，仅美国一家就占了 1/4，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科技革命，促进了新兴产业群的出现，创造了新的消费热点，同时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科技革命使社会生产力不断从外延式（粗放的）增长转向内涵式（集约的）发展，现代化生产的劳动者已经从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体力智力劳动结合，甚至以智力劳动为主了，人们利用新科技的成果，实现了生产工具的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并大大扩展了生产空间即劳动对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 世纪初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 5%到 20%，20 世纪中期上升到 50%左右，1980 年代以后达到了 80%。战后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对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的扶持，特别是 1990 年代以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已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进入了所谓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社会时代。“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①]

新科技革命带动产业革命，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缓和社会矛盾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为生产关系的调整提供了直接动力。生产的扩大化以及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带来了所谓“管理革命”：首先是科学管理取代了经验管理的“泰罗制”（Taylor system），再是以流水线作业、大宗生产为代表的“福特制”（Ford system）；20 世纪后半叶又出现了“弹性生产方式”（flexible production），这种以“精益生产”、“大规模定制”作为其微观特点的生产方式比较好地适应了多元化市场发展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2 页。

的需要。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管理创新，都培育了新的激励机制，给 20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带来了活力，客观上也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某种契机。资本主义为了调整生产关系，首先是在微观层面上改造了资本组织形式。1920 年代，西方企业通过大规模纵向兼并形成康采恩（Konzarn）股份公司；二战以后，又出现了混合联合股份公司，而 1980 年代的并购浪潮又是对混合联合股份公司的重组调整，跨国公司与横向兼并形成的托拉斯（Trust）相结合组建了庞大的国际托拉斯股份公司。

在美国，1952 年股票持有者占全国人口的 4%，1980 年达到 13%，现在高达 60%。一个企业的股东由原来几个几十个，变成成千上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个。股东控制公司的成本是与股票分散程度成反比的，当股票分散化达到一定程度时，个别股东掌控公司的成本就很高，这在经济上既不合算，也没有必要。因此，每个所有者拥有某个企业的股票份额比例越低，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直接控制力就越小，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就越彻底。职工持股的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并加速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向社会化转化，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化。

另外，资本主义社会基金机构（如养老保险基金本身就具有社会公益性质）也很活跃，它们把分散的社会资金筹集起来交给投资专家运作，个人也愿意委托这类机构来代理行使所有者职权。基金机构为个人投资开辟了交易成本小、风险比较低的中介机制，被普遍看好。美国基金机构持股占上市公司的比重现已超过了 30%。

产业革命和管理革命又引起西方社会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阶级（层）结构的很大变化。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产值逐步占了经济总量的 60%—70%，甚至更高，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使从事智力劳动的工作者（“知识型劳动者”）人数也扩大了。伴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以智力资源与知识占有、配置、生产和消费为基本要素的经济时代，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让位于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已不足就业人口的二成，而一支新的由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组成的中间阶层构成了西方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力量，他们占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这样的阶级（层）结构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因此，现在已经很难用“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来概括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20 世纪垄断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国家（政府）为中心建立起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分别从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运作等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调节。政府行使公共权力，通过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劳动法、环境法等法律和强制性行政行为来规范市场。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也增强了他们的参政能力，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增加了，各种民主的范围扩大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紧张关系。

尽管当代资本主义调节力度在加大，调节能力在增强，调节手段在改进，但“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还在实现的趋势。”[①]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许多变化，资产阶级政府也积累了管理国家、缓解社会矛盾的经验，但这些变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个“死结”。相反，资本主义在其自身矛盾运动的作用下，越来越朝着自我否定的方向发展。

战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政策，社会福利不断增加，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这种提高同资本家阶级的财富增长比起来仍然是望尘莫及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973 年是 4 万亿美元，2000 年达到了 10 万亿美元，但劳动者的收入却不可能与之成比例增加，由于资本主义无法从根本上克服两极分化的趋势，广大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也就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改良和改善，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西方国家大力发展‘新经济’，加速推动经济全球化，造成了西方国家的财富不断增加，但这些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这个基本矛盾的许多表现又被推向了全世界，南北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了。

但是，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形态毕竟还没有走到尽头。

>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此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④]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未来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的一种成熟社会形态，这个新社会的物质前提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这个新社会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在占统治地位的各文明国家“同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9 页。
③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胜利”的产物。他们认为，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能够像欧洲移民带去先进的生产方式而跨越社会经济形态的美国一样，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就可以“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①]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两个必然”终将实现。但我们也看到，资本主义发展仍然有很大的潜力，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远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切不可低估资本主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适应和提高生产力的能力。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比原来预测要长得多的历史过程。

重要的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出来的经验，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

借鉴资本主义“新社会因素”

江泽民在谈到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时指出，从经济、科技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得多。我们不承认、不正视不行。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没有因为西方国家经济、科技的发展而有本质的改变，但“它们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作法，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西方国家还采取一些措施和手段来限制过高的收入和过度的垄断。“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它们在税收、福利政策、企业组织结构以及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调节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特别是它们吸收和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还要看到，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条件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优势，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这也是它们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一方面，绝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马克思认为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现象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论断。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研究，作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①]

资本主义发展本身蕴涵着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因素。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有这样一段话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的新社会因素。”[②]而今天最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也就是这些“新社会因素”：股份制经济、国有经济与合作经济所表现的资本社会化；不断完善的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税收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1/3 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用于社会福利开支）；城乡日益融合的一体化和工农差别的弱化；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对市场经济实行政府干预宏观调控，及其一整套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

马克思曾经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为：“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③]资本主义在其自身矛盾运动的作用下，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要求，向着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生产方式过渡；对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当然更没有理由不学习，不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

毛泽东早在 1956 年就提出中国应该容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货币，要认识到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我国的企业管理要突破苏联集权管理模式，创造出一套能够调动干部和工人两个积极性的企业管理形式；提倡自力更生为主，又尽可能多地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毛也希望在经济体制上有所创新。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④]邓讲这个话时（1985 年）苏联还没有垮台，但他已认为苏联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后来邓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⑤]

---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 58-5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41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39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中国的改革，从有意识地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到确认我国必须搞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到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迈向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突破了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突破了社会主义要搞只能搞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

今天，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五大支柱”不断加强：以公司制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大力推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市场体系基本形成，生产要素市场初具规模；间接调控为主的、比较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开始发挥主要作用；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逐步深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稳步推进。

2003 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新一届党中央出台的一个重要文件。[①]《决定》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无疑将加快国有企业多元化的速度，使更多的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于国有股份公司，通过股份制使之都变成社会资本。这是对传统公有制概念的重大突破。

关于产权制度，《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这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关于公司治理，《决定》提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完善企业领导人员的聘任制度。”“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职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继续推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深化劳动用工、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创造企业改革发展的良好环境。”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劳动关系和劳动市场，提供有利于现代企业发展的制度安排，这也是政府调节社会关系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①]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2003 年 10 月 22 日。

关于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决定》要求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健全个人收入监测办法，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完善和规范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推进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同时要加快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健全社会医疗救助和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积极探索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采取多种方式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等等。这些措施都借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促使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要手段。

当然，对资本主义吸收借鉴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当代资本主义应付危机的能力之所以加强了，还在于它们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法治制度，包括切实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比较完备的民主程序和监督机制，日益扩大的政党政治基础和社会力量参与的“公共领域”等等。这些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慎重对待。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高票通过的宪法修正案（2004）写入“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就是一个重要标志。但要落实这些条文，必须使宪法真正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贯穿和渗透到公民一切活动中。没有宪法的权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依法治国；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追究。现实社会主义只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框架，还远没有达到完善程度，在执政党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权力资源的配置和制约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资本主义的扩张受到了很大阻碍，因为出现了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成了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两种发展模式的对立、斗争又并存的世界格局。事实上，资本主义之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控，对公共事业进行投资，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建立社会保障的福利制度，保护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等调整和改良措施，既是这些国家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在起作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在探索自身解放和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也为这些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围”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制度选择。20 世纪末，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巨大挫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

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取得全面优势，在它们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老的世界格局打破了，新的格局还没有建立起来。

就客观条件而言，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主观原因来说，主要的就是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很好地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特别是那些“新社会因素”）。列宁晚年就明确反对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说法，“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①]1992 年，邓小平针对有些人的责难语重心长地说，我这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就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②]从现实情况看，社会主义必须同资本主义打交道，两种制度也将长期并存。

>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才能顺利建设成功。但是，在过去长时期内，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只看到前一面，而看不到后一面，就陷入了认识上的片面性。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进步。”[③]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二次大战爆发后，苏联与美、英等共同反抗法西斯的合作也使斯大林把和平共处抬到战略意义的高度。即使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也一直谋求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妥协与合作，认为两种社会制度可以进行“和平竞赛”。1950 年代中期，中国就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毛泽东明确指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半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展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邓小平在 1988 年几次谈话中都指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最经得起考验，“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④]中国领导

---

① 《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2 页。

② 见吴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13 页。

③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4-205 页。

④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59-360 页。

人多次声明，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也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也在曲折地走向多极化，中国共产党针对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正确处理国际事务，包括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原则和策略。“我们要顺应历史潮流，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①]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社会制度定亲疏，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社会主义中国韬光养晦，又有所作为。韬光养晦，就是立足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胸怀大志，珍惜机遇，埋头苦干，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②]即使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当头，不称霸，不谋求势力范围。有所作为，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必须做而又可能做的事就要尽力去做，而不是无所不为。我们不能超越我们的现实可能去办事情。”[③]这个方针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要求。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并把这个工作放在我国外交事务“六个继续”的首位。[④]这也是社会主义中国负责任地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充满自信的表现。

我们充分尊重各国人民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由于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的差异，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又有很强的互

---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20 页。

③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 530 页。

④ 另五个继续依次为“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继续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果。”“继续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作用，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和合作。”“继续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而在十四大报告中的表述是“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十五大报告中，有关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的内容，但是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上。

补性，完全可以通过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在一些领域实现“共赢”。其实，今天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彼此都有借鉴和利用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尽管为了各自的“前途”，谁都没有放弃与对方的斗争，有的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它们散布“中国威胁论”，甚至采取各种手法“西化”、“分化”中国，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足够警惕，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包括反贫困、人权保障、防止核扩散、环境保护又是整个国际社会严阵以待的全球性问题，需要有解决问题的全球性行动，而这些行动没有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至今还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国际形势也显现出许多新的特点：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利因素在增加，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奉行多边主义、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共识。然而，天下并不太平，传统安全问题还没有解决，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又突显了出来，特别是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传染性疾病日益成为世界人民的“公害”，对各国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愿意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一起，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安全、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所谓“互信”，就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所谓“互利”，就是指顺应全球化趋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各国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所谓“平等”，就是指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应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所谓“协作”，就是指各国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通过合作消除战争隐患，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

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与日俱增，国家之间既有许多共同利益和合作领域，也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但都应该“坚持对话，不搞对抗”，扩大积极面，减少消极面，通过对话增强信任，通过交流推动合作，避免磨擦和对抗，中国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竞争合作的过程中，坚持自己的制度，保护自己的安全，争取更大的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那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

§5．3　面向时代，迎接挑战

1990 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期又跌到了谷底。以往社会主义者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上，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至少促使人们认真地去思考社会主义遭遇挫折的自身原因。回顾社会主义的实践历史，除了没有很好地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外，还有一个重要教训是，社会主义国家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脱离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特点和各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结果导致了社会主义理念期待与社会主义现实状况的严重扭曲。

时代主题的转换

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总是与时代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只有科学地分析国际形势，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时代主题，才能透过风云变幻，洞悉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大势，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否则，偏离时代轨迹，背离时代要求，就会盲目行事，一意孤行，不但没有了发展的坐标，甚至有可能失去存在的理由。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只有“首先估计到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②]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是以各国实力为基础的，而帝国主义势力扩张又必然加剧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最后就只能用战争来重新分配资本主义大国的各自份额。“‘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③]帝国主义的掠夺、侵略和争夺霸权的战争使世界上各种矛盾，特别是无产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从而在资本主义统治上出现薄弱环节，有利于革命活动的发展。“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④]。20 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充分印证了列宁关于“战争和革命”时代论断的正确性。

---

① 《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43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5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74 页。

二次大战以后，一方面，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展开了全面竞争和对抗；另一方面，由于各国人民对战争的极度厌恶和抵制，资本、生产、技术和贸易的日益社会化，以及解决国际争端主要采取谈判而非武力的方式，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已经逐步减小。列宁当年提出“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些基本特征，有的不存在了，有的改变了形式，能不能准确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包括正确认识和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

1955 年，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涉及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关于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以及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提出了“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的主张。这些主张注意到二战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应该肯定的。但赫鲁晓夫片面地认为，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帝国主义侵略的本性已经改变了，可以通过全面的国际裁军建立没有武器、没有军队和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从根本上避免战争。对于苏共“三和”路线，中国共产党认为它抛弃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中共认为，是否爆发世界大战有两种可能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帝国主义是现代侵略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就依然存在。但是，各国共产党人团结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开展保卫和平的斗争，就有可能防止新的世界大战。

然而，我们后来还是过分强调战争不可避免和世界革命的临近。[①]1966 年 8 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指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②]1970 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五二〇”声明，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③]中国坚持“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④]基于这种判断，中共在决策上制定了立足于“以革命制止战争”或“战争引起革命”，国内积极备战，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打完了再建设；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宣传

[①] 毛在 1957 年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8-239 页）

[②]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 14 日。

[③]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84 页。

[④] 《人民日报》1972 年 2 月 28 日。在 1972 年中美会谈中，基辛格曾提出将“人民要革命”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后来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毛主席在审定公报时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39 页）。

“井冈山道路”通天下。但是，“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①]结果中国未能根据时代变化进行战略调整，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去。“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非常可惜的。”[②]

事实上，也是在 1970 年代，苏联在主张“欧洲缓和”的同时，大力发展军备，还打着“世界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与美国争夺霸权，一度有咄咄逼人之势。1981 年里根政府上台，提出以“实力求和平”，以冷战、对抗代替缓和、对话，通过振兴经济恢复军事优势，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而苏联由于长时期内将大量人、财、物资源用于军备竞赛，背上了沉重包袱。据统计，从 1965 年到 1981 年，苏联的军费开支由 326 亿卢布增加到 1550 亿卢布，每年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2%-14%，占全国财政支出的 1/3 以上。这就严重影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的增速急剧下降（从 1970 年代初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七点几下降到 1980 年代初的百分之二点几）。 “星球大战计划”拖跨了苏联，在这一点上，“星球大战计划”是苏联垮台的一个主要因素。[③]

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 20 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但是，如果不从资本主义也在变化的现实出发来认识和对待它，不承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除了矛盾斗争的一面，还有借鉴合作的一面。仍然固守原来的思维定势，指望通过“世界革命”尽快消灭资本主义，就会错过利用战后世界经济形势加速自身发展的时机，结果在与资本主义的全面较量中败下阵来。

1980 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谁战胜谁的斗争还在继续，并将长期存在下去，但它已不再是世界的主要矛盾了。“战争与革命”已经不能够概括新时代的特征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坚持原来的战略，不进行调整，不提出新的对策，就不仅不能发展社会主义，而且连已经取得的成果都可能葬送掉。邓小平果断放弃了战争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的看法，认为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④]邓审时度势，指出和平与发展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⑤]中国要做的事很多，归根到底是两件大事，一是和平问题，一是发展问题，这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中国发展了，全世界要求和平的国家发展了，就

---

① 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66 页。
③ 见[美] 马库斯·拉斯金：《民主与文化的反思》，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9 页。
④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2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5 页。

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①]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经济和科技领域，从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危为安，就必须把握好这个时代主题，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很不太平。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今天更加体会到这一判断的深远意义，它指导中国抓住世界和平的机遇，利用好世界发展的环境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同时也要求我们维护世界和平，为自身的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条件。中共十六大报告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确立为中国外交的宗旨（此前的提法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反映了我们党对“世情”的深刻把握。显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也正是基于这个带有全局性的判断。

改革本身就是一场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苏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了苏德战场的胜利，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战后东欧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阵营”， 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高潮。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美国家（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 1950-60 年代的非殖民化时期，先后有一百多个国家获得独立，殖民体系终于土崩瓦解。社会主义由一国胜利发展到多国胜利，有力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1970 年代，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 1/3、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1/4 以上，工业总产值占了世界总量的 2/5，国民收入占了世界总量的 1/3。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遏制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

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苏联只用了二、三十年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二大强

[①] 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讲话，《人民日报》1986 年 5 月 21 日。

国；新中国很快摆脱了一百多年来积贫积弱的困境，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显示出社会主义巨大的优越性。尽管后来发生了严重挫折，但社会主义国家毕竟勇敢地迈上了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由于这样一种制度选择的压力，资本主义也不得不进行改革，一方面通过国际分工的优势地位，把许多发展成本转移到外部世界，另一方面也在本国家建立起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了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如今看来好似势不可当的资本主义制度当时只要再错几步就会消亡。”[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对头，就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资本主义。

然而，1970 年代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主要的原因，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战后恢复和重建，利用产业升级和新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并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缓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分配政策的调整也抑制了社会革命的发生。而社会主义国家却对与资本主义较量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忽视了资本主义随机应变的能力，没有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不断地创新。二是现实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它们往往主观上想在前资本主义基础上，越过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依靠政治力量建立比较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没有认真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后来就是这些残余发作侵蚀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而社会主义国家很久都没有找到克服这种毒害的有效办法。三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作祟，以“老子党”自居，颐指气使，对他党他国发号施令，损害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严重分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元气大伤。[③]另外，苏联还到处输出实际上是为了扩大其势力范围的“社会主义”模式，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形象。四就是苏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但在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中越来越力不从心；由于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军工领域，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人心思变，终于抵挡不住资本主义发动的“和平演变”攻势。

苏联的兴亡，是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教科书，它的胜利提供了鼓舞斗志的范例，失败提供了重整旗鼓的教训。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帝国主义军事包围下进行的，具有很强的战时动员色彩，而这些经验被不恰当地延伸到和平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大国自己摸索出来的道路，具有苏俄的地缘特点，而这些经验也往往被认为具有不容怀疑的普遍意义。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 521 页。

[②] [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

[③] 斯大林就明确表示，谁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否认苏联的共产国际领导权，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相当一段时期，对待苏联的态度被认为是检验是否社会主义的试金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三次大的分裂，第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分裂，第二次是苏联共产党与党内托洛茨基派的分裂，形成与第三国际对抗的第四国际；最严重的是第三次 1960 年代中苏两大党从意识形态论战发展到党际关系、国家关系的严重对立，许多共产党又分化出带括号的共产党（马）或（马列）。

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长期被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但随着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模式没有能一如既往地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斯大林及其继任者缺乏对这个问题的认真反思和正确认识，他们拒绝探索社会主义在新条件新形势下的实践形式，拒绝调整和改革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结果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孕育了深刻的社会危机。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过一些改革。1950 年代南斯拉夫试图以企业自治的社会所有制代替国家所有制，1950 年代中期由赫鲁晓夫倡导的，但不久就草草收场的改革。1960 年代中后期，闹出了“布拉格之春”的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市场取向比较明显的“匈牙利道路”都尝试有限突破苏联体制。中国也提出吸取苏联教训的问题，并作过一些调整。然而，主要还是由于“左”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些改革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都半途而废了。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①]一直到 1970 年代后期中国，1980 年代中期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意识到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才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

1980 年代，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的展开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初步回答解决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的成功显示出社会主义仍然具有勃勃生机。

而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在指导思想和重大决策上出现失误，方案激进却无从部署，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改革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苏东共产党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就背着多年的包袱去同反对势力搞多党比赛。1989-1990 年，东欧国家纷纷改弦易辙；1991 年末，苏联共产党被解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轰然解体，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又跌入谷底。

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表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还远没有成熟，“在建设的领域内，马克思主义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所以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②]十月革命后，列宁有关社会主义有两个十分重要的见解，一是认为“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③]这抓住了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现实问题这个要害；二是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是长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61 页。
[②] 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 141 页。
[③] 见《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466 页。

期的、艰巨的，开始容易，继续困难，因此必须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①] 可惜这些教诲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改革不行，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也不行。20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使我们对于眼下低潮状态有了更符合实际的看法。

> “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②]

同样是社会主义名义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使社会主义焕发出生机活力，苏联东欧的改革却导致了崩溃性的悲剧，最重要的，中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进行改革，而苏联东欧后来演变成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向”。也就是说，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道路，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走出一条活路。

中国的实践表明，革命的道路不能照搬外国经验，建设的道路也不能照搬外国模式。“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③]建设社会主义，同样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与时代发展要求结合起来，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索适合本国情况、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道路；至于成功与否，归根到底也要由各国的实践做出回答。“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④]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即使谁犯了错误，也要由他们自己来纠正。[⑤]

社会主义理念的实践向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正在并将继续显示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中国的成功大大改善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而且将对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社会主义中国“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

[①] 见《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3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19 页。
[⑤] 在中共十四大（1992）以后的《党章》有关部分，没有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提法，提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表明了我们党超越意识形态，愿意同一切愿与我们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我们党现在同世界上 150 个国家和地区 400 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交往局面已初步形成。

义优于资本主义。”[①]社会主义在改革，资本主义也在改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再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关系，它们之间有对抗和斗争，也有妥协和合作。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社会主义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吃掉社会主义。“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像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②]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规律。

> “坚持与时俱进，就要正确回答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的问题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③]

经过这些年来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照搬书本上的教条和别人经验，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最后都会造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损失。因为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没有固定的模式等着你来套用。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拿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在中国，就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④]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对国外先进东西的学习和借鉴，也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当今社会主义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焦点集中在：在经济上如何实现社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第13-14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第11-12页。
[④] 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第15页。

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好地相结合；在政治上如何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在发展模式上如何更有效地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好地相结合。如果说，十多年前人们还在为市场经济是否比计划经济具有整体优势而争论不休，那么，今天这个问题至少在中国已经尘埃落定了。现在必须引起重视的是，试图“通过不断依靠市场机制的方法来纠正集权计划经济的畸变和失调，一开始可能会取得某些成功，但最终会使官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弊端纠缠在一起，愈演愈烈，而不是相互制约。”[①]市场经济未必就是“好的”经济；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来说，避免掉进“坏的”市场经济，掉进“裙带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为市场经济的良性运作提供一个制度上的保障尤为重要。

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着许多弊端，如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以及由于惟利是图而忽视公平和道德，表现为经济人追求短期行为、国民经济结构性失调、外部不经济情况增加、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因此就必须用“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来纠正“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的失灵，但政府的宏观干预又不能随心所欲，否则政府也会失灵。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是法治的，它是通过法的规制，而不是个人好恶来调整市场关系的，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合理的预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这就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以及最大限度地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还是政府干预过多，政府权力没有法律约束。政府任意干预经济（譬如以行政权力限制竞争、宏观干预过度，以及代替经济人决策）或者政策朝令夕改都不利于形成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经济环境。事实上，企业改革难有实质性突破，国有银行改革步履蹒跚，行政性垄断低效无序，权力进入市场导致社会腐败，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要求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有退有进，退出一些不属于它控制和干预的领域，进入应当而且必须由它进入的领域，从传统计划体制下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直接干预的无限政府，通过制度设计，转变为进行间接干预，受法律约束的有限政府。

二、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好的”市场经济不但要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还要求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保证我们更好的前进。“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③]

[①] 曼德尔：“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5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05页。

[②]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7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的决策都是分散的，所体现的平等参与、自由选择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成果就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宝贵经验，包括以选举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分权和权力制衡制度、政党政治、依法治国的法制权威和舆论监督等等。[①]

马克思设想，无产阶级的新型民主是要把社会委托给国家的权力重新还给社会，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但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实际上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的政权，列宁因此而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②]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后，邓小平也说过类似的话，“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社会主义就是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③]这也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要求。然而，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消除了以往国家的剥削阶级属性，但并没有最终克服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的一般属性，权力被高度集中在“管理者”手中，他们表面上是国家的代理人，实际上把国家当成了升官发财的手段，从而使国家又变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威。在这种体制下，人民民主徒有其名，最终必然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官僚体制垄断权力，社会生活长期缺乏民主，是苏联覆亡的政治方面的原因。”[④]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看，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主同样是死路一条。

三、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现代生产方式所要求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包括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也越来越需要社会性的管理，客观上也就越来越要求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就明白表示致力于为人类所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⑤]“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⑥]这个论断实际上就已经包含了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社会主义原则。显然，只有站在全人类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才能真正实现“人同自然的和解”和“人同自身的和解”，真正促进人类的

---

① 见吴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第 102 页以下。
② 《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16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68 页、第 322 页。
④ 黄苇町：《苏联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5 页。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603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26-927 页。

健康生存和可持续的发展。

尽管今天人们还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两个和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环境问题全人类都必须认真对付。对各国来说，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寻找新的发展出路、谋求新的发展战略、选择新的发展模式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无疑是首要的，但发展又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用无法弥补的环境代价来换取眼前的收益。尽管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民族、所有文化的发展模式，但所有发展都应该是可持续的。

重要的是，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解决环境问题的权宜之计，它更着眼于人类健康、公平和协调发展的未来。为此就必须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上进行目标是可持续发展的改革，补救已经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建立与环境相协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必须对人们的行为有所限制，以避免向环境的过度索取和过度排放，防止自然满足能力的下降，同时努力开发自然的潜力、改善自然的状况，促进自然满足能力的提高。人们不仅在对待自然的手段和行为方式上，而且在预见可能产生的结果上都必须采取明智的选择，将有限资源的单纯经济利用转变为经济、社会与生态综合利用，循环利用。这就意味着人们不得不放弃一些局部的、短期的利益，调整其与人类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关系，具体表现在正确处理有关环境的适应与改造、利用与保护、索取与补偿等许多关系上。

第六章　社会主义的多样表现

§6．1　大事记

1970 年代，美国苏联一面高唱缓和，一面争夺霸权。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势力扩张；1980 年代初期，美国里根政府推出“星球大战计划”，试图用军备竞赛拖跨苏联。不久，戈尔巴乔夫上台，调整了苏联外交战略，1987 年，美苏签订中程导弹条约。1989 年，美国布什政府提出“超越遏制战略”。1990 年，东欧国家纷纷改换门庭，这年 10 月，两德统一，11 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巴黎首脑会议宣布战后欧洲冲突分裂的旧秩序结束，美苏也原则同意削减 50%战略核武器。1991 年，华沙条约组织军事机构和政治机构、经济互助委员会先后解散，东西方**“冷战”结束**。特别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轰然解体，使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重大变更。

1990 年代初，11 个共产党（工人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弦易辙。东欧国家原共产党纷纷更名，转向民主社会主义。苏东剧变严重震撼了西方国家的共产党。1989 年，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建议解散共产党，更新左派，以推动意政党制度的改造，建立一个广泛联盟，争取上台执政。1991 年意共改名左翼民主党，加入社会党国际。1991 年，以意共元老为首的反对派组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宣布自己不仅是工人阶级政党，也是“所有青年、知识分子和公民的自由政治组织”。1998 年，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分裂，另外成立了共产党人党。一些没有改名的共产党，也不再提“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更加强调党的全民性质。1990 年，澳大利亚共产党解散，另外组建“新左翼党”。1991 年，美国共产党分裂，丧失了 1/3 的党员。

除了现存 5 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共产党员 7300 万，其中中共 6600 万）外，其他国家 100 多个共产党约 300 万党员（只有社会党人的 1/10）。2000 年前后，西欧各国共产党在议会选举的得票率约在 3-10%之间，只有 20 年前的 1/3。

1971 年，针对当时出现的“美国跨国公司将主宰欧洲”论调，瑞士日内瓦大学商学院教授克劳斯·施瓦布邀集 400 余名企业家和学者，在达沃斯举行了第一届**“世界经济论坛”**（WEF），研讨美国公司的管理方法。以后每年一月，论坛都在这里召开年会（也被称为“达沃斯论坛”）。这个论坛是

一个非官方的民间国际组织，旨在通过全球各界领导人的接触，研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交流经验和看法，以促进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论坛核心成员由世界政治、经济界高层人士、企业首脑及著名专家所组成，因此也被视为代表经济全球化利益的“精英论坛”、“富人俱乐部”。

为了协调西方各国经济政策，在法国总统倡议下，1975 年 11 月，法、美、西德、日、英、意六国领导人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举行最高级经济会议。1976 年 6 月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第二次会议时，增加了加拿大，形成**“七国集团”**，也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此后，七国首脑会议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了下来，每年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从 1977 年起，欧洲共同体（以后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应邀参加会议。1980 年代以后，政治问题也成为会议议题。1991 以后，俄罗斯总统应邀同七国首脑举行会后会晤。1994 年，叶利钦参加政治问题讨论，形成“7+1”机制。1997 年，叶利钦以正式身份“自始至终”与会，并以“八国首脑会议”名义发表最后公报。从此，“七国集团”变成了**“八国集团”，**但在经济问题上依然保持了七国体制。

1980 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一些概念日益频繁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一是“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构筑了新的全球分工体系，全球网络大大提高了国际交往的效率，缩短了交易时间和市场距离（即所谓“时空压缩”）。二是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化”，由于原来各行其是的经济模式被统一的市场经济模式所取代，意识形态对抗和军备竞赛正日益被以科技－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所取代。三是“跨国公司”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们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以集约优势谋求利润最大化，其运作模式已成为全球化经济运作的主要特征。四是“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推进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 WTO 建立多边贸易及服务、知识产权保护体制，表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正在不断完善。

1986 年，第 41 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发展权利宣言》，这个宣言对**发展权**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呼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促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宣言》认为，发展权是单独地和集体地确立的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有人都有权单独地和集体地参与能使这种人权充分实现的国家/国际秩序；并责成各国采取必要措施，并制订国际政策以促成充分实现发展权利。此前，1977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将发展权列为一项基本人权；1979 年，人权委员会强调发展权既是国家的权利，又是个人的权利。以后，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以决议形式重申了这个发展权。

1980 年代伊始，**绿党**人士先后进入欧洲各国议会。德国绿党 1983 年第

二次参加竞选即成为德国第四大党，在 1987 年选举中，又有较大面积收获。1990 年代，绿党进入扩张阶段，欧洲绿党联合会成立（1993），其宗旨是建设一个环境优美、社会公正的欧洲，并同其他大陆的绿色政治组织加强联系。1993 年，德国绿党在 16 个州中进入 11 个州的议会，并在 1998 年大选中与社民党结成“红绿联盟”，进入联邦政府。一些绿党也作为较小的联盟伙伴取得了执政身份。绿色政治是伴随着西方环境运动登上历史舞台的，世界上第一个绿党新西兰价值党成立于 1969 年。1973 年，英国绿党（当时叫人民党）成立，1980 年，德国绿党成立，其行动纲领和影响都给人以强烈印象。这些绿色党派的出现，使环境运动具有了组织形态，也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政治格局。

1989 年，社会党国际十八大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宣言》，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层次上实行民主，认为多元化与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反对权力集中和阶级专政，称在宏观调节下通过市场才能使社会创新，要求对国有制进行限制并实行民主控制。社会党国际认为维护世界和平是“当前时代的最高任务”，积极主张裁军，赞成南北对话，倡议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苏东剧变以后，在社会党国际与各国社会党文件中，**“社会民主主义”**取代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政治目标也不再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

1990 年 8 月，伊拉克出动 10 万大军入侵科威特，引发海湾危机。1991 年 1 月，在代号为“沙漠风暴”的海湾军事行动中，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利用海空高技术绝对优势，对伊拉克进行持续 38 天的空中打击，伊军全线溃败。**海湾战争**是美苏缓和后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场局部战争。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大获全胜，增强了它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也助长了其独霸世界的野心。从某种程度上说，海湾战争加速了两极格局的终结，美国正成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

1991 年 12 月，欧共体在荷兰南部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 12 国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志着**欧洲联盟**成立。欧盟的前身是 1951 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到 1967 年成立的欧洲共同体。1993 年 11 月 1 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 这个条约确定了欧洲政治联盟的基本目标（包括共同防务和共同外交），以及经济联盟和货币统一的时间表。欧盟成立是欧洲一体化的突破性进展，表明它已朝着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和安全联合体的方向发展。1999 年 3 月，欧盟特别首脑柏林会议通过了《2000 年议程》的改革方案。2003 年 6 月欧盟第一部宪法草案获得通过， 2004 年 10 月欧盟各国领导人签署第一部宪法条约，欧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欧盟在 1995 年扩大到 15 国，2004 年扩大到 25 国（4.5 亿人口，

400 万平方公里面积、10 万亿美元的生产总值），并还将进一步扩大。

1980 年代，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北美自由贸易区已成形和亚洲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情况下，澳大利亚总理提出召开亚太地区部长级会议，商讨加强相互间经济合作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东盟的响应。1989 年 11 月，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堪培拉举行，1991 年 11 月，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韩国汉城通过《汉城宣言》，正式确立这个组织的宗旨是：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贸易壁垒。1993 年 6 月更名**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45%，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世界总量的 55%，贸易额占世界总量将近一半，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92 年 6 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183 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团（其中有 102 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率领）及 70 多个国际组织代表与会。大会重申了《人类环境宣言》（1972）的愿望，要求在各个层次上加强国际合作，为建立一种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而共同努力。大会通过的《21 世纪议程》是可持续发展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一个标志。20 年前，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第一次将环境问题提上全球议事日程。

1993 年，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后全球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对立，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他特别指出，儒家文明可能同伊斯兰文明联合，对抗西方世界。

1992 年，布莱尔在工党竞选再次失败后成为工党领袖，为了争取上台执政，他提出“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对工党进行改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放弃了坚持 76 年的作为工党象征的公有制条款，从而比较容易获得中产阶级的支持。1994 年，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出版，标志着工党理论的整体转型。1995 年，布莱尔用超越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来形容其政治哲学。1997 年，布莱尔以较大优势获得选胜，工党在野多年之后重新执政，“第三条道路”也成了新政府的口号。如果说，1979 年英国大选是一道“分水岭”，此后保守党一连赢得四次选举胜利；那么，现在工党能不能兑现竞选诺言，在很大程度上将考验欧洲左翼的执政能力。英国提供了这样一个轮廓鲜明的试验场。

1996 年，美国民主党思想库进步政策研究所在题为《新进步宣言：信息

时代的政治哲学》的报告中提出“第三条道路”的基本价值：机会均等，相互责任，自我管理。而实现这些价值的政策是：发展经济，增加财富，而不是重新分配财富；投资教育，增加机会；增强工人的能力和责任来提高福利保障；建立开放与竞争的政治体制，还权于民；重视和加强家庭的功能，形成宽容和信任的精神，维护文化的多样性。

1995 年，瑞典共产党三十一大通过的党纲指出，在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的世界里，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也应在国际交往中成为指导思想。1997 年，法国共产党在议会大选中得票率接近 10%，并参加了社会党若斯潘政府。法共在苏东剧变后没有改名，1999 年，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出版《共产主义新规划》一书，认为“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也要下定决心继续做‘共产党员’，而不改变名称。他们珍惜这一名称与自己理想的联系，珍惜自己的共产主义目标。”

1997 年 7 月，泰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贬值，随即波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行情。8-9 月，整个东盟地区汇市股市大幅下滑。10 月，台湾“央行”放弃捍卫新台币汇率政策，将香港推至金融风暴的中心，港股狂跌，市值缩水 1500 亿美元，影响欧美投资市场。11 月，韩国金融机构问题叠出，大企业集团接连破产，韩元暴跌一半多，整个国家陷入“破产”境地，紧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救。1998 年初，印尼政局不稳，汇市猛跌，5 月，坐了 30 多年宝座的苏哈托总统被迫下台。6 月，日本轮上了危机主角，日元兑美元比价大跌，亚洲国家汇股双市连连重挫，韩国股价更是创下 11 年来最低，地区经济乌云滚滚。在亚洲国家强烈要求下，美日政府联手干预，才制止了日元下滑……。这就是令人谈虎色变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时也是全球化经济安全的一个典型负面案例。

1998 年 2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说，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应本着责任与风险共担的精神，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1999 年 6 月，西方 7 国集团财长提出建立 20 国集团，成员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有关国家就国际金融、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20 国集团**（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 85%，人口将近世界总人口的 2/3）机制旨在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为讨论和协商有关实质问题奠定基础，以寻求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1998 年是所谓“第三条道路”的丰收年。1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第三条道路”。民主党执政及其使美国经济持续百多个月繁荣的业绩，似乎为“第三条道路”实践提供了一个样板。

这一年，吉登斯出版《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英国首相布莱尔出版《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第三条道路”一时甚嚣尘上。9 月，德国大选结束，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罗德胜出。10 月，社民党与联盟 90/绿党就联合政府的纲领和组成进行谈判，签署组阁协议，施罗德出任德新总理。10 月，意大利政府重组，由意共改名的左翼民主党总书记达莱马当选为新总理。

欧洲主要国家左翼政党在这一年的国内选举中取得了一连串胜利，欧洲呈现出一片粉红色。到 1998 年底，欧盟 15 国有 13 国是社会党执政或参与执政，其中有的国家社会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间长达四五十年。

1999 年 4 月，施罗德当选为该党战后第八任主席，他也是勃兰特以后又一位集党主席和联邦总理于一身的社民党人。

4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意大利总理达莱马、德国总理施罗德、荷兰首相科克参加由美国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举办的圆桌会议，主题是“第三条道路：21 世纪的进步治理”。11 月，欧美国家一批中左领导人聚会意大利，出席由欧洲大学和纽约大学共同举办的题为“21 世纪的治理”第三条道路国际会议。与会的有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达莱马、若斯潘，以及巴西总统卡多佐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

1999 年 3-6 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武装力量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 78 天的空袭，迫使南联盟从科索沃撤军，并造成 1800 多名平民丧生，6000 多人受伤，近百万人沦为难民。更令人发指的是，北约导弹在 5 月 7 日袭击中国驻南使馆，3 名中国记者牺牲，这一暴行引发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抗议。**科索沃战争**使联合国威望遭到严重损害，特别是北约绕过联合国武装干涉别国内政，开了一个危险先例；而诉诸武力，越来越可能成为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主要手段。

1999 年 11-12 月之交，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会议期间爆发了 50 万人大规模示威游行，这次活动开启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先河。此后几年，西方国家的人民不断走上街头，抗议全球化给他们造成的困难。这是欧美地区 1970 年代反战运动以来规模最大、动员面最广、影响最广泛的社会运动。反全球化人士利用互联网组织跨国行动，也被称为“另一种全球化”。应该说，反全球化的实质是反资本主义，而反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反大公司的“暴政”。以后，几乎每年的西方首脑会议、世界经济论坛、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召开的会议，都有反全球化分子赶场抗议。

2001 年 1 月，澳大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党代表大会总结了反全球化运动的特征，一是这场新运动反映了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已面临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因为统治阶级取消了他们战后对工人作出的所有让步；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剧了不发达国家的贫困，而这也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发达国家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不安和关注；三是人们反对新自由主义主要指向由帝国主义支配的国际机构；四是这场运动实质上是反资本主义的，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利益相冲突；五是这场运动也有两种趋势：团结在激进的、有觉悟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周围的自发阶级斗争的趋势，和由工会官僚领导的阶级合作主义的趋势。

1999 年，英国广播公司（BBC）通过互联网评选这一个千年最有影响的思想家，马克思名列榜首。评语说：“尽管 20 世纪出现了许多歪曲，但马克思作为一位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革命家所取得的成果，在今天仍然得到尊重。”在同年路透社邀请多国各界人士进行的千年人物评选活动中，马克思仅以微弱分差名列第二。

2000 年 2 月，奥地利自由党进入政府，奥国内立即发生大规模抗议游行，欧盟国家、美国、以色列对奥进行“政治制裁”。不久，该党主席海德尔被迫宣布辞职。2001 年法国大选，极右翼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勒庞居然在第一轮竞选中风头压过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在任总理若斯潘。国民阵线以反体制面目出现，吸引了不少抗议人群，支持率达到近 20%。若斯潘因此愤然辞职，退出政治舞台。2003 年，极右的瑞士人民党也在议会选举中跃居第一大党。欧洲**极右势力**长期被拒斥门外，现在卷土重来，表明欧洲治理模式已经出现危机，这种情况令人关注。

2000 年，法国共产党召开三十大，主张把法共建设成新型的共产党，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社会变革，通过发展现有社会的“成果、需求和潜力”，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异化和统治”，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2001 年，在法共三十一大上，又提出要把法共建成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充满活力和民主的党”。

2000 年 8 月，德国政府决定，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社会团体、组织、个人针对极右势力和排外行为的斗争。奥地利政府表示，不允许极右分子活动蔓延到奥地利。11 月，德国柏林数十个群众团体和政党联合发起反对极右势的大游行，强烈要求取缔极右的德国国家民主党。

在 2000 年 9 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通过了实现《首脑宣言》目标的路线图，即**“千年发展目标”**。目标第一项是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到 2015 年使每天不到 1 美元维持生存的人口比例减半，使遭受饥饿的人口比例减半；二是普及初等教育，到 2015 年使所有男孩和女孩

完成全部初等教育；三是促进性别平等，赋权于妇女，到 2005 年在初等和中等教育，到 2015 年在各级教育消除性别不平等现象；四是将 5 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减少 2/3；五是将孕妇死亡率减少 3/4；六是到 2015 年遏制并开始扭转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蔓延，遏制并降低疟疾及其他主要疾病的发病率；七是将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国家政策和国家计划相结合，扭转环境资源流失的趋势，使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减半，到 2020 年至少使 1 亿贫民窟居民生活有明显改善。八是建立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保证到 2015 年进一步形成基于规则的、可预测的、非歧视的开放性贸易和金融体制，促进国家和国际范围的善治、发展与减少贫困等等。

2000 年 12 月，俄罗斯共产党七大召开，提出了三项任务：加强党对劳动集体等基层群众组织的影响；制定并提出具体的关于俄罗斯发展的替代纲领；加强党的统一和纪律。俄共领导人多次否定了党内一部分人要求社会民主党化的主张，也拒绝了包括普京总统提出的更改党的名称的建议。

2001 年 6 月，**“世界社会论坛”**（WSF）国际委员会在巴西成立，以后每年召开论坛大会，这是一个与世界经济论坛唱对台戏的“平民论坛”。它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场所，通过市民社会的集体行动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控制世界，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致力于建立一个关注人类以及人类与地球关系的新型社会秩序。世界社会论坛所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这些问题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客观地思考全球化问题。2004 年，第四届世界社会论坛在印度孟买召开，与会的有来自世界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几千个非政府组织的近 10 万名代表。这次论坛提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

2001 年 7 月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宣布正式启动更高级的泛非组织——**非洲联盟**，由此确定了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目标。这对于有效地解决非洲内部战乱和冲突，加深非洲人民的认同感以及非洲文化的融合都有重要意义，并有利于加强南南合作和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非盟的诞生是非洲人民联合自强的新希望。

2001 年 6 月，**“上海五国”**（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 1996 年形成的会晤机制）加上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举行首次会晤，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SCO）正式成立。六国元首还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成立、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以来，成员国在文化、经贸、军事、司法、安全等各领域和各层次的合作相继展开；“9·11”事件后，加强了打击本地区三股势力的反恐合作。

2001 年 7 月，八国首脑会议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议题几乎涵盖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所有热点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发达国家对反全球化运动的一种回应。会议期间，有十几万人参加抗议活动，示威者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导致 1 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会议前夕，西欧多国共产党组织在都灵召开“政治动员”会议，决定“站在反全球化运动的第一线”，与各工会团体一起组织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 11 月，巴黎，由法国“农民联盟”、“地球之友”等组织联合发起了反全球化和平游行。

2003 年 6 月，八国首脑会议在法国阿尔纳斯和瑞士日内瓦和洛桑召开，抗议活动组织者更多地使用“另一种全球化”来代替“反全球化”的概念。示威者也表现出更加“理智和成熟”，组织上更为有序，行为上更为节制。饶有意味的是，东道国法国政府和警方不仅严阵以待，还出巨资为抗议活动提供场地，总统顾问接见了运动代表，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想法。这些迹象表明，反全球化运动似乎也步入了“正轨”。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五角大楼遭到自杀性攻击，世贸中心大楼被撞毁。4 架客机上的乘客以及地面共 3000 多人罹难，这对本土从未受到外来严重攻击的美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布什总统随即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并以反对恐怖主义划线。**“‘9·11’事件”**，**“反恐”**已成为近年国际社会最频繁谈论的两个严峻话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9·11”事件不久后的一次讲演中指出，如果西方能在全世界更公平地分配财富，全球贸易将会对战胜恐怖主义起关键作用。“并不是所有愤怒的人都对文明社会愤怒，很多人愤怒是因为他们不能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应该增加 21 世纪里的合作伙伴，并由此减少潜在的恐怖分子。”

2001 年 10 月，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及其窝藏本·拉登基地组织发动了新世纪第一场引起全球关注的，也是第一次以“反恐”名义进行的战争。美国虽然毫无悬念地打赢了**阿富汗战争**，但恐怖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恐怖分子仍然在到处活动。12 月，美国正式宣布退出《反导条约》（1972）。布什声称此举是为了“免遭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的导弹袭击”。这样一来，多年形成相对平衡的国际安全格局被破坏了。

2001 年 12 月，俄罗斯《消息报》公布了一项权威机构的调查报告，绝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人坚决不同意“苏联解体是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败和经济制度低效率所致”的说法。3/4 的人认为，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国家领导人的无能和利欲熏心；而认为苏联解体是由于“社会经济危机、外国敌对势力的颠覆”的人不足 15%。在 2003 年 3 月一次就斯大林逝世 50 周年进行的民意调查中，57%的人对斯大林在俄罗斯的作用持肯定态度。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实验，所谓**“华盛顿共识”**（美国经济学家就拉美经济提出的以自由贸易、财政监管和私有化为基础的改革方案）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2001 年，**“圣保罗论坛”**第十次哈瓦那会议召开，主题是“左派、反帝、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一切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团结互助和参与制定‘替代方案’的空间”。2002 年，这个论坛第十一次危地马拉会议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愿望，称近期目标是争取和平与民主，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拉美一体化模式。“圣保罗论坛”是巴西劳工党 1990 年首倡的拉美地区左翼国际论坛。

2002 年 8-9 月，**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WSSD）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包括 104 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 192 国家 1.7 万名代表，在为期 10 天的会议中，就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现状、问题与解决办法进行了广泛讨论。大会最后通过了《约翰内斯堡政治宣言》和《执行计划》。《执行计划》指出，消除贫困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与 10 年前相比，这次首脑会议设立的目标更加明确，并在多数项目上确定了行动时间表，包括在政府之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合作项目中建立“伙伴关系”。

2003 年 1 月，美国组建对伊拉克动武联盟，借口是解除伊拉克武装并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遭到包括法、德等传统盟友的反对。1 月 15 日，世界各地 600 个城市同时举行数百万人的反战大游行。3 月，美国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虽然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但战后秩序的恢复和重建似乎还遥遥无期，伊境内反美烽火此起彼伏，到 2004 年 9 月，美军在伊死亡人员已超过千人。而且由于战争理由的落空使得一些联盟国家非常被动，特别是英国，首相布莱尔屡次面临工党内外的严重质疑。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解决伊拉克问题应该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由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

2003 年 5 月，德国社民党举行主题为“革新是我们的传统”的建党 140 周年庆典活动。德国总理、社民党主席施罗德就党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原则性阐述：“‘自由、互助、公正’是社民党永恒不变的基本价值观，不断改变的只是将其转化为政治和现实的手段。”11 月，施罗德在社民党五十六大第三次当选为该党主席，但得票率已有不小下降。在 2004 年 6 月欧洲议会选举中，德国社民党只获得 21.4%的选票。被认为是施罗德政府削减社会福利的“2010 改革计划”种下的苦果。虽然朝野都认为改革是必须的，但其实施还是遭到了强劲抵制。

2003 年 6 月，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雅典召开，有 59 个共产

党和工人党派代表出席，会议的主题是“反战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与共产党人”。在上年两次雅典会议上，讨论了“9·11”事件对全球政治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新形势下的应对措施。

2003 年 6 月，日本共产党第七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日共中央主席不破哲三宣布将在党章修正案中承认日本天皇制和自卫队的存在，并提交 11 月的党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日共明确表示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当前首要目标。近年来，日共在选举中不断扩大了下议院席位，但其他在野政党仍然不愿将其视为可进行长期合作的政治伙伴。预计日共将进一步调整政策主张以适应时局的变化。

2003 年 7 月，来自英、德、瑞（典）、加、智、巴（西）、阿（根廷）、南（非）、埃（塞俄比亚）、新（西兰）、波、罗、匈和捷 14 国的中左政府领导人在英国巴格肖特举行会晤。与会者称他们共同认可的“第三条道路”治国理论是对全球化正面和积极的回应。当务之急是确保全球化不仅对少数人和少数国家有益，而且要惠及所有人和所有国家。他们在联合公报中承诺，将共同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

2003 年 10 月，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在巴西圣保罗召开。通过了有关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圣保罗宣言》**，以及《社会党国际道德宪章》和题为《全球社会的治理——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的报告，并决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为联合国改革起草报告。《圣保罗宣言》提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使其基本价值（社会公正与民主）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及面临的新任务，反对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新保守主义纲领和单边主义道路。“以单边主义为标志的现存世界秩序，对人权的蔑视、社会不公正和发展不平等，正在达到它的极限，因此必须建立一个以多边主义、民主、尊重人权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世界秩序。”到 2004 年 2 月，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 168 个，其中 50 多个成员党在约 50 个国家执政或参政，是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性政党组织。

2004 年 1 月，受德国民主社会党邀请，来自欧洲 17 个国家 19 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代表聚会柏林，就欧洲左翼联合成立**“欧洲左翼党”**进行了协商。公布了一份由德民社、法共、意共重建等 11 个党派联署的《建立欧洲左翼党的柏林呼吁书》，号召实践多样化的合作形式，将欧洲变成一个民主的、社会的、可持续的与和平的地方。5 月，欧洲左翼党在罗马成立，通过的《纲领》提出要超越资本主义，团结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和运动，实现人的解放。该党以新型的组织形式面世，参加者可以是政党，也可以是个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定于 2005 年召开。

§6．2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技术、服务、商品等各种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自由流动和统一配置的趋势，这个过程使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系。[①]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和世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现在的经济全球化又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下进行的，它也在制造更大的分裂、对立和贫困。社会主义运动如何顺应历史潮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

“世界历史”视野的全球化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但他们以深邃的眼光洞悉人类社会正在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冲破一切民族、地域的障碍，“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②]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类活动越来越社会化，世界因此而可能成为一个整体。

>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

资本主义一出世就把世界当成了舞台，并逐步形成以资本积累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殖民主义者把那些资源丰富、居于特殊地理位置的国家（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④]“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

[①]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说法，全球化就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5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全球化只应出现在比较晚近的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1972），西方跨国资本流动迅速增加；冷战结束，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取得绝对优势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5页。

有国际的性质”。[①]世界被划分为宗主国（“世界城市”）和殖民地（“世界农村”），这就是今天南北问题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摧毁了罪恶的殖民体系，一大批民族主义国家纷纷独立，但老殖民主义残余犹在，新殖民主义又使用各种手段，将原殖民地国家置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使之沦为单一的初级产品供应地。“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经济星座’，其中心是工业国。由于受惠于这种地位和早期的技术进步，工业国组成了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整个体系。生产出口原料的国家则以其资源的功能和中心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了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结合在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广大的、参差不齐的外围。”[②]在这个由“中心—外围”构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切社会形态（中心与外围都一样）都按照一种单一的、有组织的、有等级层次的体系来安排。”[③]而且只要这种结构关系不改变，中心发达、外围不发达的分化就将一直继续下去，外围要发展也只能是依附性的发展（dependency development）。

这个依附发展论明显有马克思恩格斯所谓“从属”关系（ 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影子。沃勒斯坦也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体系论。与近代以前的世界帝国不同，“世界体系”（ world system）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integration，而不是community）与不平等是这个体系的两大特征：国际分工体系与商品交换关系将各个国家（地区）牢牢地联结在世界经济这个大网中，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体（world econominity）使人类历史具有了全球性质；这个体系又表现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半边缘地区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④]它们处于中心与边缘之间，“既不像核心国家那样先进或富有，也不像边缘国家那样缺乏独立而注定要依赖他国。它作为其余两种类型国家之间的一种必需的缓冲器，分解了对核心资本长期统治的潜在的反对力量。”[⑤]这个地方也是资本最感兴趣的地方。通过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制，剩余不断向中心转移，世界体系就这样实现当代资本主义的积累。世界体系论指出由于这个体系的流动性（中心国家可能下降为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也可能上升为半边缘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有相当大余地，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世界体系论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发达不发达的起源与结构，被认为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理论。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一批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也纷纷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不断扩大的资本急于寻找出路；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8 页。
[②] [美]J·迈耶、D·西尔斯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9 页。
[③]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11 页。
[④]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3 页。
[⑤] [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5 页。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迫切需要发展资金，这就为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以及全球性的生产、贸易和投资创造了良机，跨国公司趁势而起。跨国资本不仅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全球，而且也藉以兜售其价值观念和政治模式。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实施者，它们代表了资本的利益，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从中获取巨额利润。跨国公司的经济总量目前约占全球GDP的 四成以上（世界 500 强就占了全球GDP 的 1/3），六成的世界贸易、七成的技术转让和九成的国际直接投资也是由它们进行的。全球 100 个最大的经济体一半是跨国公司（现在世界上有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近 3/4 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不如它们）。资本主义“无论是世界的还是国家的，在过去造成了不发达，而今仍在造成不发达。”[①]经济全球化使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论是策动，甚或直接出面在一些冲突地区“维和”，还是利用人权、贸易等武器对一些国家横加干涉，都是为了防止这种国际分工和循环的断裂，保持它们的优势地位。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的大部分好处，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和科技，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明显优势，并垄断了全球化规则的制定权。虽然少数发展中国家抓住了机遇，迅速提升了自己，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包袱（长期遭受殖民剥削和掠夺）和现实原因（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科技水平的落后，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不能说一无所获，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南北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9 年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裕的 1/5 人口控制了全球GDP总量的 86%和出口总额的 82%，[②]而最贫困的 1/5 人口的这两项都只占 1%。1960 年，最富的 1/5 人口与最穷的 1/5 人口收入比是 30：1，1990 年，这个比例扩大到 60：1，1997 年，更达到了 74：1。南北之间的作为全球化最重要指标的信息获得的差距即“数字鸿沟”（ digital division）更甚，全球 1/5 富人的因特网用户占了世界总数的 93%（比他们的全球GDP比重还要高 7 个百分点），而收入最低的 1/5 穷人仅占区区 0.2%，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边是信息高速公路，一边是信息荒漠化。

今天全球 60 亿人口中，仍然有 28 亿人每天靠不足 2 美元维持生计，12 亿人每天收入不足 1 美元。2000 年，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达到了 49 个（1970 年是 25 个），这些国家有 6.3 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10 强，但其总收入不到全球的 1%，他们日益严重的贫困化已经构成国际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已经付诸实践的全球化并没有达到全球化的倡导者们所承诺它将完成的目标——或者它能够和应当做到的。在有些情况下，它甚至没有带来增

[①]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15 页。

[②] 世界上最富的 1/5 人口还占据了 68%的外国直接投资，消费了世界 74%的电话线路和 84%的纸张。世界三大富豪的个人财富超过了 35 个最贫困国家的GDP，也就是其 6 亿居民的收入。

长，但是即使在带来增长的情况下，它也没有给所有人都带来利益；由‘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政策之净效应时常以多数人的代价给少数人带来利益，以穷人的代价给富人带来利益。”[①]

显然，这样的全球化只能是一个倾斜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许多人不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却要承受它的负效应，这种局面发展下去的前景是无论如何不能叫人乐观的。

有全球化，就有反全球化

早在 150 年前，马克思就精辟地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②]“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③]全球化进程印证了这个资本运动的规律，资本的跨国运动还将对各国的产业结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调整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如沃勒斯坦所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诞生以来就存在反体系（anti-systemic）的运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也酝酿着反全球化运动。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搭上全球化的快车，纷纷降低关税，增加了开放度，大力吸引资本进入，但由于种种原因能够从中获益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大多数人仍然致富无门，对他们来说，“全球化伴随着更多的贫困、失业和社会分裂，而这些贫困、失业和社会分裂却恰恰存在于孤立、边缘化的暴力行为中。许多人尤其是易受伤害的人，对未来——自己和他们孩子的未来——的危机感正在加剧。”[④]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又一下子掏空无数普通人多年的积蓄，他们强烈反对这样的全球化就不难理解了。

即使在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受益面也不是均衡的。当今世界反全球化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原因就在于资本可以较自由地全球流动，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性却要低得多，并且其流动的方向基本是单向的，即由发

[①] [美]J·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 页。“华盛顿共识”最早是 1989 年，美国经济学家就拉美经济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的改革措施，并在同年国际经济学年会上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支持。它是一种针对转型国家的以自由贸易、财政监管和私有化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建议，主要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流动的各种限制，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等。但这个“共识”现在正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且批评不仅来自于试验国家和地区，就连原来的赞成方面也觉得问题不那么简单。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9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3 页。

[④] 科恩、肯尼迪：《全球社会学》，第 198 页。

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而不是相反。因此，资本比劳工拥有比任何时候都强的谈判能力。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发达国家许多从事传统产业的劳工可能因此失去工作，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工人如今发现自己处在更容易被外国工人替换掉的环境之中。对于那些缺乏技能而可能比较容易替换的工人来说，结果将是处于更不安全和更危险的状态之下。”[①]这种竞争不仅仅限于低技能的工人，还会波及处于信息“网络”状态的所有劳动者。

西方社会因此也出现了“第三世界化”（third worldization，即相对贫困化和边缘化）的迹象。1980 年至 2000 年，美国收入最高的 5%家庭与 20%收入最低家庭的平均收入差距，从大约 10 倍扩大到 20 倍。1990 年代的经济繁荣并没有使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比上一个十年更富裕，大部分人不如 90 年代初期。如今，最富有的 1%美国人拥有全国财富的 40%，而 80%的美国人只占有全国财富的 16%。[②]2003 年初，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报告称，最近 10 年，美国人的财富是增加了，但贫富差距也拉大了，财富排在最前 10%人群与最后 20%人群的差距，在 1992 到 1998 年间拉大了 17%，而 1998 年到 2001 年间拉大了 70%；白人与黑人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了 21%。[③]

从 1999 年末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期间，美国工会组织和环保主义者发动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开始，以后每年都有几次，抗议声浪一阵高过一阵，甚至酿成暴力冲突和人员死亡。凡有重大的国际会议召开，就有反全球化分子“赶场”，目前反全球化运动虽然主要表现为街头抗议，但已有众多工会、协会和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注意利用各种场合发出声音，反对跨国公司的“暴政”，抵制“公司的全球化”（ corporation globalization）。2001 年以来，每年与世界经济论坛（WEF）唱对台戏的世界社会论坛（WSF）都明确表达了纠正全球化所导致的不平等、不公正的主题。在反全球化的队伍中，除了传统的工会力量外，还有新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农产品保护论者，他们的来路复杂，动机也不一致，是对全球化未来不可预期的恐惧和焦虑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发达国家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处境不佳，一部分劳工利益受损，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再加上媒介不负责任的渲染炒作很容易使许多人把失业危险、收入下降和社会安全归咎于全球化，他们向政府施压，要求强化贸易壁垒并限制移民[④]。如发达国家的钢铁业、机器制造业、家用电器业近年来因为激烈的国际竞争被迫收缩，成了发达国家在推进全球化时不得不顾忌的一个因素，各自加强了国内保护。2002 年由美国挑起的国际钢铁贸易争端不

---

① ［美]丹尼·罗德瑞克：《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 页。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1 年美国人权纪录》，《光明日报》2002 年 3 月 12 日。
③ 见《参考消息》2003 年 1 月 26 日。
④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指出，每年由于发达国家贸易壁垒所增加的国际贸易成本，已经相当于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援助资金数量的两倍；如果这些贸易壁垒还要强化，后果将非常严重。而近年来一些欧洲右翼势力抬头，他们一个颇具煽动性的口号就是限制外来移民的进入。

断升级就是一个明证。其实，“除了在某些高度劳动密集型的部门之外，对美国劳动力的主要竞争性威胁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人，而这些国家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福利条件都高于美国。”[①]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出口，但它们的竞争对手主要是产业结构相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还不至于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所出现的产业“空洞化”实际上是跨国资本惟利是图的一个表现，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争抢的结果。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 2000 年《千年报告》第一部分重点谈了全球化问题，他指出：

> “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首先，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的分布也不平衡。第二，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现象：成功地制定了促进全球市场扩展的有力规则并予以良好实施，而对同样正确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劳工标准，还是环境、人权或者减少贫穷的支持却落在后面。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人们日益焦虑的是，文化完整性和国家主权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会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

经济全球化不仅加强了跨国资本的经济权力，在政治方面，跨国公司正在使自己的利益变成国家的政策，而表现为公司（资本）的统治、少数利益集团和少数国家的统治，表现为“没有全球民主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global democracy）；在文化方面，跨国公司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以美国口味为主的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广为传播，它们对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各民族的文化认同都带来了巨大冲击，其结果是一种同质化了的文化碎片的紊乱混合；在环境方面，跨国公司利用别国的廉价环境资源大发横财，向别国转移污染产业，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保护当地的环境，这不啻为一种典型的“生态殖民主义”。……但又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的，拒绝全球化，并不能使世界各地穷人的困境发生逆转。全球化的关键问题是不平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包括贫富差异，也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力的严重不平等。许多人反对的也正是全球化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反对“强加全球化”（imposing globalization）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权力结构，而不是全球化本身。

[①] 罗德瑞克：《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第 90 页。

社会主义在全球化中应有所作为

经济全球化在促进生产力极大提高的同时推动了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当各国人民被日益卷入世界市场网时，资本也就愈发具有了世界的性质，成为推动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没有财产’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他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①]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强调共产主义不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也“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②]

世界历史的真正实现，就是人类个体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诞生，“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③]人的全面发展必然是人的社会化程度提高，并通过人的生产和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来实现。“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④]资本主义正在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并且有待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就越意味着“伟大的社会革命”即社会主义的存在理由。

经济全球化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资产阶级生产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第8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3页。

一切矛盾，就会“在普遍的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①]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同样的道理，尽管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危机也变成世界性的了，但这种生产方式的潜能还没有耗尽，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格局就不会马上改变。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一直在进行调整。“20 世纪工业社会获得的所有社会成果（社会保障、最低工资、集体协议等等）向来都不是资本主义自发的进步，而是社会斗争的结果，是这种斗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在国家机器中的反映，是社会面对……巨大变革作出的保护性反应。”[②]但是，资本主义一边在寻找克服其内在限制的方子，一边又在更大范围上再生产这种限制，全球化大大加剧了这个矛盾。

全球化既然是一个资本扩张的真实过程，资本的逻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在全球产生更大的联动效应，引起更强劲的反弹。这其间必然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无序和动荡。“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大多数世界人口和生产过程在与中心区核心生产过程互动中不断发生的边缘化，说明在体系内国家辖区间或辖区内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平等。”[③]南北差距、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已经引发日益严重的民族冲突和排外情绪，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等极端行为的土壤。“9·11”事件以后，这些问题不再被认为是世界论坛上的空谈，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会议都在关注对发展中国家增加援助、减免债务、消除贫困和缩小“数字鸿沟”等问题，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在改变一些政策和运作方式，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跨国公司也感到了空前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考虑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以缓解资本与劳动的矛盾。

只要有巨大的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社会主义的价值就得以彰显，就可以产生追求这个理想的激励；社会主义应当理直气壮地在全球化中找到新的支点，并以开放多元的方式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在资本主义已经具有全球性质并在全世界规模上组织生产关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只能在世界范围出现。”[④]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现在还处于一个低潮期，苏联东欧的改弦易辙表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行不通，但这也激起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越来越多的人士意识到，只有建立在各国平等基础上的全球化，才能实现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这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理念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应该也能够为促进公平的全球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一方面，社会主义不应简单排斥西方国家的经验，因为这些经验往往凝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社会主义完全可以通过与资本主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Ⅱ］，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610 页。
② ［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7 页。
③ ［美］特伦斯·K. 霍普金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转型时代 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④ 阿明：《不平等的发展》，第 329 页。

义打交道，引进有益的东西来充实自己，积极参与全球化来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全球化使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地区）交流对话的渠道大大增加了，客观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并决定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将长期共处。

但是，今天的全球化规则无视世界各国在发展环境和竞争条件上的悬殊差别，具有明显的亲西方性质，不能反映甚至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①]机制还很不健全，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没有权威，效率低下，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而全球化带来的种种负效应，根子就在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

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

> “我们需要的世界各国‘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所有国家，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应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平等的经济全球化，少数国家的富裕不应该也不能够建立在广大南方国家的贫困之上；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公平的经济全球化，世界的贫富差距应逐步缩小，而不是不断扩大，否则人类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存的经济全球化，只有相互尊重，相互促进，保持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世界文明才能生机盎然地发展。”[②]

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最重要的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全球化把超民族、地域的世界经济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日益向世界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性或民族特色的丧失，而是渗透了世界性的民族性，充满了民族性的世界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就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各种文明和各种发展道路应和谐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各国的发展必然要遵循各自的历史轨迹。”[③]

[①] “治理”不是“统治”（ government）。全球治理委员会（CGG）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1995）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后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和规则。尽管人们对“全球治理”这个概念的内涵、做法理解歧义还很大，甚至指责它为跨国势力张目，但它立足于全球社会的主张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②] “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发言”，《人民日报》2000年9月8日。

[③] “江泽民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三十五届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5月11日。

经济全球化要健康发展，就不能听任资本的力量呼风唤雨，必须进行卓有成效的全球治理；必须充分考虑各国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承受能力和国家安全，帮助发展中国家使它们在全球化中有利可图。联合国在这方面更应该有所作为，使各国都有权平等地参与世界经济的决策和规则制定，减少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风险。国际组织要加快机构改革，增强工作透明度，并加强国际监管的协调和合作，保护穷国利益不遭受进一步的损害。“全球化可以被重塑，当它被重塑时，当它恰当、公正地运行时，当所有国家在影响它们的政策上都有发言权时，就有可能创立一种崭新的全球经济，在此经济中，不仅增长是更加持续和较少变化的，而且这一增长的果实是被更加平等地得到分享的。”[①]

尽管今天社会主义在少数国家的探索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还很不对称，但社会主义价值观毕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竞争将长期共处，社会主义自身也将多元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在进行着新的探索。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要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还必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风大浪中，趋利避害，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并进一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在不断提升实力的基础上增强自己的发言权。与此同时，为了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主动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要求，抵御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理论、路线和发展战略。

[①] 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第 15 页。

§6．3　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的新表现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危害性，同时也激励追求进步的人们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探索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并非仅仅是指中国等少数几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还包括在西方颇有影响的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等模式。它们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实现有关社会公正理想的一种现实运动，但社会主义必须进行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

1960 年代以后，在西方世界出现了所谓“新左派”政治经济学，这一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和方法抨击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主流经济学，并以社会主义作为追求目标。

一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特征，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三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像南斯拉夫自治经济体制和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这样的社会主义。很长一段时期，市场社会主义寄希望革新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寻找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的结合。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市场不仅是社会主义取得更大经济效率的手段，而且也是达到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或自由的平等价值、发展民主以及提高社会公正的途径。”[①]也就是说，市场社会主义指望能够在一种提供最优效率和高度民主的社会制度中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尽管表现不一，它们还是形成了几点基本共识：（1）市场不应等同于资本主义；（2）中央计划经济机制存在极大的缺陷；（3）不存在任何可以替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的社会主义形式；（4）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些形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并且远比资本主义更可取。[②]

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发轫于 20 世纪初西方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能否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争论。30 年代产生了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这个模式反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进行合理经济决策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国

[①] [英]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4 页。

[②] [美]戴维·施威卡特：“市场社会主义：一个辩护”，见[英]伯尔特·奥尔曼：《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 页。类似地，我国学者也认为市场社会主义（1）把市场视为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公平分配的手段；（2）目的是实现公平竞争、最优效率和公平分配；（3）限制权力过分集中，阻止政权向官僚主义化发展，促进民主化发展进程；（4）实现劳动者自治，防止劳动异化。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3 页。

家也可以通过确定价格来代替市场，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再通过“试错法”程序来进行调整，以反映供求的波动。但是，兰格模式忽视了市场还有激发企业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发现和传递知识的作用，它关注的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不是决策的民主化和分权化。因此，哈耶克反驳计划在本质上破坏资本主义活力机制还是一针见血的。

市场社会主义重新兴起的背景是，196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西方国家遭遇战后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混乱的国际货币制度、越南战争的深刻影响、西欧激进社会运动和环境运动此起彼伏，发达国家陷于滞胀之中不可自拔，分配不均现象日益严重，这些都加剧了人们对现行经济体制的不满，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也已彻底暴露，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和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僵化无能，迫使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进行改革，而且这种改革都先后明确了市场取向。“20 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最引人注目且又十分不同的两种形式——苏联模式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看起来同时走到了尽头。苏联模式（以及东欧各国衍生的‘改革’模式）和凯恩斯主义模式如今都备受指责。”[①]如果以苏东剧变为分水岭，前后市场社会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探讨如何与市场相结合，而后者则试图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培育社会主义因素，利用发达资本主义的现有成果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方案，即“以某种形式的公有制为基础，运用市场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如经济民主、分配平等、选择自由、消除剥削等等。”[②]这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体制，并不同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原来人们都认为市场和社会主义是矛盾的，但有些学者却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包含着这样的思想，“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立即废除市场。它开创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尽管是‘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国家必须获得一定数量的财产。但国家的企业要继续根据市场原则运行，并与非国有的、私人的企业竞争。”[③]1980 年代中后期英国出现了“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概念，为苏东剧变后的市场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个理论把市场纳入了社会主义范畴，认为可以利用市场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目的。而计划和政府干预仅仅是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的补充手段。90 年代以后，激进经济学家倡导一种把市场体系力量结合进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并将市场社会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模式。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

[①] 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第 31-32 页。
[②] 余文烈：《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 页。
[③] [美]詹姆斯·劳勒：“作为市场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见奥尔曼编：《市场社会主义》，第 31 页。

合，是对市场资本主义和计划社会主义的超越。复兴的市场社会主义设定了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在一起”，“第二个目标是要启动一种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激进的重新取向的工作。”[①]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比兰格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成熟多了，它们致力于把有关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研究推向前进，明确提出市场经济的意义不仅在于促使经济高效发展，更在于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根本原则的充分实现；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市场经济可以与公有制兼容，而且试图解决实践中这两者如何结合的问题。

二、关于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都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依附于私有制，公有制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the sine qua non）。[②]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他们认为马克思讲的社会所有不能等同于国有，至少国有只代表了“低级”社会主义形式，而且很容易蜕变为官僚所有。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赋予新的内容（形式多样的社会所有制），证明私有制非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公有制基础上也可以产生市场机制。“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种可行的社会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取得同传统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一样的经济效率。”[③]譬如罗默提出一种“生产资产产权关系”（property relation in productive assets），这种产权关系有利于实现福利和自我实现的平等、政治影响力的平等和社会地位的平等，而这三个平等正是社会主义者追求的。在产权排列组合的两端（国有制和无限制的私有制）之间有无数可能性。而最能促进社会主义目标的所有制形式或许是生产资料人民直接控制或国家遥控方式，譬如将资本与利润“社会化”或“公有化”的社会所有制，让每个成年公民从社会领取数额相等的有价证券，用以购买企业股票，但不得买卖，身后回归公共财产。有人称之为“证券社会主义”。此外还有采用劳动合作组织雇佣资本的形式，如合作制社会主义和自我经营市场社会主义，它们更关注的则是合作社内部的经济剩余如何实现公有；有人还提出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化方案来限制资本的权力。

三，关于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也要求充分的民主、某种程度的分权和个体自由活动的权利（这必须有相应的民主政治制度）。他们认为，“市场是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而自治的基础。破坏市场就意味着破坏市民社会。而没有市民社会，自由和民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④]市场具有

[①] 索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主编：《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 页。

[②] [美]约·罗默：“未来的社会主义”，见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8 页。

[③] 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第 205 页。

[④] [意]卢恰诺·佩利卡尼：“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见戈尔巴乔夫、勃兰特：《未来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3-204 页。

平等的激励机制，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而计划经济排斥经济生活的民主化，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必然滋长官僚主义和反平等的特权现象。尽管市场也有负面效应，但那是资本主义市场造成的，为了发挥市场的积极效应，就必须构建一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或结合社会主义手段的市场制度。市场社会主义对经济民主的追求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企业劳动者管理型（工人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和收入权，企业民主决策；企业收入属于企业的全体劳动者，并在投资、工资和集体需要之间分配；企业之间仍然是市场竞争关系。这种类型主要在欧洲）和经理管理型（以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代替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剩余由社会全体公民共同分享，主要在美国）。“不论如何，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混合民主体制，将那些经过改变了的自由民主因素与合理的工厂自我管理结合起来，它至少在原则上承诺了在国家和经济双重领域提高民主的可能性。”[①]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治经济思潮，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这些主张与西方社会强烈要求民主的传统是一致的。

值得一提的是，1960 年代苏联东欧国家进行的经济改革也是一种类似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产生了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权的模式，但是，它们的改革只希望通过市场提高经济效率，却没有发动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而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突破即在于确认了自由、平等和民主是确立“市场主导”社会主义模式的前提。这一点是应予以充分注意。

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

早在 1920 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就分化出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道路和社会民主党要走的议会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 1951 年重建的社会党国际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原则声明，以及 1959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形成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思想体系，它把民主制看作为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而不再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是第二国际时期社会改良主义的继续，而且与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和西欧各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战后西欧国家普遍走上了福利国家道路，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以及比较公平的分配。但 1970 年代这些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危机，社会民主党因其僵硬的政策也陷入了长达 20 年的政治沉寂期。1990 年代，西欧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争取上台执政，提出并推行了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施政纲领。“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是这些左翼党在新形势下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它们从“民主社会主义”走向“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而不是 Socialdemocracy）的转型。

[①] 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第 238 页。

“第三条道路”倡导者指出传统社会民主党理论和政策的主要缺陷：一是混淆了社会公正与追求结果公平，忽略了积极奋斗和责任意识，缺乏对创新性、差异性和卓越性的鼓励；二是没有考虑不断增加的公共开支所发挥的作用；三是政府权力的扩张以及由此滋生的官僚主义，使公民价值观成为附庸；四是权利超越了义务；五是夸大了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低估了个体和企业创造财富的重要性。[①]而西欧现行的福利制度均与这些缺陷有关，“现在这种依赖于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很不民主的。它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和照顾，但是它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某些类型的福利机构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没有效率的，而且，福利救济有可能导致违反设计福利制度之初衷的不合理结果。”[②]

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经济社会运行模式的重大变化，信息产业的高度发展极大地便利了跨国资本的流动，带动了生产的全球配置，也加剧了人们对市场力量的不安全感。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劳动者面对外国移民和外国廉价商品，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削弱、甚至被剥夺了，从而导致排外主义；另一方面，全球化增加了资本的选择余地，也增强了资本与劳工、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这就使欧洲国家出现了一系列传统左/右政治未曾遇到的新问题，猛烈冲击了战后确立的资本—劳工—政府三者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一些国家的福利制度难以为继了。对福利制度的改革也因此成为“第三条道路”政治实践的主要部分，这关系到左翼政党是否能够执政或继续执政。

“第三条道路”包容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信念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专注于重构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以回应同时发生的两场革命——全球化和知识经济。”[③]作为后冷战时代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寻求超越左/右的意识形态。当然，“第三条道路”在西欧各国表现不尽相同（名称也不一样），但它们的基本理念和目标是一致的，即必须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福利国家转型），不断革新党的理论，使之更富于时代性和生命力。它是西欧左翼政党自身形象的重新塑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创造了契机。[④]进入新世纪，欧洲政坛风云变幻，“第三条道路”似乎不怎么吃香了，但它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及其政治实践仍然能给我们有益的启迪。

事实上，“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搭起了全球化时代社会民主党改革的理论框架。尽管“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在 20 世纪初期就有了，但欧洲左翼政党赋予它新的内容，“社会民主主义已经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进行自身转型，但社会民主党人要想兴旺发达，还必须准备进一步革新。所有政党都必

---

① 见K·佩德森、J·克思勃根、A·赫姆里克：“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还是其他？”，见欧阳景根选编：《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11 页。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17 页。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6 页。

④ 2000 年前后，欧盟 15 国有 13 国是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执政或参政，一时蔚为大观。

须适应结构性的变革，这些变革意义深远。”[①]左翼政党要想发展壮大，赢得民心，就必须使自己的理论迎合时代步伐不断更新。上台前的竞选口号要使选民觉得有亲和力，上台后的政策调整也要更贴近实际生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已几乎不可能发生暴力革命，连共产党也认为，“在寻求更有效的民主参政形式和完全接受诸如尊重反对派的权利和议会中多数与少数轮流交替的辨证关系等原则方面，必须承认政治、思想和文化贡献的多元性和承认市民社会中各种形式的自治性。”[②]西欧社会民主党认为，走向民主的社会主义，不一定走制度替代的道路，它们也放弃了这样的目标。

> “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都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它是以引导进步政治一个多世纪的价值观念——即民主、自由、公正、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③]

它们要遵守现实政治的游戏规则，否则就会失去社会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应当肯定“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勇气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应变能力，不应该用不合时宜的观念来指责欧洲政党的实践。

1980 年代以来，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较高的工业失业率，经济重心从物质生产部门转向非物质生产部门，西欧产业工人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如英国产业工人只占全体就业者的 1/3，在工业核心部门就业的工人只占 15%，2/3 的就业人员在第三产业工作。英国工会是工党的组织基础，其组织程度 1979 年为 55%，1990 年下降到 35%。长期的、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消磨了工人的斗争意志，也削弱了工会的号召能力和行动能力；城市中传统工人居住区消失，新生产方式使劳动过程分散化，加速了英国工会的涣散、分裂和瓦解。1980 年代以后，以科技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新中间阶层崛起，他们拥有较高的收入，形成了独特的消费方式、交往方式和政治行为。

在这些国家，左翼政党原有的阶级基础缩水，它们就要想方设法扩大新的社会基础，增强党的吸引力，以争取更多的选民和更长的执政时间。1992 年，工党在大选中失败后，布莱尔就提出，工党必须成为以中产阶级和政治中间势力为主体的党。中产阶级是西欧社会稳定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的认可和支持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就格外重要。“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是政党对社会结构变化的适应形式。它告诉我们，政党提出的政策和主张往往不完全反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第 32 页。

[②] 《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波利塔诺答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包姆问》，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1 页。

[③] [英]托尼·布莱尔：“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见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 页。

映政党的本质要求。”[①] 1994 年布莱尔当选工党领袖，提出“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全面调整工党政策，修改党章第 4 条，即放弃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并着手限制工会的权力，重新界定工党与工会的关系。2003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了一个全面的中产阶级纲领，明确指出：“中产阶级是德国经济的发动机。我们的经济成果大约一半是由中产阶级带来的，它包括大约 2000 万从业人员。将近 130 万年轻人，即年轻人总量的 80%是在中等企业接受培训的。”因此，“支持中产阶级仍然是我们经济政策的重点。”[②]为了在多党政治环境中站稳脚跟，左翼政党不再以工人政党的身份参与议会活动。英国工党声称它不仅是劳动者的党，也是企业主的党，社会的多元性是社会民主党理论创新的基础。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人类社会是由不同信仰、不同思想倾向的人所组成的，它的协调一致是以共同的道义上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为依据的，而不是靠意识形态的垄断。正是通过对一元意识形态的放弃和对宗教伦理的让步，德国社会民主党摈弃了偏见，加强了自身，并能够承担起联邦政府的领导职责。”[③]显然，西欧左翼政党眼下最关心的是如何争取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在资本主义的民主范围内取得执政地位，甚至连续执政。

社会民主党很早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成了改良党，但它仍然代表欧洲中下层人民的利益，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左力量（西欧社民党有 1100 万党员，是欧洲议会最大的议会党团），至今也仍然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它是与社会主义最接近的意识形态。其实，“第三条道路”也是欧洲左翼政党对全球化的一种回应。他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无论如何，一个政党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加强自身的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生态社会主义”异军突起

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产生于 1970 年代，是西方绿色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结合的产物。宣扬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是一些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与全球环境危机的关联，并试图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深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生态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一种独特的环境保护理论；经过多年发展，它已经成为绿色运动中一支具有左派特征，影响日益扩大的思潮。生态社会主义也被认为是 21 世纪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思潮。

生态社会主义者承认他们与马克思主义有直接间接的渊源关系。在他们

[①]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52 页。
[②] 张文红编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产阶级纲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 年第 2 期。
[③] 陈林、侯玉兰等：《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5 页。

看来，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发展甚至超越。他们是绿色运动的红色标志，他们认为，无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否包含了生态思想（大多数人持肯定态度），但重要的不是从中寻找“合法性”根据，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意义。他们普遍相信，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社会只能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

早年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就已经注意到生态环境问题。这一学派的重要人物马尔库塞指出：“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自然的解放力量及其在建设一个自由社会时的重要作用的发现将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一支新力量。”[①]他们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认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具有社会—历史性质，是一开始就与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②]他们还运用异化观点批判资本主义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揭露了消费异化是导致环境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生态社会主义继承了这些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包含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内容。

当代生态学、系统论、未来学等新兴综合性学科的发展也为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资源。譬如生态学将人类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方法，系统论把自然界看作一个由无数相互联系的子系统构成的生态系统，人类只是其中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须重新定位，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报告提醒人们对发展模式及其未来走向保持关注的研究，包括改变工业化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呼吁，都得到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积极回应。

生态社会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0 年代），一些具有生态意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注意到绿色运动的政治倾向，开始从理论和思想上参与绿色运动，掀起了一股“绿色政治”风潮，但此时他们在绿色运动中还不怎么起眼，与绿色运动其他派别的区别也不明显。第二阶段（1980 年代）是生态社会主义的转折阶段，这个时期许多西方国家的绿党在本国议会和欧洲议会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绿色运动颇具扩展之势。阿格尔（Ben Agger）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中专门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推介了马尔库塞的学生莱斯在《自然的统治》（1972）、《满足的极限》（1976）中阐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结合，成为西方绿色运动中影响看涨的激进流派；他们从资本主义消费异化，导致生态危机的角度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他们还构建了面向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即经济增长方式从现在单纯追求量的增长转变为实现“稳态经济”，政治上实现权力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全面消除人的异化，使人获得全面的发展。第三阶段（1990 年代以来），苏东剧变意味着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同时也为人们探索各种非正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开拓了思路。生态社会主义不仅继续关注日益恶化的全球性生态环

[①] [德]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见《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27 页。

[②] [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2 页。

境问题，而且更加系统地阐释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独到见解。这些年来，绿色思想已经在西方深入人心，并且为各种政治力量所接受和利用（至少在表面上）。欧洲左翼政党纷纷联合绿党争取或参与执政，他们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乘机宣传绿色思想与社会主义理念的一致性。在理论上，生态社会主义摆脱了过分理想化的生态中心主义主张，认为小规模的、分散化的经济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极端分散的工团主义和极端集中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折衷；而且转向支持经济适度增长，因为如果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去搞“稳态经济”，那无异于叫它们自杀。在政治上，生态社会主义提出，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都不可能通过基层民主得到解决（他们以前更希望实现以工人自治为特征的基层民主），特别是环境问题的流动性和扩散性，必须在区域的、国家的乃至国际的层次上谋求解决之道。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重新检讨当今世界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构生产力的方式的批判，也是对任何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宗旨的“物化”社会的批判，包括对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①]它从几个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

第一，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②]资本主义内在地具有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矛盾，经济理性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要求消费最大化，而生态理性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但利润未必最大化。显然，资本主义宁愿不要生态理性也不肯放弃哪怕一点经济理性。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使生态危机演变为全球性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生态掠夺”，以及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做法，简直就是“生态帝国主义”。发达国家现在改善了的环境实际上取自一种不平等的特权，它是建立在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不仅发达国家的发达，而且其环境质量的提高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为代价的。发达国家利用市场和技术优势、以及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迫使发展中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贱卖本国的环境资源。

第三，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从逻辑上来讲，传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导向‘生产性正义’。但事实上，它却导向了分配性正义的要求。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批判，但后来却去致力于改革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③]因此，要复活社会主义理念，就要从对定量性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的迷恋中拯救出来，代之以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使利润导向型生产从属于需要导向型生产。生产性正义能够使消极外化

[①] 见[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29 页。

[②] 转引自陈学明编：《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96 页。

[③] 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 514 页。

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而分配性正义则是以当前市场，或根据市场对人的生命和健康估价作出的有关罚金与红利、税收与补助金的核算为前提的。在一个社会化生产高度发展的世界，分配性正义不可能改变；而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途径就是生态社会主义。[①]

第四，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②]对消费的操纵成为追求利润和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现代统治形式又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改变社会制度，必须反对国际资本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内涵，即社会主义与生态原则的相结合，建构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当然不是资本主义技术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和人道主义。它反对生物道德论和自然神秘论以及各种可能导致反人道主义的体制。”[③]反对一切使自然存在道德主体化的观点和对自然的绝对崇拜，坚持“人类尺度”的新价值观，主张“人”在“物”之上；另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新型的人—自然模式，“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④]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现代化仍然无法以生态合理性取代经济合理性，只有在未来的绿色社会主义才能改变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这个社会对自然的爱护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利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真正道路。

生态社会主义还要求重新看待经济理性、强化社会理性和健全生态理性。他们主张实行社会占有制，“所谓社会占有制，是生产者以联合的形式实现对社会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即对人与自然关系实行集体的、自主的、自觉的控制，这样可以使社会生产真正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并保证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特别是生态利益，而这也是绿色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⑤]从而使更广泛的民主成为可能。在经济机制方面，除了市场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还有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将市场逻辑所体现的经济理性限制在社会主义的法律和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使受经济理性支配的活动从属于人的解放。

当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色彩比较浓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也不无偏颇之处。但它提出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未来社会主义必须是“绿色”的，比较深刻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为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开

---

① 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 536-538 页。
②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86 页。
③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0 页。
④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7 页。
⑤ 段忠桥主编：《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9 页。

辟道路的思想 。[①]这些内容都是值得肯定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603 页。